

## 第 一 章

### 对古老基督教徒的研究

藐视一切危险，把自己置身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教导人们懂得身体永存的规律和生命不灭的规律，这就是我们的天职。

阿克巴皇帝回答说：我主为你们祝福。

神父 哲罗姆·沙勿略

1599年8月1日

提要：1、葡萄牙人和莫卧儿人在印度。2、“大莫卧儿”阿克巴皇帝宫廷里的耶稣会士。3、蒙塞拉泰神父和关于西藏的最早消息。4、哲罗姆·沙勿略神父的研究。5、震旦和西藏。6、皮门塔的事业。7、鄂本笃修士与西藏。8、迪奥戈·达尔梅伊达及其证明。9、神父的遗产。

#### 1、葡萄牙人和莫卧儿人在印度

16世纪上半叶，印度与欧洲人及莫卧儿人这两个强大的外部因素发生了联系，印度从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7世纪，阿拉伯人开始面向地中海，因此变成了欧洲敌人。

在整个中世纪到距今不远的漫长历史的帷幕背后，有一支基本上是从事开放型劳动的力量，这支力量进行反对穆斯林的斗争，保卫了欧洲，或者说保卫了基督教。

15 世纪下叶，葡萄牙在开发和过取方面的热情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这就是波利奇亚诺<sup>①</sup>从佛罗伦萨致函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感谢他承认用其航海事业将人类可居住的世界统一于基督教的原因所在。

葡萄牙人当时的典型代表是阿尔丰索·阿尔布奎克<sup>②</sup>。

阿尔布奎克的美梦是：打击穆斯林的心脏地区埃及和阿拉伯，歼灭穆斯林力量。

为实现这个梦想，就必须打击心脏的侧翼，通过商业破坏它们在东方和在穆斯林地区的大部分财富。

1506 年，阿尔布奎克从马努埃尔那里得到五艘轮船并向印度开拔。1510 年占领果阿，并在那里铸造了带有基督教十字架图案的货币。1511 年，他又占领了马六甲城<sup>③</sup>。这时所有近邻都要求与他友好亲善。

就这样，欧洲积极地继续它的占领。

罗马组织了感谢上帝的的庆祝活动，虽然人们对土耳其人破坏奥特兰托的事件仍然记忆犹新。

1513 年，阿尔布奎克又开始绘制新的蓝图：越过果阿向红海渗透。他梦想同阿比西尼亚<sup>④</sup>国王结成盟友，在罗马河上筑起大坝，把尼罗河同红海隔离开来，这样就可使埃及成为一片沙漠，阿

① 教皇。——译者

② 阿尔丰索·阿尔布奎克(Alfonso d'Albuquerque)是葡萄牙派驻印度的第二任总督,他大力进行殖民扩张。在任期为 1509 年至 1515 年。——译者

③ 马六甲，《明史》写作麻六甲,或满刺加,位于马来半岛的西南岸,1511 年为葡占据。——译者

④ 阿比尼西亚,今之埃塞俄比亚。——译者

拉伯人就会向他投降，他也就可以得到马奥梅托的坟墓。他认为只要使穆斯林离开圣地，就会使他们投降。

但是，他徒劳地围困阿敦而未能攻克，因而他最终放弃了上述蓝图。

然而，对东方的占领仍在继续，而且得到了扩大和加强，这种占领活动很快就变成了葡萄牙人传教工程的基础。

如果我们想弄懂当时的历史，那么我们就不能忘记，保护欧洲的最好办法是使敌人成为基督教的信徒。

葡萄牙人在美洲、非洲，在印度，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自己的传教热情在宗教信徒，特别是在耶稣信徒中找到对象。

就在葡萄牙人奢望控制印度海洋的同时，另一支劲旅——莫卧儿人家族也阴谋统治这个大陆。

16 年之后，葡萄牙的第一批帆船出现在印度海湾，塔梅尔拉诺家族的第五代里有一位天才的探险家，他带领土耳其和伊朗部队向印度开拔。

1526 年，莫卧儿人的军队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出发，经阿富汗，占领了德里和印度的整个北部地区。

## 2、“大莫卧儿”阿克巴皇帝宫廷里的耶稣会士

阿克巴是巴布尔的孙子，他于 1556 年登基。

尽管阿克巴是个穆斯林教徒，但由于他惧怕伊斯兰教的狂热以及阿拉教使用暴力的习惯，他开始接近泛神论。泛神论是混杂的穆斯林教。该教自诩是最好的宗教，是上帝和仁爱的结合。实际上这种宗教同基督教极为相似。

阿克巴建立了一家“宗教之家”，早在 1579 年，他就吸收了非穆斯林的代参加“宗教之家”，如拜火教和耆那教(Giaina)的代

表。他负责调和“宗教之家”里的争吵,以期达成基本的一致,消除一切可能造成仇恨和斗争的分歧。

大皇帝梦想创造一种新的宗教,一种折衷的有神主义,以太阳作为教徽。

为此目的,他还邀请了葡萄牙教会的代表。

1576年,耶稣会的两名神父反对赦免 11 名商人,因为他们欺骗大莫卧儿政府,拒绝交纳赋税。阿克巴得知后深为感动。

1579年,他向果阿派驻了使节,同时邀请耶稣会派人到他的宫廷来。

有三位神父被派来传教:鲁道尔夫·阿嘎威瓦,那不勒斯人,阿特里大公的儿子;安东尼奥·蒙塞拉泰(葡文为 Antony de Montsera),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亨利奎斯,波斯人,是从伊斯兰教皈依耶稣会的。

1579年 11 月,他们离别果阿。

1580年 2 月 28 日,他们抵达阿克巴宫廷。

安东尼奥·蒙塞拉泰神父途中生病,所以他不得不稍事休息,比其他两人晚一周即于 3 月 4 日抵达。

### 3、蒙塞拉泰神父和关于西藏的最早消息

由于神父作为驻“大莫卧儿宫廷第一个传教团”的成员,西藏开始进入现代的欧洲历史。

直到那时,人们对西藏的了解仍微乎其微,依然局限于 13 世纪和 14 世纪马可·波罗和圣方济各教士们以及个别地理学家<sup>[1]</sup>对西藏的介绍在更多情况下,人们谈论的西藏只不过是一些与西藏接壤的地区而已。

人们在谈论西藏情况时,往往要加上“听别人说”这样的前提。



谁也没有到过这片土地。

随着耶稣会神父在阿克巴宫廷传教活动的展开，这些传教士开始了对这一闻名于世的地区及其特征作系统研究，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几乎只有传教士对西藏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所以西藏也一直忧心忡忡，担心被基督教所同化。

耶稣会曾把西藏发现者的荣誉赋予德·安夺德神父，而把最伟大的发现者的荣誉授予德西德里，耶稣会在这方面所建立的崇高功绩是任何人都难以超越的。

传到欧洲的第一个消息，我们是从传教士给总会长的一封信里找到的。

鲁道尔夫·阿嘎威瓦曾给他的叔叔、耶稣会总会长克拉乌迪奥·阿嘎威瓦写信<sup>[2]</sup>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叫“博坦”<sup>[3]</sup>的新民族，地处拉合尔以外至印度河之间。

其居民为白色皮肤，非常慈悲，

那里没有穆斯林。

耶稣会希望能派两个神父到那里去，从而使那里的异教徒大量皈依过来。

这些消息是蒙塞拉泰<sup>[4]</sup>神父收集到的，该神父是研究传教活动的历史学家。

在他们被派往阿克巴宫廷赴任的时候，印度院长文琴佐·罗委派蒙塞拉泰对那里的“河流地域、风土民情、庙宇和居民的宗教习惯”进行记载。神父把上述一切如实地公诸于众，由此诞生了《驻莫卧儿宫廷传教团记事》，这部《记事》是研究莫卧儿人统治下的印度最杰出的史料之一。

几年前，人们通过蒙塞拉泰的一部手稿，或者是经他亲自修改过的一部手稿，了解了《关于莫卧儿国王阿克巴家族的报告》这部著作，其发表时间为 1582 年 11 月 26 日<sup>[5]</sup>。

非常幸运的是，费尔明格找到了霍斯登翻译出版的这部著作<sup>[10]</sup>的原版。

在手稿中附有一份蒙塞拉泰亲手绘制的地图<sup>[11]</sup>，这份地图用三种不同颜色的墨水绘制而成。

从这本《记事》里，我们得到了关于西藏和基督教神父们对西藏兴趣的最早消息。皇帝走到哪里，蒙塞拉泰就跟到哪里。他曾跟随皇帝到过卡拉那乌尔，并从该地率领少量骑兵进发甘格拉<sup>①</sup>，给那里的小国王带去了援助，这位小国王是篡夺了父位而继承王位的。

神父正是在甘格拉听到了人们对西藏及其居民的议论<sup>[12]</sup>：

“纳加尔库特<sup>[13]</sup>距卡拉那乌尔 18 里，纳加尔库特是城市或者纳加尔要塞的意思，其首领与泽巴尔迪诺<sup>[14]</sup>为敌，正派军队讨伐（应那个被儿子篡位的皇帝的请求），他们掠夺了泽巴尔迪诺并捣毁了那里的一个县，以示对泽巴尔迪诺的藐视。

“在这个要塞的顶端喜马拉雅山<sup>[15]</sup>的东坡，居住着一个野蛮的民族，被称为博坦<sup>[16]</sup>人。

“他们没有国王，以村庄或部落<sup>[17]</sup>为单位居住。

“他们以毡（类似于那种制作帽子的东西）紧裹身体，一旦穿上就不再脱下，直到被汗水浸蚀坏，或由于时间过长而自然损坏。

“首领佩带有犄角的帽子<sup>[18]</sup>，帽子是用同衣服相同的材料做成的。

“他们从不洗脸、脚和手。<sup>[19]</sup>他们认为水是渎圣的，会玷污圣洁的美丽，所以水只能用来解渴。

“一个男人只能和一个女人结婚，生下两个或三个孩子后，男人便过独身生活。<sup>[20]</sup>

① 甘格拉(Kongala)，是当时旁遮普的首府。——译者

“如果夫妇俩中的一人死去，另一个不得再婚配。

“他们憎恶崇拜偶像<sup>[17]</sup>。

“他们的首领都是巫师，更准确地说，都是邪恶之人<sup>[18]</sup>。

“如果首领之一死去，其余首领就聚集一起，按照他们的经书确定安葬形式。

“只要这些邪恶之人说应由他们吞噬尸体，或抛之于河谷，或焚之于烈火，或弃之于野兽与猛禽，或悬于树木，或采用其他方式加以保存<sup>[19]</sup>，其他人俱立即听从。

“他们用人骨制作家庭用具：有颅骨做的杯子，肩胛骨做的盘子，肱骨和胫骨做的匕首等，以及其他东西。<sup>[20]</sup>

“箭头也是用肋骨的坚硬部分制作的。

“他们是白种人，中等身材，栗色头发，古铜色脸庞，大部分人有着圆圆的漂亮的眼睛。

“他们的武器是短刀和弓箭。

“他们用骆驼（那里骆驼很多）毛做成被褥，用细毛织成披肩，出售给纳加尔库特。<sup>[21]</sup>

“每年 6 月至 9 月，那里阳光充足，无冰雪，他们可以从喜马拉雅山下到印度平原，但在其他时间里，那里冰天雪地，他们只能呆在山下。

“那里的人都很仁慈和富有同情心，所以他们在施舍时都很大方，接待游客也非常热情<sup>[22]</sup>。

“他们热爱和平，憎恶战争。

“他们那里盛产欧洲也生产的酒、小麦和其他粮食。

“那里有许多家禽、绵羊、骆驼和野驴<sup>[23]</sup>。

“还有人说那里有一种野羊<sup>[24]</sup>，大如山羊，但其前脚掌和后脚掌没有区别，它跳跃前进，所以很容易被逮住。

“从这种羊身上可以得到纤细的毛，比丝还要细，他们用这种

羊毛编织上面说到的披肩。

“现在，有关这个民族的情况似乎是不可置信的，特别是有关独身生活的说法，神父<sup>[25]</sup>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对了事实，弄清了事情是否真像各位随远征军到其附近旅行过的神父<sup>[26]</sup>所说的那样。

“许多事实证明了关于这个民族的说法是正确的。这一切激励着神职人员打扮成商人不顾任何危险，去接近这个民族。

“但是由于事态的发展和传教团的谕令<sup>[27]</sup>，他们被迫放弃了这一打算。

“有人说，这个民族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北坡，靠近纳加尔城堡，直到卡斯皮里<sup>[28]</sup>。

“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sup>[29]</sup>。

“他们也许就是普林尼叫做卡斯皮里的人(caspiro) - 普林尼说，那里有一些卡什尔(casiro)人的印度部落，他们住在山里，靠近西提人，他们吃人肉。<sup>[30]</sup>”

以上就是《记事》论述西藏的第一部分。在援引第二部分之前，有必要对第一部分谈点看法。

1500年，关于亚洲存在许多完全或者几乎完全信仰基督教的人民的说法在欧洲颇为流行，并被人们接受。

人们相信这种说法是以中世纪的旅行者和传教士传来的消息为基础的（特别是马可·波罗传来的消息），他们认为亚洲遍布景教徒<sup>①</sup>。

①景教，亦称聂斯托里派(Nestorianism)，属古代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公元5世纪时产生于拜占廷，其创始人为叙利亚神父聂斯托里(Nestorius, 公元380-451年)。他于公元428-431年任君士坦丁堡总主教。他本人在公元431年被处“绝罚”的处分后，其教徒逃亡波斯，他们将该教传至中亚各国和我国。——译者

事实上，景教传教士在一个时期曾狂热般地向亚洲传播——尽管不是完整的传播——基督教，他们的传教活动几乎遍及中亚和东亚的所有国家，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整个地信仰基督教<sup>(31)</sup>。

后来，由于穆斯林商人大量涌进中亚，穆斯林在战争中屡战屡胜，加之伊斯兰教徒在中亚数朝为王，景教徒到处受到迫害，被禁止同当地人发生任何关系，他们的活动被限制在很小范围之内。慢慢地，景教徒在亚洲绝迹了。

那些对景教存亡尚不了解的传教士，走到哪里都担心碰上过去的基督教（在中亚建立的穆斯林王国也禁止欧洲人经过中亚进入远东），所以，那些进入印度的传教士都遇上了好运气，他们顺利地到达马拉巴海沿海地区；而那些到中国去的传教士和到中亚去的鄂本笃却交上了厄运，他们只找到一些古老的文物和少许废墟<sup>(32)</sup>。

但是，另一具事实又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由于种种原因，在这里提出佛教是不合适的，但佛教的许多教义和仪轨可以唤起人们对基督教教义和仪轨的记忆，所以，俗人往往把佛教和基督教<sup>(33)</sup>混淆起来。

因此，传教士们（他们相信在一些地区已经存在基督教徒）经常地听到商人和旅行者谈论，在一些地区确实存在同他们的教义和礼仪相仿的基督教徒。

在印度，那些驻在莫卧儿帝国的传教士们也持这样的认识。苦行僧从印度潜入西藏高原去探询那里附近的宗教情况，并把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驻在地处喜马拉雅山另一边王国的传教士：“那里真的信仰与你们一样的宗教”。尽管传教士们同苦行僧一样，知道那里的人并不怎么信仰基督教（我们可以参照蒙塞拉泰本人的看法），但他们感到有义务认为西藏人完全信仰基督教，因为他们希望西藏人终究成为信仰基督教的人民。

现在,我们再回到蒙塞拉泰的《记事》上来:

“土耳其人称印度帝国为印度斯坦,在过去的时代里曾由基督教<sup>(34)</sup>国王领导过。

“在葡萄牙人发现印度以前,我们的祖先对其了解甚少,曾称印度的国王为‘印度的约翰长老’<sup>①</sup>,对他们充满了迷信,并对他们进行了愚蠢的传颂。

“事实上,基督教从未在这片包括许多地区的广袤土地上留下哪怕是微小的痕迹,这就表明穆斯林是多么敌视基督教徒,多么敌视他们的宗教、他们的神圣建筑和他们的工作<sup>(35)</sup>。在提穆尔·贝格<sup>(36)</sup>时代,也就是在距今 1870 年以前,基督教仍在印度占统治地位。

“关于在喜马拉雅山偏僻地区仍存有基督教徒痕迹<sup>(37)</sup>的说法是不对的,阿格尔人<sup>(38)</sup>的武力达不到那里,至少对瑜伽苦行僧也是这样,如果应该相信他们云游了很多地方,但他们也编造了许多谎言,很多东西是他们杜撰的,他们把真假混淆在一起。神父们<sup>(39)</sup>曾向一些瑜伽苦行僧打听喜马拉雅山的情况,他们说此山很高,难以攀登,但他们又如何得以攀上山顶,并且说山顶是平的,是可以居住的<sup>(40)</sup>;曼萨乌尔<sup>(41)</sup>的居民说,在某一湖边有个非常古老的城市,城里的居民每八天在一个公共建筑里集中一次,进行祭祀和祈祷活动。

“现在说说祭祀和祈祷的方式。根据教规,男人席地而坐,双腿交叉,坐在庙堂的右边,从走廊到殿堂都是这样。女人也是这样,与男人不同的是,她们必须坐在左边。殿堂中间是庙宇最庄严的地

<sup>①</sup> 公元 1165 年,欧洲出现一封给拜占庭帝国皇帝的信,信的作者自称是“印度帝国的统治者”约翰长老,传说他身兼国王和宗教领袖二职,后来人们遂称印度国王为“印度的约翰长老”。但实际并非这样,亦无此人。---译者

方，在那里有一小片稍稍高出地面的部分，一男人以同样姿势坐于其上，他身着白衫，在其面前放一张极矮的桌子，上面陈列着两只金盘，一只盛酒，一只盛馒头。他手擎一书，并诵读其中的几段，其余男女每每齐声应答，然后，那位居中而坐的男人训戒几句。最后，所有的人按先男后女次序全体起立，鸦雀无声，并依次走近主祭<sup>140</sup>，接受他赏赐的馒头片和酒，完毕后再回到原位坐下。

“仪式结束，各自回家。”

“神父<sup>141</sup>时刻准备着弄清情况，以期一回到公使馆，就能立即送上有关这一弥撒的报告<sup>142</sup>。”

从蒙塞拉泰的这些记述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a) 神父们不愿承认存在一个新的民族；
- b)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怀疑这个民族信奉基督教；
- c) 他们感到有责任使这个民族纳入基督教中心；
- d) 他们伪装成商人，因为商人是唯一可以旅行的人；
- e) 要求果阿中止远征。

由于无证可查，我们不知道这次远征准备到什么程度，但是可以猜想，远征也许只是一种设想。

事实是，蒙塞拉泰在 1582 年就回到了果阿，陪同阿克巴的一个公使团去欧洲，阿嘎威瓦也请求召回(1583 年 2 月)；因此，所谓的远征在当时只是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传教活动仅仅维持了三年，皇帝改异教于正宗(按：即基督教)的希望未能如愿以偿。

利马窦在果阿时对形势作出的评价是有意思的：阿克巴所以请神父来宫廷，除了出于了解其他宗教的好奇之外，也出于同葡萄牙人和平相处的需要，当时正值孟加拉与之为敌，阿克巴之兄对阿克巴宣战<sup>143</sup>。

皇帝和葡萄牙人当时关系紧张，阻碍了神父对宫廷施加影响。

此外，神父们在宫廷里还有一个不可战胜的仇敌：皇后们害怕皇帝一旦皈依基督教就会休妻。另一方面，皇帝对宗教的好奇心是有限度的，绝不允许涉及政治范畴，保住王位一直是他的最高追求。他知道，在一定范围内研究这种或那种宗教，会给人民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带来益处，如果研究过深，就会使一部分人同他离心离德。

因此，他对宗教真谛的研究从来不是十分真心诚意，也不深刻。

从神父们给会长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当时的形势似乎深为了解。

“皇帝不是伊斯兰教徒，并对各种宗教持怀疑态度。他坚定地认为不存在任何以信奉上帝为本源的宗教，因为他从一个宗教中都能找到与他相悖的东西。尽管如此，他还是承认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宗教能象‘福音’这样值得信仰。

“在宫廷里，有人说皇帝是一位信仰太阳的异教徒，也有人说他是基督教徒，还有人说他想建立一个新的教派。

“人民对皇帝的看法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人说他是基督教徒，一些人说他是俗人，还有人说他是伊斯兰教徒。

“而一些比较聪明的人既不相信他是基督教徒，也不相信他是俗人或是伊斯兰教徒。他们认为，即使承认他是个伊斯兰教徒，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为了争取民心而广泛地融化于其他所有宗教的伊斯兰教徒<sup>(16)</sup>。”

总而言之，阿克巴对神父的离去悻悻不悦，这也许是真情。

数月后，即 1533 年 7 月 15 日，鲁道尔夫·阿嘎威瓦在萨尔塞特岛的贡库利诺永别人世，由于皇帝非常崇敬他的圣德，所以对他



的逝世悲痛万分。

#### 4、哲罗姆·沙勿略神父的研究

由于皇帝一度偏爱基督教，故于 1590 年又请来了第二批耶稣会上。

这次的传教活动同样未能实现理想的目标，神父们于 1592 年初返回果阿。

1594 年，皇帝终于第三次请求果阿耶稣会长派几名神父，“因为他希望圣律的教导(神父语)”<sup>[47]</sup>。

会长非常踌躇，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再进行一次尝试并选派了哲罗姆·沙勿略<sup>[48]</sup>、马努埃尔·菲伊罗和鄂本笃等三位神父。

他们来到了帝国首都拉合尔，阿克巴于 1595 年 5 月 5 日盛情地欢迎了他们，并立即委任鄂本笃开办宫廷学校，给王亲们讲学。

从此，皇帝唯命是从。

请看当时对他的情况的描述：“为实现上帝的意旨倾注灵魂；同天主一样仁慈大悲，以期在灵魂附体时能创造另一个灵魂，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这样的魂灵。”<sup>[49]</sup>

关于皇帝即将圣洗的消息多次从印度传出，但每次都因某些障碍，圣洗未能实现。

但是，皇帝对神父的器重从未减弱，对鄂本笃尤其如此，皇帝对他总是特别亲切<sup>[50]</sup>。

为保持同耶稣会士的联系，阿克巴总是请神父们跟随前后，即使进行长途旅行也是这样。

在到克什米尔的一次旅行（1597 年 5 月至 11 月）中，沙勿略和鄂本笃神父聆听皇帝讲述西藏那里的教会、神父和主教的情况，安东尼奥·蒙塞拉泰过去也听过他类似的讲述。

不久，这些神父用葡萄牙文和波斯文通过三种渠道致函那里的  
主教。<sup>[51]</sup>

人们对他们同西藏联系的事一无所知，如果确实进行过联系，  
那么肯定回信没有到达他们手中。

因为沙勿略的信件里丝毫没有提及此事。

克什米尔之行为神父们增加关于西藏的地理知识提供了方  
便。

沙勿略在 1598 年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

“现在我来说说我们传教团的一些情况，简单地谈谈我与鄂本  
笃陪同国王进行的克什米尔之行。

“这是一个极其寒冷的地区，至今依然冰天雪地，山顶上积满  
了冰雪，使山变得更加高大，但如果同西藏（与克什米尔东部接壤，  
面向谢塔旦奥或震旦<sup>①</sup>。震旦<sup>[52]</sup>有着闻名于世的 300 里长城<sup>[53]</sup>，  
长城把塔尔塔里亚同中国分开。相比之下，这里要暖和得多，王国  
里的气温开始回升，野鸭成群结队地从西藏王国的白雪皑皑的高  
山下到这里，游弋在‘克什米尔’<sup>[54]</sup>河流中，显然，它们在气温较高  
的地方要比在冰天雪地里更为自由。”<sup>[55]</sup>

① “谢塔旦奥”(Scetaio)和“震旦”(Carajo)，均系“Khitan”(契丹)一词之转讹。始  
谓北魏以来在辽河一带游牧的契丹族。唐末，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建立辽朝  
(公元 916—1125 年)，影响扩大，中业各国遂称中国北方为“契丹”。此词于 13 世纪蒙  
古西征时传入欧洲地理学，其含义又扩大至泛指整个中国，其发音在欧洲各地亦略有  
变化，如变为 Scetaio, Xatai, Cathay, Cathayo, 等等。马可·波罗在其拉丁文的游记中，  
已不再沿袭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称呼中国的“赛里斯”(Seris)一词，而用“Cathay”一  
词来称谓中国。对“Cathay”之翻译，一些人为避免与原辽新契丹的地域概念相混淆，用印  
度《佛说藏顶经》称中国为“震旦”(Cinisthāna)之名或以“国泰”一词译之。因此，本书亦  
将“Cathay”译为“震旦”。——译者

神父们从克什米尔回到拉合尔后，一个突然的情况向他们提供了珍贵的新消息。

沙勿略把看到的一切写信告诉果阿的会长尼古拉·皮门塔神父，他又把这封信报告了耶稣会罗马总会<sup>[16]</sup>。皮门塔神父对罗马总会长克·阿嘎威瓦说，关于“莫卧儿的传教”对阿克巴王国的传教）有三件事要说：第一件是国王允许在加姆伯格（为 Camboge）即震口的第二部分信仰基督。此信是这样写的：

“（我要告诉尊敬的神父的）第二件事是‘萨塔伊’的情况，它位于东方的广袤地区，那里的许多东西吸引着我们考虑开辟新活动的可能性。

“萨塔伊就是震口王国（至少许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关于这个王国，哲罗姆·沙勿略在他 1598 年 7 月 26 日的信里曾经提及，他这样写道：

“一天，正当我与亲王谈话，一位 60 来岁的伊斯兰教商人走进宫殿。亲王问他从哪里和经哪条路来。他回答从萨塔伊王国经麦加来。

“一会儿，许多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住在麦加，并说他在那里布施过成千上万的金银财宝。

“亲王又问他是否真的布施过，他没有否认，并说他进行过大量布施，还说他已经老了，很快就会死去，他知道那些东西不属于他自己。

“在被问及萨塔伊王国的情况时，他回答说，他在那个王国所在城市居住了 13 年，这个城市叫‘汗八里’（Xabalu）。

“他还说，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王国，其国王辖大约一千五百个城池，其中的一些城市人口众多。

“他告诉亲王，他能经常见到国王，人们可与国王说话，但如果

不事先请求，国王将不予理睬，国王的所有答复均通过宦官传递。

‘亲王又问如何才能进入这个王国。商人告知他是穿着商人<sup>[58]</sup>服装并打扮成卡伊加尔（或喀什噶尔）<sup>①</sup>汗王的使者进入这个王国的，在进入这个王国的第一个城市的时候，受到了检查官员的盘查。检查官是想弄清来者何人，想干什么。一旦来人所带文件的印章被承认是真实的，就立即派人将这些文件送给国王，一个月之后，此人就会带回允许进入首都的通行证。这一切可以得到如此容易的解决，是因为经常调换马匹，以保证行人每天能行 90 至 100 科斯：一科斯相当于古罗马的一千步（约合 1.487 公里）。

‘旅途中不会遇到任何麻烦：（那个王国的人民）真正崇尚正义，绝对不会行劫。

‘商人说，那里的人皮肤白皙，容貌秀美，胡髯很长，他肯定从来没有看到比他们更漂亮的人，同欧洲人和土耳其人相比，他更喜欢那里的人。

‘关于宗教问题，他说那里的人是‘Isauiti’（‘耶稣的信徒’），他们同我们一样，认为基督教起源于耶稣，而非基督<sup>[59]</sup>。

‘有人问他，那里的人是否都是耶稣信徒。他说，‘不，他们中也有犹太人（他们自称为莫塞或穆萨），还有许多穆斯林。’

‘亲王问那里的国王是不是穆斯林。

‘他回答，还不是，但穆斯林们希望他尽快成为穆斯林。

‘亲王为了继续同我谈话，命令老者过几天再到他这里来。

‘在亲王与老者约定日期前，我继续同老者谈话，围绕那里的活动和宗教向他提出了一些问题。

‘老者肯定那里的人信仰基督教，他还和几个基督教徒建立了友谊。

‘老者继续说，那里有许多教堂，有些教堂很大，很漂亮；教堂

① 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市。——译者

里有很多图像，特别是耶稣蒙难像，有些是画的，有些是刻的，所有图像都体现了人们对基督教的巨大热情，每一个教堂都有一个神父，人们对神父非常忠诚，经常给他送去礼品。

‘我还问他那里有无主教，他不懂主教是什么。他告诉我，在所有的神父中有一个最受尊敬的人：‘所有的神父都是独身，他们有学校，教育儿童，让儿童们从事神圣的事业，他们的所有开支都由国王支付。

‘国王修建教堂，并修理那些因年久而损坏的教堂神父们穿黑色衣服，帽子同你们的无多大差别。只是稍大一些。他们告别时不摘下帽子，而是将双手合十放在胸前，然后举起，齐头为止<sup>[60]</sup>。他们也用披风还有红色的外罩，但只有节日和最庄严的时刻才穿外罩。

‘居民一般穿黑色外衣，但每逢过节，他们就穿红色衣服。

‘他还说，他经常看见国王到教堂去，因为他也是基督教徒。

‘那里也有许多男、女终生不婚，他们居住的地方不许别人出入<sup>[61]</sup>。

‘有一些人在自己家里度过独身生活。那里矿产丰富。国王非常富有，许多主要城市都有他的珍宝，有人说他有 400 头象，是从满喇加(乃六甲)弄来的。

‘老者还肯定说，许多商人经秘鲁从海道来到这里（我相信只能从业已存在的中国与日本的海道到达这里，别无其他海道），旅行往往需要半年以上。’

“(沙勿略写道：) 这些简单的情况都是这个商人告诉我的。

“然而我个人认为，如果进行这样的旅行，最好是采取阿克巴的办法。

“事实上，如果从拉合尔出发，首先到达的必定是克什米尔，它是阿克巴王国的一部分。

“从克什米尔可以直达西藏王国，藏王与阿克巴<sup>[62]</sup>是挚友，只要带上阿克巴的介绍信，就能顺利到达震旦的第一个城市‘喀什噶尔’，这个城市是基督教徒聚居的地方，离西藏只有几里地<sup>[63]</sup>。

“我在喀什米尔的时候，人们也对我说，在西藏王国里，有许多基督教徒、神父、主教和教堂。我本人也从克什米尔用葡萄牙文和波斯文给他们写了三封信，信是通过三种不同的渠道<sup>[64]</sup>发出的，一俟他们给我回信，我将向您——尊敬的先生报告。

1598年7月26日写于拉合尔。”

与此同时，会长神父也从果阿致信哲罗姆·沙勿略，要求试探阿克巴对未来远征震旦的可能性的看法。

阿克巴表示非常愿意远征。

沙勿略即于1599年8月1日从阿格拉将这一消息向会长作了报告，这封信同上述封信一起被转寄到罗马。这封信被收进了于1605年出版的赫(Hey)<sup>[65]</sup>的集子里。

会长的信这样写道：

“哲罗姆·沙勿略又一次从阿格拉写信给我，日期是1599年8月1日，他把有关震旦王国的新情况告诉了我，这一消息证明了他过去信里提到的有关震旦基督教的情况是属实的。关于道路问题，他告诉我经过孟加拉的道路是可行的。这条道路就是经过同阿克巴王国接壤的加拉加特王国<sup>[66]</sup>；但他告诉我最好的道路是通过喀布尔<sup>[67]</sup>地区和拉合尔城。

“这条道路比较远，但走的人很多，有人说商人都不太愿意走这条路。

“在这些信件里(沙勿略)神父谈到他同国王就远征问题进行的一次谈话，他是这样说的：

“陛下，我们的总会长已被告知在震旦王国许多人信仰基督教，但由于那些地区距离遥远，途经的民族又动乱不安，所以我们欧洲人 300 年来对那些地区还是没有一点准确的了解。向那里派遣三个，或者最多四个神父帮助那里的人们遵守圣教，一直是总会长的热切愿望。藐视一切危险，教导人们懂得身体永存 和生命不灭的规律，这就是我们的天职。”

“国王回答说：‘我主为你们祝福。’<sup>1681</sup>他还说了一些赞扬的话。

“因此我接着说，教皇知道至今还没有一条更可靠的通行道路（教皇）希望知道陛下是否可帮助我们之中的几个人到那些地区去。

“对此，国王回答说：‘去吧，我正准备派一名使者到那里去，你们可以跟他一起去。’

“机会好极了，因为从‘加姆巴亚’到喀布尔的广阔土地，都是在阿克巴的统治之下。

“然后经过巴达斯卡姆，那里的老国王是在皇帝的土地上长大的，他的三个儿子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当今的国王就是三兄弟之

“由于这些原因，加之阿克巴的帮助，到达震旦边境的道路已没有问题；众所周知，只要带上阿克巴的介绍信，就可以畅通无阻。沙勿略的信到此结束。”<sup>170</sup>

1599 年末的形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沙勿略在克什米尔时听人说西藏有基督教徒，就象蒙塞拉泰已经听说的一样。

2) 西藏和震旦两地相距遥远，在它们之间有一个喀什噶尔的下国。

3) 果阿总会长认为应该在老基督教徒的帮助下派人到震旦传教。

4) 认为途经巴达斯卡姆的道路是最理想的。

5) 阿克巴完全支持传教活动。

## 5、震旦和西藏

在谈论计划的实施情况以前，必须说明一下那些年里在地理概念上犯下的一个错误，即把古老震旦的基督教徒同西藏的基督教徒混为一谈，这实际上是把震旦（契丹）和西藏两个地方等同起来。

在 10 世纪前后的差不多 3 个世纪里，中国北方数省在受到外藩控制的上著人领导之下，这些外藩的第一个王朝是契丹（中国历史上称之为辽，907 年至 1125 年）。

中亚的人民称中国北方领土的历代王朝为契丹（khitai）卡塔（khata），或震旦（Cathy），中亚人通过经商同他们发生联系，它们的名字被传到波斯、西伯利亚。

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欧洲称中国为“秦那”（Sinae）、赛里斯（Seres）<sup>[71]</sup>

把“震旦”传入中世纪欧洲的，首先是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orpin，1246 年赴东方）<sup>[72]</sup>，其次是鲁布鲁克的威廉（1255 年回到欧洲），最后从马可·波罗<sup>[73]</sup>那里听说“震旦”这个国家，马可·波罗把这个名字传到欧洲比他们晚半个世纪。

① 柏朗嘉宾是 1245 年奉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教皇之命出使蒙古，于 1245 年 4 月 16 日从法国的里昂出发，到基辅后，再于 1246 年 2 月 3 日由基辅赴伏尔加河畔的拔都幕帐，后抵哈喇和林，并于同年 11 月 13 日离开，1247 年 5 月 9 日重返基辅，同年 11 月返抵法国里昂。——译者



然而,当鲁布鲁克把“伟大的震旦王国”的消息传到欧洲时,就把这个古老人民的“赛里斯”即中国<sup>[73]</sup>同契丹混为一谈了。

由于传教士不断的传教活动,14世纪的欧洲人对这个王国充满了崇敬。14世纪末,由于穆斯林教在中亚广为流传,不少过路的传教士被杀,欧洲同这个王国的联系大大减少,几乎到了不复存在的地步,15世纪和16世纪,穆斯林国家在中亚得到了巩固,成了欧洲人发展同它们关系中不可逾越的屏障。

震旦有两件事给人民留下了美好遐想,一件是那里非凡的富庶,另一件是那里可能居住过基督教徒<sup>[74]</sup>。

哥伦布1492年扬帆远航时,并不想发现一个新大陆,而只想寻找一条到达马可·波罗笔下的震旦和契邦谷(Cipangu,日本)王国的道路,他直到死时都相信他发现的土地是亚洲的东部海岸。

他的这种看法甚至在他逝世后的若干年里仍有影响<sup>[75]</sup>。

1500年,葡萄牙人沿与哥伦布相反的海道寻找震旦。

阿拉伯人把印度、震旦和日本岛的无与伦比的珍品带到科斯坦蒂诺波利和开罗,威尼斯人再用优惠价格从这里买走这些珍品。这时,葡萄牙人想直接到那些地方去购买黄金、绸缎和药材等,但是,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没有一个城市的名字同马可·波罗说的一样,也没有像马可·波罗所说的那样有基督教徒,那里连一个基督教徒也没有。所以人们得出结论,印度和中国都不是震旦。

然而,传教士们怀疑上述结论。

我认为蒙塞拉泰1590年写的《记事》已经提到的事实是最主要的:他确认那个古代的“赛里斯”就是中世纪的震旦,亚洲腹地的商人们仍把这个地方叫契丹,他们说那个地方有基督教徒<sup>[76]</sup>。

证明古老的震旦就是中国的功劳应该属于利玛窦<sup>[77]</sup>。

1596年他给罗马会长写信时说:“最后,我想告诉您一个奥

秘，尊敬的您和其他神父将会乐意了解这个奥秘，这是我作的一种推断。去年我到过南京城，那是一个大都市，是古代中国的首都所在地。经过各种推测之后，我想这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震旦。因此，我认为震旦只能是中国，而不可能是其他王国。”<sup>(78)</sup>

从 1595 年开始，人们已对震旦的推测进行了不厌其烦的研究。

“时隔 4 年之后（利玛窦于 1598 年到达北京），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宫廷，通过与摩里人（Mori）<sup>(1)</sup>的讨论，我发现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不存在另一个震旦，因为波斯人在提及中国的名字时只用震旦，在称呼北京时只有‘汗八里’。”<sup>(79)</sup>我们并不知道，印度的耶稣会神父们在 1598 年至 1602 年之间的哪个具体年代了解利玛窦看法的，我们只知道他们不接受利玛窦的看法。对此，利玛窦本人给了我们肯定的回答。

“在那个年代（1602 年），即使印度的神父们从我们在中国的神父那里得到了对中国的新了解，即中国同震旦是一回事，那么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他们从摩里人那里听说许多或者全体震旦人都是基督教徒时，到过中国的神父们又说那里没有一个基督教徒，甚至说基督教的教义从来就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对一些事情产生了怀疑。因此他们认为也许存在一个真正叫做震旦的王国，靠近中国，而中国也有一个地方用了同样的名字。”<sup>(80)</sup>

总而言之，印度的神父们不相信中国就是古代的震旦。不仅如此，他们更想使人相信在喜马拉雅山的那边确实居住着基督教人民，这个地区就是西藏。

沙勿略神父在 1598 年的信<sup>(81)</sup>里也对西藏和震旦进行了区别，他认为震旦地处西藏外边，靠近喀什噶尔王国，几乎已经暗示了震旦就是西藏。正如我们所知，这个错误的判断在差不多 30 年

(1) 摩里人（mori），即是穆斯林。——译者

里一直得到一部分人的赞同。例如塞巴斯蒂亚诺·巴雷托神父 1624 年 12 月 15 日写于果阿的一封信里引用了这样的消息：“大西藏王国就是人们所说的震旦”<sup>[22]</sup>。再如，曾经到过西藏的戈迪尼翁神父 1626 年 8 月 16 日写于扎布让的一封信说：“上帝启发我们作震旦即大藏之行计划，大慈大悲把我们幸福地带到了那里。”

## 6、皮门塔的事业

印度传教士们对利玛窦问题研究的最大目的，在于确认基督教徒的存在。

有人说，中国不可能是古老的震旦，因为中国没有基督教徒，而在古老的震旦到处皆是。有无可能基督教徒从一个被叫作“约翰长老”的基督教神父统治过的王国绝迹之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呢？

因此，必须对这个王国进行研究，这个王国应该处在印度和中国之间，而且应该承认在这个王国有过基督教徒。

皮门塔神父<sup>[85]</sup>是这一研究工作伟大的实践家。

从向阿克巴宫廷派出第三支传教士队伍起，他就有两个计划，一是研究古老的震旦，一是去帮助那里的基督教人民<sup>[86]</sup>。

他在 1599 年写给耶稣会会长的一封信<sup>[87]</sup>里，再次坚持了向那里展开新的传教活动的要求。

在他进入阿克巴宫廷并得到了阿克巴给予帮助的保证之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教皇和葡萄牙王非力三世发现了新的世界和在东方发现了新的大陆，使得 16 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得到扩大，其后，欧洲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也得到了扩大。

国王和探险家们把十字架悬挂在船上，作为义务和权利的标志，象征着传教思想胜利<sup>[88]</sup>：义务即为传布福音，权利就是占领。

当时的罗马不能像今天这样，把战败国作为自己的殖民地，而是从那里一扫而过；在那里修建一个新的教堂，然后把教堂交给战胜者政府。

战胜者从事自己的事业，并负担传教上的开支。

罗马满足战胜者的一切愿望，使他享有无数特权。

教会与国家合为一体，为共同事业一起工作。

当然，在事业的热情中，也存在着人伦窒息神灵、政治和胜利者的贪婪模糊福音纯洁的现象，甚至造成彼此颠倒，使传教思想为世俗政权服务的事情。

国王非力三世看到，仅仅“发现新大陆”就使他占有的土地不断扩大，因此他又对寻找震旦产生了兴趣<sup>(87)</sup>，并委派三个神父具体探索，然而他们一事无成。

他收到了皮门塔神父的信后，立即给他回了信，并同意再派“远征军”，“以保持震旦同基督教的关系”。他命令总督同果阿的主教以及那里的神父共商远征良策。

下面是国王回信的全文<sup>(88)</sup>：

“致耶稣会旅行者

“我，国王向您致以问候！

“我于 1599 年 11 月 12 日收到您的来信，我感谢您告诉我所继承的那些王国和先王逝世后我所获得的那些土地上的情况。上帝赐给您光荣！

“我考虑了去年随船队来到这里的两位教士所说有关耶稣会的全部事宜，您将会从总督阿里亚斯·德·撒尔丹哈那里得知我的想法，我一再嘱咐他要帮助上述那些地方的基督教，并同样要求他帮助您在所到之处的传教活动，我可以肯定，他会这样做的。

“我非常高兴地获悉在震旦有基督教，过去从未有人提及此

事。对于果阿主教告诉我有关比斯那加（Bisnaga）<sup>[89]</sup>王国信奉福音的事也同样感到欣喜。

“我深切地希望您，既要为即将在比斯那加王国开始的布教（传播福音）而工作，也要为寻找震旦基督教而工作，并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福音传播者）。我坚信总督会尽力支持您，并帮助您从事上述两项工作。

“您应该同总督和果阿的主教私下讨论这些工作，因为这关系我的事业，也就是上帝的事业。

“您所从事的其他一切工作，我都应该知道，您要把所到之处的情况向我报告，以便让我及时作出判断，并提前给您命令。

国王

写于 1601 年 1 月 24 日

里斯本”

1601 年底，印度总督阿里亚斯·德·撒尔丹哈和果阿主教阿莱西奥·德·耶稣斯·德·麦奈才斯，已根据国王的命令，为皮门塔准备好了钱和护照，并随时准备提供必要的方便。

皮门塔唯一的工作是选择远征人员。

许多人渴望得到这个荣誉。

那不勒斯神父安东尼奥·马扎雷洛曾于 1599 年 10 月 10 日从萨尔塞泰写信给耶稣会会长，表示愿随皮门塔神父“同赴震旦，听说震旦位于中国西部的长城脚下”<sup>[90]</sup>。

然而，1601 年 5 月，皮门塔神父却看中了鄂本笃。

1602 年 10 月 29 日，鄂本笃从阿格拉出发寻找震旦和那里的老基督教徒，他当时用的是假名——“上帝的仆人（Bandā Abudēl ā）”<sup>[91]</sup>。

## 7、鄂本笃修士与西藏

我们已经认识鄂本笃。

我们知道他是派往阿克巴皇帝身边的第三批传教士之一，他得到了阿克巴的偏爱。

皮门塔神父所以选中鄂本笃负此重任，是因为他富有仁慈心，谨慎过人，而且懂得波斯语。1601年鄂本笃回到果阿时，他是阿克巴派赴印度总督府的全权特使，后来又去阿格拉进行准备。

他回阿格拉的特别任务是购买商品，这些商品可资其路途开销，亦可将其打扮成商人。商品是在印度买的，资金是阿克巴捐赠的。

阿克巴共为购买商品捐助了 400 块金币。

1602年10月29日<sup>[92]</sup>，鄂本笃带着商队从阿格拉出发。

同年，肩负印度神父同样使命的利玛窦却正在加紧对中国基督教大家庭的调查，并从某地得到了有关古老基督教的第一手资料，而鄂本笃却还在亚洲腹地经受闻所未闻的困苦，5年之后才到达了那一地方，并在那里找到了永远的安乐。

我们不想一一赘述英勇的鄂本笃所作的全部旅行，只想说说其中的几个阶段。<sup>[93]</sup>

他从阿格拉出发之后，跨越了北部的整个印度斯坦，来到白沙瓦。

进入阿富汗后，先抵达喀布尔，然后由此向北进发，准备越过兴都库什山脉。

越过山脉之后来到巴达克森，继续东行，并横穿整个帕米尔高原，抵达叶尔羌<sup>①</sup>。

①：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译者

从叶尔羌前往和田。

从和田折回叶尔羌，改行古老的黄金之路，沿马拉尔——巴锡 (Marat—Bashi)、阿克苏(Aksu)、库车(Kustsha)、科拉(Korla)往焉耆，进吐鲁番，然后经哈密穿越戈壁滩抵中国的长城。

1605 年圣诞节前，鄂本笃到达中国主要城市肃州<sup>①</sup>，并在那里逗留一年有余，等待前往北京。

在肃州等待期间，他对北京的疑问全然消除：穆斯林商人称北京为汗八里，称中国为震旦<sup>[94]</sup>。

他给住在北京的利玛窦神父写了好多信后，终于收到利玛窦的回信。

利玛窦神父立即派了一位会讲葡萄牙语的中国基督教徒前往肃州，但其到达时，鄂本笃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当鄂本笃听到有人用自己的语言讲话时睁开了眼睛，拿出从北京寄来的信，并将双手伸向天空，唱起圣颂歌《荣归天主》：“啊，我的主啊，让你的仆人离去吧，他将在安乐中死去”。他亲吻所有的信件，并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心口上整整一夜，然后吩咐中国基督教徒转告利玛窦，他没有看见基督教徒，再也不要进行穿越亚洲的旅行了，震旦不是别的国家，它就是中国<sup>[95]</sup>。

几天之后，即 1607 年 4 月 11 日，鄂本笃以“巨大的喜悦”停止了呼吸，他为完成了旅行感到高兴，为完成了交付的任务感到愉快，他被埋葬在长城脚下<sup>[96]</sup>。

在 4000 多公里的旅途中，他一有机会就给印度的会长写信。

他写自叶尔羌的一封信说，消息在他们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现在我们谈一下奎雷伊罗“报告”<sup>[97]</sup>的第 166 页：

“在叶尔羌，鄂本笃找到了被关押在这里的西藏王，他是 3 年

① 肃州，今甘肃省酒泉。——译者

前落入陷井后被关到这里来的。

“这位国王名叫贡布那·米古尔。<sup>[58]</sup>鄂本笃去看望过他好几次，但他们语言不通，只有通过同他关押在一起并共同阅读‘Angi-ri’(即福音)<sup>[59]</sup>的其他人与他谈话。这些人中有一个叫隆里主，是跟随国王的医生，懂波斯语，他告诉鄂本笃说，在他的土地上不行割礼<sup>[100]</sup>，但孩子出生的第八天，会被带到他们的教堂(Botelhany)<sup>[101]</sup>里洗礼，洗礼由住持委托喇嘛<sup>[102]</sup>施行，并用教堂画像中圣人的名字为孩子命名<sup>[103]</sup>。

“医生说，他们那里称神父为孔加奥(Cumgao)<sup>[104]</sup>，他头戴法冠，身着如祭司一样的衣服。那里人民要斋戒 40 日，其间，白天不吃饭，只在夜间进食，但不饮酒、吃肉。斋戒的最后一天他们象过盛大节日那样，恢复吃肉。医生还说他有安吉尔(即福音)，他讲的神父<sup>[105]</sup>终身不结婚，他们相信‘末日审判’、‘八个地狱’和‘三个天堂’，并给每个天堂和地狱都起了名字，每一个地狱都是专为一种特殊的罪恶而设的，而每一个天堂也都是为特殊的功劳而建的<sup>[106]</sup>。

“医生还说，他们有些达官贵人到震旦去了，震旦离西藏只有一月之路程，他们很高兴能够见到鄂本笃<sup>[107]</sup>。”

鄂本笃的这封信于 1606 年寄到印度，他说得非常清楚，西藏是不同于震旦的王国，震旦离西藏“一月之旅程”。过去在这方面所产生的混乱也许是这样的：对于那些不同的讹传来说，正是把鄂本笃所说的西藏当成了震旦。

特里古尔特就是用这样的错误形式把消息传到欧洲去的<sup>[108]</sup>，他的误传使这一错误的范围得以扩大，从他 1607 年 12 月 24 日的一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误说鄂本笃传回了这样的字句：“在那个伟大的震旦王国出现过基督教的伟大足迹，因为他们有戴主教帽、行洗礼、遵斋戒，其神父不婚等与我们基督教一样的教规”



然而，关于“喜马拉雅山以外”的那个王国始终是个谜，无论是蒙森拉泰还是哲罗姆及鄂本笃本人发自叶尔羌的信，都曾指出那里居住着基督教徒。

也许正是在那里，有必要对古老的震旦和古老的基督教徒进行研究。

在鄂本笃出发后一年，果阿发生了另一个情况，它要求人们必须区分西藏与震旦。这一情况是由迪奥戈·达尔梅伊达提供的。

## 8、迪奥戈·达尔梅伊达及其证明

1603年，或者1602年末<sup>[109]</sup>，一个神秘的人从印度北部来到果阿，自称曾在“西藏”经商二年。

印度的耶稣会神父们从未谈及过此人，大家都用疑惑的目光看待他。他给大家讲述西藏时讲得格外真切，真使人相信他到过西藏。

他命题的一部分是正确的。他说震旦不是西藏，相反，震旦离西藏很远。因而，他的错误也就在这里，他认为一切关于震旦有古老的基督教徒消息，全部系指西藏。

根据迪奥戈的看法，此人所讲的基督教徒就是穆斯林在大莫卧儿宫廷里所说的基督教徒，他也许亲耳聆听这些穆斯林说过。

有一封信的一段是这样写的<sup>[110]</sup>：

“在鄂本笃出发之后，一位叫迪奥戈·达尔梅伊达的有名望的葡萄牙人给大主教<sup>[111]</sup>提供了以下消息：人们在莫卧儿宫廷里所谈论的基督教不应该是震旦的基督教（人们从一开始就认为，除莫卧儿王国之外，另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地方只能是震旦王国），而是另一个地方，更靠近莫卧儿，莫卧儿同这个地方有许多商业往来，这

个地方叫‘西藏’(Thibete),那个葡萄牙人在那里住过两年。

“此人说,西藏王国位于不久前被莫卧儿王国占领<sup>[112]</sup>了的古伊斯库米尔<sup>[113]</sup>王国外边,这个王国与西藏王国之间被高大的山脉隔开。

“这些山上冰雪很厚,只有太阳的威力才能使这些冰雪融化,所以一年中只有很短的时间可供人们越过高山。路途虽不遥远,但却十分艰难。从那里进入这个王国只需走过 500 莱加(一莱加等于 3 里)的森林,如果旅行者不是趁着刮印度洋季风的时节去那里,必须耐心等待冰雪融化<sup>[114]</sup>。

“人们更多地叫这个王国为‘塔米古亚’,这里不允许除过境商人以外的任何不可信之人逗留<sup>[115]</sup>。

“国王住在主要城堡里,他是一位伟大的独立国王<sup>[116]</sup>,这个城堡叫‘巴布哥’<sup>[117]</sup>。

“这个王国有丰富的金子和宝石,妇女们用金子和宝石装饰自己,这样人们就会认为他们是尊贵的人。

“这里的居民是白色人种,他们同热那亚人相仿,穿着很华丽<sup>[118]</sup>。

“他们有许多教堂,修建得富丽堂皇,内有神龛、基督像和上帝、圣母、圣徒的画像<sup>[119]</sup>。

“像我们一样,他们那里有许多神父信守独身,所着服装与我们的神父也极为相似,但他们全不留头发<sup>[120]</sup>。

“他们的主教叫喇嘛(Lamah)<sup>[121]</sup>。

“他们把故去的喇嘛看成是圣人,并大力夸耀他们的圣绩:某某喇嘛为表示虔诚,终年深居简宅,远离城堡,其住宅与城堡之间有一条宽阔的河流,一旦遇有盛大的节日必须进入城堡,他才乘船渡河。但在平常,只要不穿袈裟,不带举行盛典时用来坐垫的羊皮,

[113] 古伊斯库米尔,即克什米尔。——译者

就从不进入城堡<sup>[121]</sup>。

“这一切是对葡萄牙人迪奥戈·达尔梅伊达 1603 年向大主教所讲情况的证明，那里的人确实是手按圣书宣誓，他们除了在为基督教尽责外，不可能在做别的事情，达尔梅伊达是一个对教会事务一窍不通的世俗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不可能对那些仪式说得如此真切。

“这一切也希望鄂本笃传去的消息是准确的，因为大家相信那里的宗教是基督教，对此，穆斯林商人们也向莫卧儿宫廷报告过情况，所以那里并不是距此很远的震旦<sup>[122]</sup>。

“除了上面所说的‘西藏’王国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小西藏’的王国<sup>[123]</sup>，它隶属波斯国‘夏’（Xaa）穆斯林政权，也可能是‘西藏省’的一部分，马可·波罗在他的书里曾提到这个地方，但他没有说这里有基督教。”

## 9、神父的遗产

圣·伊尼亚奇奥留给孩子们的财产是他对教堂的热爱，他的热爱完全表现在他热爱教徒而应尽的义务上。

基督教徒永远是伟大的传教士。

尽管需要让老基督教徒保持与教廷联系，但不会降低他们使成百万的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热情。

1600 年，蒙塞拉泰神父临死前在萨尔塞特念念不忘“老基督教徒”<sup>[124]</sup>。

1607 年，鄂本笃也带着对“老教徒”不无担忧的探讨欲望离开了人世。

鄂本笃出发后若干年，印度的神父们非常苦恼：开始是人们对可怜的鄂本笃的情况毫无所知，谁也难以得知其探险的艰巨性，后

来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以及他研究的成果。

1607 年 11 月 12 日,利玛窦神父致信果阿会长说:“基督教和全世界都可以相信,在中国以外,不存在另一个震旦”<sup>[125]</sup>。

他曾多次写信向欧洲报告同样的内容<sup>[126]</sup>。

然而,印度似乎还不相信利玛窦的看法,我们看到,印度直至 1635 年还把西藏叫作震旦。

不过,问题渐渐冷淡下来,也许是由于人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

在整个问题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老基督教徒的问题,这是一个不惜一切都要弄清楚的问题。

鄂本笃作古之后,震旦的地理属性问题似乎已不再存在,一切担忧都集中到老基督教徒的研究上。

所有的希望都司迪奥戈·达尔梅伊达提供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达尔梅伊达提供的情况同哲罗姆·沙勿略神父提到的情况是一致的:他们都提到了克什米尔<sup>[127]</sup>。他们二人都说从克什米尔可去西藏。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

尝试付诸实施了,从克什米尔派出一位神父,但由于大雪封山,不得不返回印度斯坦。然而,关于此行,我们没有什么值得可讲的,唯一可说的是安东尼奥·德·安夺德写于 1696 年 8 月 15 日的一封信:“请听一听这些如此美好的消息(即西藏有基督教徒),这都是莫卧儿国王宫廷里的那些神父们试图得到证明的消息,为此,他们还派人从克什米尔出发,试图发现这些民族,但由于路途险阻重重,特别是大雪封山,他们派出的人接连不断地滑倒路边,他未能前进多少,就被迫折回印度斯坦。”

神父究竟想到哪里去呢?也许就是那个闻名于世的佐吉(Zo-gi)关?我们不知道。

历史上第一个可能到过佐吉关的欧洲传教士,是意波利托·

德西德里神父,他在 1715 年可能到过佐吉关。

那么,此人知道安夸德的信吗?当他经过那个难关时,他是否记得一个世纪前曾有一位同行不如他走运,因路遇大雪而返回原地呢?

1620 年的一份文件可以为我们作证:

“我们居住在那个王国的一位神父,正准备到一个近邻王国大西藏去,那里也许就是震旦<sup>[128]</sup>的本源。西藏是一个极大的帝国,神父想去那里看看,人们所说的一切是否属实,是否真有许多基督教徒,他们又以怎样的方式生活着,以期能够凭借上帝的光辉使他们皈依,使他们树立神圣的信念。毫无疑问,天主已经降给了他这种思想,因为在圣诞之夜,一个伟大的念头突然来到:请求国王和院长们批准到那个王国去。天主,用您的光辉保佑他们成功吧。”<sup>[29]</sup>

这一消息同上面的事情有关吗?它们是指同一回事呢,还是本来就是两回事?我们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但是,上帝会更多地奖励研究热情的。发现渴望已久的西藏的时刻已经到来。

## 第一章注解

- [1] 为了解曾经提及的西藏的古典作家，请参阅海尔曼的《丝绸之地与古希腊罗马之光中的西藏》，1938年利普西亚版。为了解阿拉伯地理学家，请参阅伯戴克的《穆斯林版图上的西藏》的补充说明。马可·波罗在其《游记》的第116章和117章（贝内德多版第110页和112页）提到西藏，第49章（38页）和75章（63页）也提到西藏。为了解方济各传教士在13与14世纪的报告和书信中所提及的消息，请参阅《圣经》所援引的著作《中国方济各会》和玉尔的著作《西域纪程丛书》（本书援引）。
- [2] 写于1582年4月15日，巴尔托利将此信全文收进了他的《耶稣会神父鲁道尔夫·阿嘎威瓦在大莫卧儿传教》一书，请见1819年皮亚琴察版第48页。
- [3] 在印度，西藏被称为博坦德（Bhotanta），与博坦（Bhotan）接壤。阿嘎威瓦与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也这样称呼西藏。到了18世纪，他们即称西藏为“博坦”（Bhotan），卡普清修会（嘉布遣布道会）的第一批传教士也这样称西藏。
- [4] 蒙塞拉泰 1536年生于维克·德·奥佐纳（Vic de Ozaña，卡泰罗尼亚），1558年加入巴尔切洛那耶稣会，1569年到里斯本治病，其后留任该城学监，1574年出发赴印度。1582年因陪御使重返果阿，并在那里从事《纪事》整理，未毕，他又接到了开赴阿比西尼亚的命令（1588年），途经阿拉伯时被捕，在服刑期间的1590年，完成了著作。1596年获释后返回果阿，这时身体已相当糟糕，1600年死于萨尔塞特。关于蒙塞拉泰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史密斯的《阿克巴，伟大的莫卧儿人》，该书于1919年出

版于伦敦。

- [5]请参阅原著和霍斯坦于1912年翻译出版的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第八期第185页。
- [6]W.K. 费尔明格(W.K. Firminger)于1906年在加尔各答出版的《圣·保罗大教堂藏书》里发现。霍斯坦于1914年发表本书，他对其进行了详尽评述，海兰德(Hoyland)和巴那吉(Banerjee)于1922年将该书译成英文发表。
- [7]霍斯坦在其评论文章中使用了这幅地图，斯文·赫定在其《南部西藏》(图一)里也使用了这幅地图(请见第三册)，作者在该书19页至24页广泛论述了这幅地图在地理学上的重要性。他写道：“对于16世纪的印度来说，它具有第一权威：图中所标明的经、纬度说明，那是拉合尔和喀布尔地区的第一幅真正科学的地图，是当代令人惊叹的准确地图……在探索亚洲历史的进程中，必须再等250年，才能得到可以与之媲美的东西。”
- [8]请见原文60页第二面和第61页第一、二面。我引用了手稿里提及的名字，如有变化，我将对原名或现名用注解方式加以注明。
- [9]纳加尔库特(Nagarcot)系当今位于卡拉那乌尔(Kalānaur)东北的甘格拉，卡拉那乌尔位于拉合尔东北部。
- [10]泽巴尔迪诺·阿克巴(Zebaldinus Equebar)即阿克巴皇帝，贾拉尔-纳德-丁(Jalal-nd-din)阿克巴。
- [11]喜马拉雅山脉。
- [12]蒙塞拉泰在其手稿所附地图中，在经线(当时的子午线)119°和纬线32°处标明“博特与博坦”(Both et Bothant)，并写上了该省的名字(复数——译注)。  
这一地区位于玛法木错湖西部。
- [13]西藏少数边民后来仍有按部落而居者，并有各自的地方小首领。

柔克义（《喇嘛之域》第16页）也认为，尸体消失得越快，灵魂就会安静得越快，或升入天堂，或附着于其他物体。

但其真正的原因也许在于那里很难找到土地，而且即便找到，也由于那里一年中有好长时间冰冻如石，难以开凿墓穴。

乔治（在其《西藏入门》一书中）也多次提及天葬，谈论最多的要算鄂多立克。

为了藐视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把他们的尸体沉入河中，乔治曾经提到这一点，他还说把尸体埋入地下是一种更为藐视的葬法：“他们习惯将尸体沉入水里，而将下贱部位去掉；但将它埋在上穴中，并草草地用上掩盖”。

但蒙塞拉泰还提到另一种埋葬死者的作法即吃，这除了嗜食尸体外，还是一个“尸体恐怖仪式。”

现在，围绕西藏人嗜食人肉展开了讨论，有人相信，有人不信。

当然，古老的西藏是通过两件事情被人了解的：一是嗜食人肉，一是麝香。

《中国大唐史记》（公元7世纪，即《唐书》）也讲西藏人是野蛮的食人肉者（引自布舍尔（Bushell）的《汉文史料中有关西藏的早期历史》，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第435页。）

西藏人自己说他们继承了祖先食用人肉的习惯，时至今日，位于藏布江深谷的部落仍有此习俗。

世人熟知的诸如“羌姆”之类的西藏圣剧（Drammi sacri），似乎渊源于送旧岁迎新年的习惯，根据这种习惯，必须驱除恶魔，并请求战神的宽恕和保护神的保护，这时他们将以人体祭祀，并食用人肉（引自布舍尔刊于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新丛书》第440页和玉尔——马可·波罗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之书》第一卷第303页），时至8世纪中期，赞普赤松



德赞禁止了这一做法。

但令人费解的是，西藏人曾从远古时代至 3 世纪以前举行“墓葬方式”，而至今却没有一个作家说看到过这样的例证。

下面是一些引语。

1326 年至 1327 年间，鄂多立克从波尔德诺内出发来到西藏北部，他在对天葬进行了广泛描述之后补充说：“那些死去的孩子就这样被鹰撕碎并吞噬”。

1246 年，约翰·柏朗嘉宾（即 Jean de Plan Carpin）来到哈刺和林，他说：“当这支蒙古军队（成吉思汗的军人）来到了波黎吐蕃（西藏的东北地区<sup>①</sup>），并用武力征服了这一地区的居民，后者是异教徒。他们打破惯例，召集亲属把尸体吃掉，有人这样向我们确证的。”（《中国方济各会》第十四章第 60 页）

鲁布鲁克也提到同样的事情，他写道：“在那些人（唐古特人）的后面是西藏人，他们出于孝道习惯吃掉自己父母的尸体，他们认为自己的腑脏是亲人的最佳坟墓，不过现在已经废弃了这种作法，因为各族均认为此种行为实在可憎”。（引自《鲁布鲁克的威廉东行纪 1253 年——1255 年》第 151 页和《中国方济各会》第二十六章第 3 节第 234 页）

鲁布鲁克告诉我们，在他 1253 年—1254 年之行中看到西藏人仍有此习惯。

然而，三个世纪之后，即 16 世纪末，蒙塞拉泰在印度却听到有人谴责（不再是西藏北部，而是其南部的）西藏人食用死人的尸体。

<sup>①</sup> 波黎吐蕃应为青海湖一带或青海湖以西不远的地区，不是西藏本土。 译  
者

如飞,毫无收获。”

《自然历史》(Storis Naturale)的文章说野驴有好多种。亚洲野驴(L'Asinus Onager)为波斯、土耳其斯坦和西藏所常见。而蒙塞拉泰所讲的比普通马大一倍半的马,则仅见于西藏,它们喜荒原、野生,所说善奔跑为其特长是正确的,当代的动物饲养家想活捉它们,往往是费九牛二虎之力而一无所获。这种野驴更像骡子,而不像驴,西藏人称它们为“Kiang”,身呈红色,胫、腿、肚均呈白色。

德·阿则维多在他的报告(第34页)中说,山民们常常猎捕这种动物,食其肉。

这种动物一般群居,每群二三十头,或更多一些。

马可·波罗也曾两次提到这种动物(参见贝内德多的《百万》第三十四章第26页和第六十三章第49页)。

(24)蒙塞拉泰指的是什么动物呢?大家一致认为可能是指牦牛,它是一种大型山羊,比常见的牦牛小不了多少。

这种牦牛毛长约三掌,故难以看清其关节,并极易认为其奔跑时似跳跃。称其毛为羊毛一样也是对的,事实上,它的毛比羊毛还要细腻(但将它与蚕丝相比却有些夸张),其毛可编织外衣。

乔玛·印迪科匹吕斯塔(Cosmas Indicopleuster)是第一个提到这种牦牛的作家,他在其著作《基督教徒的地形学》(参见玉尔《西域纪程丛书》第一册第223页)中提及其尾巴可作帽子的装饰品,这一作法仍存见于中国的许多地区。

鲁布鲁克也这样描写,他说:“有种凶猛的牦牛,全身长毛,形似马,腰背均有毛,胫腿粗壮”(参见《旅行日志》第二十六章第2节)。可能正是对这种牦牛的描述。

对这种牦牛进行完整描述的是马可·波罗:请见贝内德多的《百万》第七十二章第59页。

古伯察也对牦牛作过令人难忘的描述：人们骑着牦牛往返于青海湖和拉萨（请见其《鞑靼西藏旅行记》第二卷第 146、186 等页）。

德·阿则维多在其报告第 34 页中亦讲到牦牛。

[25] 系指耶稣会神父。

[26] 系指蒙塞拉泰。

[27] 正如我们所知，在 1582 年至 1583 年间，传教会的神父们都被召回果阿。

[28] 位于卡斯皮里（Caspirios）一带。

[29] “Tebet est une grandissime provence que longnjes ont por elles”（西藏是一个很大的省份，有其自己的语言），这是马可·波罗对西藏的描述（见自贝内德多的《百万》，意即：西藏是一个非常广袤的地区，有着自己的语言）。

[30] 引自普林尼的著作第六卷第 13 章。

[31] 请见穆尔：《1550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1930 年伦敦版）；请见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1914 年《通报》版第 623 页—644 页）；另请见 F·奴：《聂斯托里派教徒在亚洲的扩张》，1919 年。

为了解西藏，还可参阅《聂斯托里大主教蒂莫德一世（728—823）生平》：“在为土耳其任命了一个城市主教后，他说也希望为西藏任命一名主教”（H. Labourt *De Timotheo I Nestor. Patriaca*. H·拉布：《聂斯托里蒂莫德一世》1904 年，巴黎版第 43 页等）。

伯戴克热情地告诉我，在中世纪初，阿拉伯人（可能还有景教徒）曾想冒充西藏人占领土耳其斯坦，土耳其斯坦也有许多景教徒。

1906 年，沙畹博士发现，在位于列城（拉达克首府）东南方的宗则附近有一些带有十字架的波斯墓志铭，1911 年，新教牧

师斯密特在同一地方又发现了带有十字架的粟特文 (Sogdiano) 的墓志铭, 这些十字架同亚洲的景教徒使用的十字架非常相近, 十字架的顶端还刻有耶稣 (Ysaz) 的名字。这些墓志铭似乎可以追溯到 9 世纪初 (参阅《研究所会议报告》柏林 1925 年, 弗兰克 (Francke) 和穆勒 (Müller) 的研究, 第 366—370 页), 而这些坟墓很可能是中亚商人的。

- [32] 叶尔羌 (喀什噶尔的首府) 的伯克曾将缩小了的基督徒手书拿给鄂本笃看, 这些手书都是红色的圆形字体, 谁也不认识。鄂本笃说: “吾兄, 这些手书讲的是天主圣三位……” (引自格里罗的《扎汉尼亚和耶稣会上》, 第 138 页)。这些年来, 在那一地区, 尤其是在吐鲁番又发现了不少 (参见布利亚: 《中国新疆的宝藏》第 27--28 页)。

景教的文物和文献不断被发掘, 几乎到处都有一点 (参见 Y·塞基的《在中国的聂斯托里派的文献和遗物》和梅西纳的《古代亚洲的基督教、佛教、摩尼教》, 1947 年罗马版)。

- [33] 基督教教义可直接或通过摩尼教和景教间接渗入大乘佛教。

举例为证, “救世”之说, 并非像佛教鼻祖所教诲的那样: “救世”越是成为那些祈祷和善行的个人之间的合作, 就越能成为个人的本能。

- [34] 塔梅兰诺侵略之前, 在印度占统治地位的佛教首领都曾被误认为是基督徒。

蒙塞拉泰在其《纪事》的第二十一个附件里仍然这样讲。

- [35] 蒙塞拉泰在其《纪事》第 17 页的第二面又重复了这一想法: “我们完全发现, 这个地区信奉基督教 (罗马公教) 已近三百年历史, 然而 (很遗憾) 因为各种灾难或战乱而不再信仰它了, 今天基督徒的名字在人们的记忆与心灵中已经完全泯灭。”

保利诺在圣·巴尔托洛梅奥时也认为在印度北部有许多基督徒: “大概于 1209 年, 成吉思汗入侵西藏。约有成千上万的

基督教徒在西藏王国、突厥斯坦、喀喇山，甚至在印度、克什米尔和拉合尔等地。又引自《在印度的基督教》第175—176页）。

我认为关于北印度在中世纪有许多基督徒之说难以得到验证，否则，基督教从6世纪起就应在该地区兴盛起来了。

不管怎么说，印度的传教士们在16世纪末使我们相信，直至二百年以前，印度北部还有许多基督徒，后来他们被穆斯林击败了，并受到了迫害，因此他们被迫隐居到难以翻越的喜马拉雅山山脉以外的地区。知道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

[36]系指提穆尔拉诺(Tamerlano)。

[37]指“基督教传播的痕迹”。

[38]阿格尔(Agar)人。穆斯林的别名，因为人们认为穆斯林是阿格尔之子伊斯马勒(Ismaele)的后代。小伊斯马勒居住在阿拉伯(请参阅詹涅悉的书第十六和第二十一章)。

[39]系指耶稣会神父。

[40]利玛窦神父在其1580年1月18日的信中写道：“莫卧儿王国东邻一座极高的山，山名我已忘记。”(引自《利玛窦的历史著作》第二章第3-4节)其实他这里所说的正是喜马拉雅山。自利玛窦之后，蒙塞拉泰第一个对喜马拉雅山作出了明确无误的记述。

[41]印度朝圣者至今依然到曼纳萨罗瓦湖(Manasarovar)<sup>(1)</sup>沐浴，他们认为此湖之水可使到此沐浴者升入梵天。直至那个英雄时代，此湖被视为圣湖，在佛教传入西藏前，远古的西藏人也认为这是圣湖(引自杜齐《印度——西藏》第58页等)。

[42]“ad Antistitem adire”，意即“仪式主持人”。

[43]面对这些难以置信的证据，蒙塞拉泰未加迟疑地在他《莫卧儿传教团纪事》所附的地图中写道，在曼纳萨罗瓦湖地区居住着

(1) 曼纳萨罗瓦湖，即是我国西藏境内的玛旁木措湖。——译者

基督教徒。他也许从那一仪式中看到了基督教弥撒。这一仪式在喇嘛教中被称为“Tshe grub”(延寿仪式),即“获得生命延续”,在印度“巴克迪派”中也有类似的称谓——“大礼”。

这就是汪德爾在《西藏佛教或喇嘛教》(第444页等)中描述过的“延寿仪式”的喇嘛教仪式。

这种仪式排场相当大,在大寺庙里每周举行一次,蒙塞拉泰也曾提到过这种仪式。

参加仪式的信徒总是很多,因为这种仪式可以治病。在一些较小的村落,此仪式至少每年一次,所有善男信女的寿命都由于仪式的举行而得到延长。

这种仪式所朝拜的神是“Tshe dpag med”(无量寿佛,梵文为:Amitayus),他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同时受到朝拜的还有其他与长寿有关的神灵。

主祭必须是非常纯正的人,一般此人与酒肉无缘,他在为时24小时的仪式的大部分时间里应当行大斋,还应当不断地重复“制生神灵”的曼陀罗仪式(Mantra,一种祈祷形式),自始至终约需重复一千次,其次他还必须沐浴净身。

仪式的开始几乎同喇嘛教的其他一切礼仪差不多。

然后向四大天王、四方金刚、圣喇嘛祈祷,最后向无量寿佛祈祷,并同声祈求“延寿”。

至此,朝拜者认为五大天神、菩萨和其他神灵都已将盂中之液体变成了长生不老丹:在铙钹声中,喇嘛们唱起了圣歌。

与此同时,作为无量寿佛和其他主寿神灵化身的主祭,手抚信徒头顶,并将圣水和圣餐分给他们,如果朝拜者很多,他们就依次从主祭面前走过接受主祭圣施,相反,如果朝拜者人数不多,他们以膝跪地,等待主祭者一一圣施。

主祭为所有朝拜者施放三次圣水,将水洒在他们的手上:第一次圣水用于净口,第二次圣水用于摩顶,信徒们将第三次

圣水恭敬地咽下。

其后，主祭则通过不同的形式和程序向朝拜者施行各种祝福。接着，每一个朝拜者可从主祭的圣盂中得到几滴圣酒和三粒圣丸，并将它们吞下。

圣施之后，喇嘛坐于低椅之上，接受信徒们的贡献。

延寿仪式随之结束。

加比(Garba)在其著作《印度与基督教》(《Indien und das Christentum》)(第277页)中提及一种名叫“马哈普拉萨达”的仪式时指出，这一仪式是在拉马努贾学校和许多巴克迪派寺庙举行。

“节日晚间，善男信女们集合在一起，主祭神父发表讲话，然后由他们举行简短的祈祷和默思。

“所有自认不配参加仪式的人都隐藏起来，其他人则围拢到主祭神父身边，用右手接受他的小小圣施，并接受另两名神父向他们左手施洒的圣水，对于那些有幸参加仪式的人来说，这些圣餐和圣水将保证他们万寿无疆。

“圣餐之一部分将被保存下来悉心看管，留待施于患病者。”

G·H·威斯特柯特(G·H·Westcott)在其著作《伽比尔与伽比尔派》(Kabir and the Kabir Panth)<sup>[44]</sup>第127页中认为，“马哈普拉萨达”是伽比尔派信徒们的节日。

[44] 一些研究佛教的学者在探讨弥撒圣祭与延寿和马哈普拉萨达两种仪式的关系时认为，基督教弥撒对上述其他两种祭仪都有影响，T·W·里斯·戴维斯(伦敦1878年版《佛教》)和格里逊(同前引书，及《皇家亚细亚学报》第326页)都持这一看

[1] 伽比尔派，印度15世纪兴起的一个改革派别，其教义根据伽比尔的说教。  
译者

法,尤其是后者。

但伯里埃达尔·凯斯(Berriedale Keith)对此持反对意见。

加比接受了格里逊的看法:“马哈普拉萨达祭礼的仪式给人以与基督教晚餐极为相似的印象,很难再有别的解释”。

现在的问题是有待解释造成这一印象的原因。

格里逊认为,马哈普拉萨达及从属于此的延寿的喇嘛仪式渊源于圣体晚餐,而圣体晚餐又是南印度景教徒的一种仪式。

我未弄懂上溯到南印度景教徒的原因,首先因为那里的景教徒从来为数不多;另外,景教徒问世于5世纪后很久(印度教的宗主教制只不过在880年才出现,马拉巴(Malabar)的宗教教制到1500年才出现——引自塞基《在中国的聂斯托里派的文献和遗物》第348页),而在此期间,马哈普拉萨达祭仪也许已被巴克迪派(Bhakti)采用多时。我倾向于把这种关系追溯到公元后几个世纪的基督教影响,当时,弥撒在许多地区仍以友爱餐方式进行,这一看法还可以解释伽比尔派和马哈普拉萨达为何至今仍以友好宴方式进行。

用圣餐和圣饮举行的仪式,源于基督教弥撒圣祭,它仅存于教会之初(具体年代?)唯一的诺斯替教,此教派至今仍在(至1929年时拥有8000信徒,请见塔基·文图里的《曼迪安<sup>①</sup>教》和《宗教史》),曼迪(Mandei)代表“光明之王”神灵(似乎从4世纪起)的说法是人所皆知的,在许多文献中“光明之王”被“生命之上帝”所代替(西藏的无量佛称之为“无穷生命之上帝”,阿弥陀佛(Amitōbba)则称之为“掌握着无穷无尽的光

<sup>①</sup> 曼迪安(Mandean),诺斯替教,该教发祥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认为施洗约翰即是弥赛亚。——译者



明”，这些说法同出一恭）。

摩尼教徒也行圣体晚餐，每年七次，举行仪式时行斋戒和施舍。

摩尼教称神灵为“光明之上帝”的用法也是众所周知的，它的理论在西藏和本教的著作中都有影响。

因此，尽管延寿之喇嘛仪式源于马哈普拉萨达，而后者又曾受过基督教圣体晚餐的影响，但不可能有朝一日会发现这一仪式也受到过摩尼教或曼迪安派的影响。

[45] 请见利玛窦《利玛窦的历史著作》第二卷第 25 页所载 1581 年 12 月的信。

[46] 引自巴尼尔济的《评耶稣会神父蒙塞拉泰赴阿克巴宫廷之行》。

[47] 引自格里罗的《扎汉尼亚和耶稣会上》第 51—61 页、232—235 页。

[48] 哲罗姆·沙勿略原名叶隆·爱兹佩莱塔，后改叫其为圣·方济各·沙勿略。1568 年 5 月 7 日重返阿尔卡拉的耶稣会士神学院。曾在印度的巴中、柯钦和果阿任过传教会负责人，并到拉合尔当过传教士，险些被石头砸死，于 1617 年回到果阿，当选为恩加马尔主教，于同年 6 月 17 日死于果阿。

马努埃尔·费伊罗，1556 年生于本达·德尔加达(Ponta Delgada, 在圣·米格尔岛)，1592 年赴印度，1618 年左右死于果阿。

鄂本笃，1562 年生于圣·米格尔岛的坎普地区的弗兰卡城(请见桑末沃嘎尔的《耶稣会丛书》)。

[49] 引自 R·格罗塞：《东方的文明》(Grousset, *Les Civilisations de l' Orient.*) 第二章第 338 页。

[50] 波特洛(Botelho)神父在其著作《纪事纲要》中写道，在阿克巴

坟墓甬道里陈列着许多雕刻品，“在这些雕刻品中，我考察到我修会的神父们在阿克巴大帝统治时期，开创了基督的事业”。还有一些阿克巴宫廷的绘画，画中均为耶稣会神父的形象，麦克拉甘在其《耶稣会上与大莫卧儿》一书中曾对其中的几幅进行过描述。

[51] 1598年7月26日写于拉合尔的信(请见哈约《关于日本、印度和波斯情况的近期书信》第797页)里写道：“当我在克什米尔工作时，听说在西藏地方有许多基督教徒、圣堂、神父和主教。我曾通过三方面途径用葡语和波斯语给他们写过信。”Rebat是Tebat书写错误造成的。

[52] “面向谢塔里奥或震旦”(Vessus Scetaium Vel Cataium):在其他一些信件里，就像我们看到的沙勿略的信那样，称之为“Xatai”或“Catai”。在这里，作者既未将“Cataio”与“Sina”(中国)区别看待，也未将它们混为一谈。认为西藏(或拉达克)位于克什米尔东部的看法是绝对正确的，但这不意味着作者怀有此地离中国遥远的想法；然而肯定沙勿略认为拉达克之后就是震旦(契丹)的看法也许是不对的：他“面向谢塔里奥”的句子是空泛的，只不过指明它们不是毗邻(请见斯文·赫定《南部西藏》第七卷第51页)。

[53] 系指长城，全长 3450 公里。

[54] 系指克什米尔首都斯里那加。

[55] 引自哈约《关于日本、印度和波斯情况的近期书信》第863页。

[56] 系指《东印度史》(Historica Relatio de India Orientali)，写于1599年12月21日。参见哈约著作，沙勿略1598年7月26日写于拉合尔的信收在其795页至797页。1598年阿克巴将首都从拉合尔迁至阿格拉。

[57] 系指萨利姆(Salim)王子，继承其父阿克巴王位后改名为贾汉吉尔(Jahangir)(1605-1627年)。

[58] 中亚各王国商人的狡黠是世界闻名的，他们（其后，中国南部和北部的小王国也学习他们）以国王定期派去的使节为掩护进入中华帝国，在那里经商，并向皇帝朝贡。每5年派一次大的使团赴中国朝贡。吐鲁番、土耳其、麦加、萨马尔罕和哈密都有使节驻在中国，每3年派一次小使团，再次要一些使团，每年都有。“使节”们带去的最好货物先让皇帝选购，然后他才允许卖给中国商人。运去的货物主要有玉器、阿拉伯马和蒙古马、钻石等等，而从那里运走的商品主要是：大黄、麝香、锦缎、丝绸、茶叶、瓷器等等。

这旦所说的朝贡使团，是利玛窦在其著作《利玛窦的历史著作》(请见第432—433页)里所讲的使团。

最近，德利亚神父发表了汤若望神父1629年致罗马总会长的报告，这篇报告主要讲述了西方到中国的陆上通道。此报告详尽地介绍了那些“使团”。

[59] 论至修会，他说是耶稣会士，此名来自耶稣，如同我们称基督徒之名来自基督。“Isauitac”是阿拉伯——波斯语，“Isawi”，意即耶稣的信徒。

[60] 中国人特有的问候方式，下面所提的中国人在庆祝节日时喜用红色也是正确的。

[61] 利玛窦在评论印度穆斯林认为中国佛教徒是基督徒时指出：“有人说震旦的回教徒是基督徒，即使我们不想说他们是在撒谎——撒谎正是他们的习惯，至少也是因为他们不忌挂肖像，而他们却看到中国的庙宇里有偶像，其中一些偶像极象我们的圣母像，并在祭坛前放有蜡烛和小圆镜，司铎们在举行仪式时戴的帽子、穿的衣服和唱歌诵经的方式也极像基督教，所以说回教徒是真正的基督徒。”(引自《利玛窦的历史著作》第二卷第804页)

人们还认为，穆斯林贬称基督教徒、佛教徒和所有不崇

拜真主以及可兰经的教徒为“卡菲”(Cafir),这种称谓上的一致就很容易引起内容上一致的看法。

[62]从克什米尔去喀什噶尔的必经之地西藏的西部就是勃律(亦称“小西藏”),那里当时的国王是阿里一米尔(Ali-mit),即喀布拉(Kapula)公爵,他统治着当地一切小公国,并把手一直伸到了拉达克。那位国王是位穆斯林,同克什米尔首领关系极好。有关阿里一米尔的情况请参阅伯戴克的《拉达克编年史研究》第134—138页。

[63]根据沙勿略的看法,去震旦的通路是:从拉达克出发经克什米尔,穿越西藏(实为西藏最西部),便可到达喀什噶尔。

“这是喀喇昆仑山脉著名的古老通道,或经由喀刺昆仑山口,或经由某个邻近山口”(引自斯文·赫定《南部西藏》第七章第49页)

赫定认为,以上看法使人怀疑那位商人是否真的走过这条路;相反,他说震旦住有基督徒的第一个城市离喀什噶尔仅数涅之遥,这就证明了他本人并不认识他所提到的那条路。

[64]葡文版原文里用的是“tribus viis”,其意应为“三次”。

[65]引自哈约的《关于日本、印度和波斯情况的近期书信》第798—799页,并请参阅格里罗的《扎汉尼亚和耶稣会士》和亨利·玉尔的《东域纪程丛书》第四章第174—177页。

[66]即今日之库奇—比哈尔,位于孟加拉以北。

[67]此路尽管位于上信所说的那条路西部,但实际上说的是同一条路。

[68]系指阿赫默德—胡达。

[69]1595年鄂本笃曾在拉合尔担任巴达克森(Badakhshan)国王米扎·沙鲁奇(Mirza Shanruch)的三个王子的教师,后被布哈拉(Bokhara)国王赶走。1598年,米扎·沙鲁奇的王子之一收复失地并担任国王。

- [70] 格里罗在其《扎汉尼亚和耶稣会士》一书中曾对引起沙勿略兴奋的事业进行过描述（参阅格里罗著作第126—127页），该书还写道：“……看来‘Prete-Gianni’王国正是震旦，而不是至今被人猜测的阿比西尼亚（Abissinia）……”。
- [71] 赛里斯首先是中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
- [72] 马可·波罗于1291年(?)离开中国取海路回欧洲。
- [73] “其界之外是大震旦即大契丹，据我确知，该民族在远古时被称为‘赛里斯’（Seres，‘丝绸’之意）人，因曾经从当地进口精美丝绸，故被那里民众称之为丝绸之乡。当地居民亦被称为‘塞里斯人’。由此，我确定推知，在那个地区有座繁华的城市，有镶银的墙，镂金的屏障……”（引自鲁布鲁克·威廉的《旅行日志》第二十六章——《中国方济各会》——第8节第236页。鲁布鲁克的《旅行日志》第一版于1598年在伦敦印刷发行。）把契丹同中国混为一谈，亦可从乔瓦尼·达·恩波利分别于1514年11月6日和1515年11月15日写于里斯本和柯钦的两封信里找到例证（参阅1946年佛罗伦萨版《意大利历史档案》附件Tomo三第81页和第86—87页）。
- [74] 马可·波罗讲过，到处都有景教派基督教徒。
- [75] 参阅玉尔《西域纪程丛书》第一卷第180页。
- [76] “有人说赛里斯居住的地方就是今天被称作震旦的国家，他们还说这些赛里斯大部分是基督教徒，犹太人、异教徒和穆斯林也不少……赛里斯的首都汗八里离撒马尔干约三千哩”（引自巴涅尔济的《评耶稣会神父蒙塞拉泰赴阿克巴宫廷之行》附件23）。
- [77] 爱托雷·里乔教授认为，将中国与震旦混为一谈的责任应归咎于利玛窦神父。
- [78] 系指利玛窦1596年10月13日于南京写给阿嘎威瓦的信（请见利玛窦《利玛窦的历史著作》第二卷第227—228页）。

- [88] 皮门塔将这份文件的抄件与原件及 1601 年 12 月 1 日的那封信一起寄给了耶稣会总会长，霍斯登 1927 年发表于《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第 83—107 页，文件全文刊登在 105—107 页。
- [89] 系指维贾雅纳加尔 (Vijayanagar)，今天只能看到它是汉匹 (Hampi) 附近的一座废墟。
- [90] 引自《利玛窦的历史著作》第二卷第 395 页。
- [91] 引自格舍尔的《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自然、技术奇观以及其他有价值的实物材料汇编》第 63 页。
- [92] 利玛窦记述的时间是 1603 年 1 月 6 日 (参见《利玛窦的历史著作》第二卷第 401 页)，1602 年 10 月 29 日这个时间是鄂本笃自己在 1602 年 12 月 30 日写于拉合尔的信的记述。
- [93] 有关鄂本笃事请参阅《利玛窦的历史著作》第二卷第 319—445 页、格里罗的《扎汉尼亚和耶稣会士》、赫定的《南部西藏》第一卷第 158—162 页和第七卷、玉尔的《西域纪程丛书》第四卷第 34—46 页，特别请参阅贝尔纳德的《1603—1607 年鄂本笃神父在高原亚洲的穆斯林国度》和威塞尔的《早期耶稣会上旅行者在中亚 1603—1721 年》第一章。有关东行史前事请参阅《耶稣会士进行的基督教远征中国，依据利玛窦的笔记等》(De Christianis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 exp. Matthei Ricci Commentariis etc.)，作者尼科拉奥·特里加乌迪奥，1615 年 8 月。
- [94] “……他们到达肃州城后，听到北京和中国其他一些城市的名字，便毫不怀疑地以为已经进入了大震旦和大中国王国。”(引自《利玛窦的历史著作》第二卷第 428 页)
- [95] “临死前，他告诉神父们，……这条陆上通道非常遥远艰难和危险，谁也不能再作这样的尝试了。”(引自《利玛窦的历史著作》第二卷第 440—441 页)
- [96] 为了解寻找他的坟墓的情况，请参阅《耶稣会史档案》第四卷

1935 C.威塞尔:《耶稣会士鄂本笃修士墓》第 337—338页(Archivium Historicum Soc. Jesu, Vol. IV, 1935—C, Wessels, The Grave of Brother Bento de Goes, S. J. P. 337—338)。也请参阅《北京天主教公报》中亨利·伯纳尔德神父(P. Henri Bernard)对标题“Ricciiana”的注解(1934年11月版)。《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密尔弗莱德·克布小姐(Miss Milfred Cable)于1933年2月1日在伦敦的《皇家中亚学会》(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di Londra)举行的座谈会上说,她曾听到一位归化的穆斯林告诉肃州的一位基督徒,每逢阴历3月16日,肃州的穆斯林都要到那位“尊敬的外国人”的墓前朝拜,尽管那位外国人“不是穆斯林,但他们钦崇同一个上帝”。1934年3月19日,她在皇家地理学会又重复了这一说法。

克布小姐问他是怎么回事,那位穆斯林告诉她“三百多年前,从印度来了一位外国人,他想去北京,但来到肃州后就死了。因为他的尸体极沉,中国人都不愿意将他下葬,因此穆斯林们把他的尸首抬到了一边,但一位官员却要对他施以与其身份相称的葬礼。就这样,人们决定把他葬在长城以外的荒地里,所以他的坟墓至今还在这里”(《地理杂志》第八十四卷第17页等),1933年的《皇家亚州学会会刊》第221页也曾提及此事。

但威塞尔在其援引的文章中告诉人们,这些消息同人们所知的鄂本笃的葬礼不尽一致,利玛窦神父是这样写的:“他们也想按萨拉森<sup>①</sup>的习俗埋葬我们的教友贝内德多,但另一位教友乔瓦尼没有接受,并给他买了一个相当好的棺材,把他埋葬在一处洁净的地方。”(引自《利玛窦的历史著作》第二

① 萨拉森即穆斯林。——译者

卷第 439—440 页)此外,克布小姐所讲的地方不是肃州,我们知道鄂本笃埋葬在嘉峪关(Kia-Yü-kwan)以外,那里离肃州有 25 哩。

但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在乔瓦尼<sup>①</sup>(利玛窦所派)和以萨克(鄂本笃的同行者)离开后,当地的穆斯林把教友的坟墓迁到了长城以外的荒野之中。耶稣会士恩利科·摩塔(Enrico Mötter S.J.)最近确认了克布的消息,并允诺将要弄清坟地的准确消息和亲临坟地作仔细考查(参阅《字林西报》(上海,1949年2月10日)的文章:《哪个耶稣会士证明震旦(契丹)即是中国》)。

[97]即格里罗的《东印度等地耶稣会神父之教务年报》。

[98]鄂本笃约于 1603 年年底(11月?)到达喀什噶尔首府叶儿羌,一年之后即 1603 年 11 月 14 日离开。

这位“西藏国王贡布那·米吉尔”就是贡布朗杰(mgon po rnam rgyal),约于 1575—1600 年间在位,与其兄嘉木样朗杰(vjam dbyangs rnam rgyal)共同统治拉达克(西部西藏)。(引自伯戴克:《论拉达克的历史》载《印度历史季刊,第二十四卷,1948 年第 213—235 页》)

[99]一个欧洲人和两个西藏人的这次谈话是有意义的,历史对那个欧洲人有过记载。

“Angil”是阿拉伯—波斯文的 Anjil 或 Jnjl,意指福音,国王在这里暗指他所推崇的书,也许是《菩提道次第广论》(lam rim chen mo)。

[100]系指穆斯林施行的割体礼,指出那个国家不行割体礼,等于指出那个国家没有穆斯林。

① 乔瓦尼,即乔瓦尼·费尔南德(Giovanni Fernandes),为中国加入耶稣会的青年,原中国名字为钟鸣礼。——译者



[101]“Botelhany”同波斯文的“but-khānah”，意即“神像之家”，是印度穆斯林对印度教庙宇的称谓。鄂本笃沿用了印度人的惯称，也称之为“Botelhanr”。

[102]“blam”，长者，地位最高者，原为对宫廷达官的称呼，后亦被用作对僧侣的尊称。僧侣们还被称作法王（rje）或“rje btsun”，意即“受尊敬的人”。“意多喇嘛”（Itolama）的第一部分“Ito”的真正含义至今尚不可知，蒙古语称喇嘛为“Toyin”（源于鲁布鲁克的“Tuini”）。

[103]鄂本笃在这里指的是喇嘛教的命名仪式，一些现代作家称之为“喇嘛教洗礼”或“洗礼仪式”。

事实上，这与基督教洗礼仪式毫不相干，尽管喇嘛教仪式的某些特征可能会表现出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

婴儿出生数日后（有的3天之后，有的8天之后，也有的一个月之后）被抱到喇嘛家里取名，这时婴儿必须穿上全新衣服（在此之前不让他们穿新衣裳）。

喇嘛给孩子的父母一点水，让漱口，然后再在父母及孩子的头顶洒些水，最后便对主宰生命的神（无量寿佛）进行漫长的祷告，祷告时不断地摇晃圣铃和敲击用人的颅骨做成的小鼓。

祷告结束后，他们确信“生命之上帝”已降临“生命之盂”，这时喇嘛手执盛有“生命之丹”的“生命之盂”，分别给父母及孩子摩顶，边摩边说：“无量寿佛在此盂中”。

接着，喇嘛拿起“生命之箭”，并分别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摆动几下，认为这会使生命尽可能地进入婴儿躯体。

尔后，喇嘛取出一汤勺加糖的醅<sup>①</sup>交给孩子的父母，让他们饮去其中的一部分，而将剩下的部分灌入婴儿口中。

<sup>①</sup> “醅”为西藏的青稞酒。——译者

喇嘛再取三丸“生命之丹”，父母各吞一丸，把其中最小的一丸塞入婴儿口中。

此后，喇嘛再将其金刚在小孩的背上、肩上、头上来回掠过，并说：“这个‘多吉’将是你的保护物”。

最后，喇嘛拿出一块带颜色的方巾，将之对角叠起，然后边往孩子脖子上系边说“这个孩子叫 N.N.，他将是幸福的”。

至此，整个仪式结束了。

喇嘛给孩子取的名字都是复名：第一个名字总是圣名，被人们称作“教名”，鄂本笃也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喇嘛从画在他们教堂内的圣像中选一个字定为孩子的第一个名字”），另一个则是俗名。

摩尼教过去和现在都施行源于基督教的洗礼，他们每周一次。同西藏人有着许多联系的摩尼教也行此礼。

若需要详尽地了解喇嘛教这一仪式的特征，可参阅贡贝的《一个西藏人论西藏》（第 58 页等），河口慧海的《旅藏三年记》（第 479 页等）和舒拉金维特（Schlagintweit）的《论佛教》（第 239 页）。

[104] 此字字源不清，可能与贡噶瓦同义，但这是人名，从未用于职衔，因此，可能是当时一位喇嘛的名字。

这里所提到的斋戒我们在第四章里还要提到，但这里值得一提的，鄂本笃可能没有搞清西藏斋戒的期限，这一斋戒的时间从来不是四十天。他对斋戒其他特征的描述是正确的：斋戒期内，西藏人一日一餐，并且严格戒肉。

[105] 这里所说的“神父”实指“牧师”。鄂本笃在这里使用了耶稣会任命牧师时的用语。在西藏，只有黄教的僧侣终身不婚，而其他教派的僧侣都不绝对禁婚，但他们也往往是独身者，或者需要获得特殊许可后才能结婚。

[106] 在此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西藏人信仰的珍贵消息，西藏人不像

基督教那样有“终裁日”。每逢这一天，所有基督徒都聚在一起，将他们的罪过和功劳统统公诸于众，因为他们相信主宰死亡的阎王(Yamarājā)会给每一个灵魂作出不同的裁决。

原始的佛教并不了解这一判决：每个决定其业(Karma)——即行为，好的与不好的行为——即具有生命力的灵魂，都必须选择它所应附着的肉体，或选择魔鬼，或选择动物，或选择人类，或选择神灵，只有那些“业”已完全枯竭的人才可以摆脱存在的桎梏，进入涅槃。由于印度思想和艺术的影响，这一理论很快变成了真正的裁定论，根据这一理论，灵魂的去向必须由判官决定，所有灵魂的行为都要经过天秤的称量，然后灵魂才被派往各种肉体(见汪德尔的《西藏佛教或喇嘛教》第89页等)。

鄂本笃还讲到八个地狱，每一个地狱都是为某些特定的罪恶灵魂准备的，作家们在这些地狱的描写和级别的区分上众说纷纭，也许是他们所依据的材料各不相同，但引用最多的材料是梵书。德西德里(请见德西德里《西藏记事》第233—238页)讲到四级地狱，头三级中每级分成八个级次，第四级则是一个不固定的级别，一级地狱的八个级次是热狱，二级地狱的八个级次是冷狱。

汪德尔讲到八个热地狱和八个冷地狱，每个热地狱又有四个小地狱，因此热地狱就有四十个。

正像鄂本笃正确引述的那样，每个地狱都是为特定的罪恶准备的。

西藏地狱同佛教地狱一样，都不是永久性的。

一旦某个灵魂已经赎完过去生活中所犯的罪恶，它就会再生于牲畜，或人、或神，再附于什么样的肉体，这同它过去生活中所积的阴德亦有极大关系。

但相反的事情也可发生，即佛教和西藏天际的某位神

灵，尽管它享受了数百年的荣誉，由于可能犯下的罪恶，也会在地狱中再生。

每一个灵魂都生于地狱，而不是生后再打入地狱，因此灵魂不会走出地狱，而只会死去后再生一个新的灵魂，从而步入另一层次的地狱（见德西德里的《西藏纪事》第 217- 238 页）。

鄂本笃向我们提供的有关西藏天堂的消息也是非常扼要的，但是正确的：即共有三个天堂，每个天堂接受某些特定的情况者居住。即：欲界（Devaloka）、色界诸天（Rupādhātu）、无色界诸天（Arupadhātu）。

根据佛教教理，涅槃（Nirvana）是天外之天，生活在那里的人都是寿命极长者，他们也交替复生。

原始佛教既不知道天堂，也不知道地狱，只知道生存地（受愿望统治，因此受行为和痛苦统治）和涅槃（无愿望之地，所以也是无行为、无痛苦之地）。

- [107] 在今天的许多中国喇嘛庙里，喇嘛头目仍然是拉萨派去的。
- [108] 引自霍斯登的《关于鄂本笃的评述》，载于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新丛书》，1927年；1611年的《新报告》第166—170页；德海斯尼斯（Dehaisnes）的《尼古拉·特里高特神父生平》第225—227页，1864年，图雷纳。
- [109] 我们知道，迪奥戈在鄂本笃出发一年后到达果阿，很简单，这一时间的计算应从鄂本笃1602年离开阿格拉起，而不应从他1601年离开果阿算起。
- [110] 提到这一段的有：高维神父的《果阿大主教弗莱·阿莱索·德·曼尼则神父，东印度总主教奥斯登·德·圣奥古斯定》（柯因布拉，1609年，第3页，第一册第一章），曾被译成法文：J·B·格林（B·Gien）《东方史》（Histoire Orientale），安特卫普，1609年，第10—13页。

- [111]系指大主教 D·阿莱索·德·曼尼则·奥古斯定,印度首席主教。
- [112]阿克巴皇帝于 1587 年占领克什米尔。
- [113]这里当然指那条途经佐智山口的唯一通道,这是人们常走的一条路。德西德里于 1715 年 5 月至 6 月行走于这条路上,他在其备忘录第一册第八章里对此旅行进行了描述(请见德西德里《西藏纪事》第 74 页),他提到了那里的雪,对光照之后出现的雪融应给予的必要注意,遍布四野的冰川和行走的艰难。
- [114]鄂本笃、安夺德、德西德里都曾提及,西藏只允许商人和旅行者在那里逗留,而不允许穆斯林在那里停留。
- [115]系指森格·朗吉,他从其父王那里承袭王位时条件非常艰巨,而在简短的时间内,他使王国繁荣富强,我们还将对这个国王作详尽介绍。
- [116]巴布哥(babs sgo)曾多次为拉达克首都,1600 年再次成为王府所在地,王宫由森格·朗吉改造成庙宇(见弗朗克的《西部西藏史》第 99 页及其《印藏古代文物》第一卷第 87 页)。
- [117]西藏人同热那亚人身体上的相近是有意思的,德·阿则维多也提到这一点(请见其报告 31—36 页)。今天,学者们发现西藏的信仰同马来人极其相近。西藏人属蒙古人种,这一种族在远古年代就居住在中亚和东亚的高原地带,西藏人正是殖源于高原地带(很可能是东北部的高原地带)的蒙古人,逐渐与来自阿萨姆和不丹东南部的游牧部落杂居混血。对此,可参阅 E·彼塔德(E. Pittard)的《种族与历史》(Les Races et l'histoire)第 459—477 页,巴黎 1924 年;关于西藏人的人体特征可参阅德尼克(Deniker)的《地球的种族与民族》(Les Races et les Peuples de la terre),461—462 页,巴黎,1926 年。
- [118]从教外人的角度出发,看见西藏的庙宇就可能会记起 16 至 17 世纪的小教堂:西藏的庙宇里都设有祭台,祭台上排着的蜡

烛同装点豪华的巴洛可祭台多么相似。在那些塑像中，度母 (Tara) 的塑像，女神的仁慈像，或者智慧像 (Prajna paramita) 都可能使迪奥戈回忆起圣母的塑像。人们也是这样谈论东方教徒的：他们经常表现出同佛陀或者喇嘛教的大圣人相近的，佛陀也好，喇嘛教的圣人也好，都是菩萨或其门徒的代表。在迪奥戈看来，这些教徒同我主是亲近的。我们在后面还将看到，安夸德想在建筑新的教堂时，把喇嘛教的风格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

[119] 小阿美尼亚人海顿 (Haythou) 在 13 世纪末蒙古之行时对佛教僧人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他们剃光头发和胡子” (引自鲁布鲁克的《鲁布鲁克的威廉东行纪 1253—1255 年》第 159 页)。马可·波罗也写道：“巫师”及“其所说之地”……叫做“西藏”。他们是那些在大汗 (Grand khan) 宫廷上玩弄巫术的人，他们是“剃光头发和剃去胡子的” (引自贝纳德多的《百万》第七十五章第 65 页)。

即喇嘛。

[120] 即闻名的拉达克高僧达仓热钦，我们以后还要对他作详细介绍。  
[121]

森格国王和这个高僧是捣毁西藏耶稣会传教士的主犯。有关此事的情况是这样的：

迪奥戈称这位国王是一个忏悔了的隐士，西藏的所有喇嘛都要到荒漠、森林和山洞里进行几个阶段的忏悔和隐居生活，一些喇嘛则要到某个山洞去从事 3 年或 12 年的修炼，有的甚至终生致力于此项修炼，他们同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通过一个小孔接受食品。

这些苦修的形式似乎来自密宗最坏的形式，毫无疑问，佛陀的教理并无这些形式，为了解详细情况，建议参阅斯文·赫定的《外喜马拉雅山》第二卷第 35 节，这种忏悔的目的在于掌握人对物的统治。对此，迪奥戈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渡河时，喇嘛坐在披风或羊皮上”。从吠陀时代起，羊皮就被看作是神圣的，在婆罗门教里，羊皮是专门用来制作圣带的，而苦修者和隐士们则在打坐时将羊皮垫在身下；羊皮也是摒弃世俗的象征。

[122] 继迪奥戈的消息之后，他认为必须把从穆斯林商人那里听来的有关震旦的全部情况报告给耶稣会总会。

[123] 迪奥戈这里所说的“小西藏”是“小勃律”或吉尔吉特。

[124] 引自哈约的《关于日本、印度和波斯情况的近期书信》第 857 页。

[125] 信的精华部分是由格里罗保存的：《扎汉尼亚和耶稣会士》第二十四章 B。“基督教和全世界都可以确信，在中国之外，不存在另一个震旦”。

[126] 比如，克拉乌迪奥·阿嘎维瓦 1608 年 3 月 8 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说：“……可以这样说，这一天（鄂本笃的旅行）结束了，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一目的就是要消除人们对震旦亦即对中国的任何怀疑，在震旦不存在其他与我上面说到的（留在山西和河南的遗迹）不同的基督信仰。”

他曾向已经回到印度的鄂本笃的一位忠诚教友提起过，他在同年 3 月 6 日写给科斯塔的信中说：“他艰难的旅行并非是一个完全无益的事实，他回到印度后向印度摄政王和我们的人澄清说，不存在另一个震旦，除了中国外，从来不曾有过另一个震旦……”（引自利玛窦的《利玛窦的历史著作》第二卷第 337—338 页）。

[127] 沙勿略在写于 1598 年 7 月 26 日的信中说，西藏同克什米尔接壤，并说，他曾从克什米尔通过三种不同的途径给西藏寄来信。

[128] 众所周知，西藏被人们认为是震旦帝国的开端部分。

[129] 引自《埃塞俄比亚、马拉巴 (Malabar)、巴西和果阿 1620 年至 1624 年年鉴》第 162 页，1627 年，罗马。

## 第二章

### 西藏的发现

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了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我怀着巨大的安慰远眺群山，那位只有十三岁的超群少女的形象又重现在我的脑际：她温柔、漂亮，为了照亮一颗灵魂，她飞快地爬上爱伯罗姆山，她充满热情和喜悦，与其说她走上山顶，不如说她在困难和艰难中跑上山顶，飞上山顶。

德 阿则维多

提要：1、发现了大震旦即西藏。2、安东尼奥·安夺德神父。3、马奴埃尔·马科斯。4、旅行的机会。5、关于“发现了大震旦”的信：a) 出发 b) 在斯里那加；c) 在巴德里纳德；d) 在马纳；e) 越过马纳关；f) 在扎布让；g) 回程；h) 关于西藏的消息。

#### 1、发现了大震旦即西藏

1625年，一个敏感的消息震撼了欧洲：发现了大震旦。这种消息不是第一次传遍欧洲，然而每次都是以失望告终。



1598 年和 1599 年，沙勿略的信就已经讲到这一消息<sup>[1]</sup>。

当鄂本笃的信及其旅行以《传教会与震旦的发现及旅行之结束》为题公开发表之后，人们又一次听到过这个消息<sup>[2]</sup>。

但现在，事情似乎已经确信无疑，耶稣会的一位神父真正有了“新的发现”，大家都可以从《发现了大震旦即西藏》的报告中得知详情。

书一出版就被抢购一空，并且以各种文字翻译出版。该书首次以母语于 1626 年在里斯本出版，同样被翻译成卡斯蒂利亚语在马德里出版，一年之后即 1627 年，马德里出版了西班牙文本，罗马和那不勒斯出版了意大利文本，巴黎和根特出版了法文本，在奥格斯堡两次出版德文本。其他文本是 1628 年出版的：在逢阿木松出版了法文本，在克拉科夫出版了波兰文本，1631 年佛莱明文版本在根特出版，1646 年意大利文本在威尼斯重版，还被翻译成拉丁文出版过。<sup>3</sup>

果阿会长佛朗西斯科·德·韦尔加拉(Francesco De Ver-gara)向罗马总会长作了如下报告：“我们的又一次传教已经结束，莫卧儿传教会会长安东尼奥·安夺德神父发现了西藏，它是同中国接壤的王国<sup>①</sup>。现在我向尊敬的阁下送去有关发现这个王国的报告<sup>[4]</sup>”。

果阿会长是谨慎的，他在报告里没有提及震旦，更没有提及对震旦的新发现。现在看来，他当时那样做是对的，因为安夺德只不过发现了西藏，发现了一个同中国内地接壤的地方。会长把安夺德本人的一封信随报告送到了罗马。

那么，是谁用《对大震旦的新发现》为题，在欧洲作了夸张性的报道呢？

<sup>①</sup> 当时葡萄牙神父基本不了解西藏的情况，误把西藏古格地方政权当成独立的王国。——译者

安夺德在信里对所谓的新发现只字未提，韦尔加拉会长在信里也似乎暗示了对此说法<sup>①</sup>的不同意见（因为大家通过利玛窦的信都已知道中国就是古老的震旦）。那么是谁使用了这个题目呢？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一题目反映了许多在印度的传教士的思想，正如我们所知，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仍然把西藏叫做震旦。

## 2. 安东尼奥·德·安夺德神父

西藏是由耶稣会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安夺德发现的，他是第一个冲破了高山险阻而发现了那个富有魔力的世界屋脊秘密的欧洲人。我之所以说“他是完成了这一使命的第一个欧洲人，是因为：无论是马可·波罗，还是那个从波尔德诺内介绍西藏的鄂多立克，他们只不过向人们揭示了西藏的一些边境地区，他们也只是重复了向他们提供消息的那些人说过的东西”<sup>(5)</sup>。

安东尼奥·安夺德神父于 1580 年诞生在葡萄牙贝拉·拜萨 (Beira Baixa) 省的布兰科城<sup>(6)</sup>，他的父亲叫巴尔托洛梅奥·冈萨雷斯·安夺德，母亲叫马格丽塔。

1596 年 12 月 15 日他从科英贝拉 (Coimbra) 的公立学校加入耶稣会，当时 16 岁，一年之后与其他见习生一起到里斯本学习。<sup>(7)</sup>

20 岁时被派往印度，到果阿离圣方济·沙勿略墓地不远的地方继续学习。<sup>(8)</sup>

于是，他随印度总督亚里亚斯·德·撒尔丹哈乘圣·瓦伦蒂诺号军船远征。关于远征之事，我们已从皮门塔那里得到了证明。

1600 年 4 月 22 日，远征军从里斯本出发，同年 10 月 22 日到达柯钦，1601 年 1 月 6 日抵果阿。<sup>(9)</sup>

① 即发现震旦的说法。——译者

安夺德在果阿的圣保罗教会学院毕业之后，于 1612 年 10 月 14 日正式从事宗教职业。

其后他先在萨尔塞特传教，然后到拉合尔和果阿的圣保罗教会学院担任院长，1621 年被派往莫卧儿王国传教，并担任传教会会长。《果阿省志》载明，“安夺德于 1621 年以巡视员和传教会会长身份来到阿格拉<sup>[10]</sup>，1624 年，即他发现西藏之时，仍任院长。他著有一书，流传很久，书名为《阿格拉的耶稣会传教士之家》，这本书曾得到阿格拉教会学院的认可。他有一幢带阳台的两层住房，共八个房间，房基成 Z 型，1714 年，德西德里去西藏的途中曾在这里逗留。这座房子至今依然存在，位于卡普清修会传教士公寓之中”<sup>[11]</sup>。

关于他在莫卧儿王国任院长的期限，文件丝毫没有提到。

阿勒甘贝对他进行了这样的赞扬：“他的确是一位著名的勇士，极其聪明，机灵敏锐，富有领导能力和远见卓识，善长演说与辩论。学识渊博，尤在神学与哲学方面造诣颇深。”<sup>[12]</sup>然而，这种赞扬同碑文太相似了，不能令人满意。

对于这位受到大家爱戴和被人们尊称为“神”<sup>[13]</sup>的神父，没有记载关于他在旅途中力量、辛劳和牺牲精神的更好材料可以向我们介绍。

### 3、马奴埃尔·马科斯

天主把伟大的事业赐给少数几个人。

马奴埃尔·马科斯是安东尼奥·德·安夺德当之无愧的教友。

我们对他的经历知道得极少，威塞尔仅仅查到了有关他于 1596 年出生在葡萄牙马萨奥(?)和他 1618 年加入耶稣会的资料。

皮埃特罗·德拉瓦莱说,1623年3月7日在苏拉特遇到过一位朝阿格拉去的耶稣教友,他所说的这位教友一定是马科斯<sup>[11]</sup>。

事实上,《果阿省志》记载的正是这位教友:“1624年1月,马奴埃尔·马科斯任阿格拉人事专员”<sup>[12]</sup>。

## 4、旅行的机会

1624年3月30日,安东尼奥·德·安夺德神父和马科斯教友陪同莫卧儿国王启程赴克什米尔。

当时的莫卧儿国王是贾汉吉尔(Jahangir),他是1605年继承其父阿克巴登基的。

我们已经认识贾汉吉尔国王,因为当他还是亲王的时候就做过介绍,他当时的名字叫萨利姆,他曾与哲罗姆·沙勿略神父一起向那个自称到过震旦的穆斯林商人提过问题。

贾汉吉尔似乎非常支持神父<sup>[13]</sup>,在他周游他的王国的所有旅行中,都请神父们跟随前往。

一次,安夺德随国王等人来到德里,他去看望一队正准备出发去某地朝拜的香客,那个地方有一座很有名的塔,离德里很远,步行需要一个半月,地处德里东北。香客们告诉安夺德说,他们去那个地方已有好多年,那里的人信仰基督教。

这正是一个极好机会,安夺德决定同香客们一起去那里。

我们已从他于1624年5月16日,即离开斯里那加五六天后所写的一封信里知道了他旅行第一阶段的情况,现在把全信公诸如下。

这封信是随同果阿神父塞巴斯蒂亚诺·巴雷托写于1624年12月15日的信一起送到罗马的,巴雷托的信<sup>[14]</sup>是根据佛朗西斯科·德·维尔加拉神父的命令写给罗马总会长的。

巴雷托在自己的信里对安夺德的信作了简要说明并写了附信,我们也引之于后。

“近期以来,会长<sup>(18)</sup>去了解大西藏的传教情况,人们也把西藏叫做震旦。他这次是同三位年轻的基督教徒和马奴埃尔·马科斯教友一起出发的,可以预见此行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愿天主为他们排忧解难。在国王去拉合尔(Laor<sup>(19)</sup>)的途中,神父提出步行去西藏,他出发后不几天写来了一封信。

“安东尼奥·安夺德神父的信是在去西藏的途中,即1624年5月16日写的。

“我在离开斯里那加<sup>(20)</sup>去巴德里纳德<sup>(21)</sup>的第五天给尊敬的您写这封信,只是为了告诉我在旅途中的情况。道路极为艰难,贝尔那尔多<sup>(22)</sup>说,克什米尔道路的险峻是在平原上难以想象的。再过三天我们将进入雪地<sup>(23)</sup>,我们已经看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山峰。马奴埃尔教友病得很厉害,他得了隔日病,已犯过三次我主(Sarà Servito<sup>(24)</sup>)会降给他健康的,因为我们需要他尽快康复。我们在斯里那加碰到了巨大的障碍(grand incontro<sup>(25)</sup>),税务官检查了我们随身所带的一切物品,并拿走了我们的圣石<sup>(26)</sup>,我为此非常苦恼。此外,他还拿走了我们的两把小刀和大、小两幅童贞圣母像,他对圣母像很好奇,拿在手里翻来复去看了许久。他扣留了我们7天,然后要我们分别离开那里。上帝啊,如果您要惩罚他的话,请饶恕了他的这一切吧。我想,我们在到达西藏以前不做弥撒了,再有8天我们就到达西藏,等到了那里之后,我们就会有新的圣石,因为那里有许多非常好的基督教徒。在我不举圣事的这段时间里,由我主对我的行为作出评判吧,我们忠于上帝,我们请求上帝保佑我们对您的忠贞。

安东尼奥·德·安夺德

1624 年 5 月 16 日 丁途中<sup>17</sup>

“只要葡萄牙的神父们不叫我们放弃传教的义务，我就会告诉您，尊敬的神父，有关到大震旦传教的最新情况，我们时刻准备着完成开辟那些我们过去从未到过的国家的新路的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全耶稣会都要作出神圣的牺牲。尊敬的神父，我们非常愿意这样做：

此信系遵照省耶稣会之嘱而写。

您的不配之子：塞巴斯蒂  
亚诺·巴雷托”

### 5、关于“发现了大震旦”的信

神父在他 1624 年 11 月 8 日写于阿格拉的一封信里，对他的西藏之行和在西藏的逗留进行了描述。

1626 年，这封信被以《发现大震旦即西藏王国》为题在里斯本公开发表。

这封信的手稿至今存放在耶稣会<sup>[27]</sup>。

出版商为此信加了前言，因为前言过分夸张，所以我们不想全部引用：

“葡萄牙耶稣会神父安东尼奥·德·安夺德在 1624 年发现了大震旦即西藏王国。

里斯本

1624 年”

“由于 1625 年的巨大喜悦和伟大胜利，西班牙<sup>[28]</sup>为发现了大震旦<sup>[29]</sup>即西藏王国的消息而歌唱和奔走相告。发现大震旦即西藏诸王国一直是葡萄牙人多年的宿愿，福音实践家们经过许多艰难

困苦和危险之后，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

“我说 1625 年是喜悦和胜利的一年，除了今年是圣年<sup>[31]</sup>和伊丽莎白女王（即这个王国的主人）在今年封圣<sup>[32]</sup>之外，还因为以我们的荣光和敌人的耻辱收复了巴希亚（Bahya）<sup>[33]</sup>。此外，葡萄牙军队围歼了荷兰军队，迫使布列达（Bredà）<sup>[33]</sup>投降；英国军队在布列达东部的阴谋被击败，被我们的军队赶到西部（葡萄牙）的印度海军和军舰神秘地摆脱了敌军的围追。

“这些令人高兴的事件使 1625 年成为值得记忆的伟大一年，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神圣的陛下。

“全世界都应该庆祝伟大的埃塞俄比亚重返罗马天主教廷<sup>[34]</sup>。埃塞俄比亚是个巨大的帝国，它东西跨度为 500 来加，南北为 700 来加，它同整个欧洲大小差不多，或稍大于欧洲。

“以上两件如此光荣的事情，是天主几百年来对葡萄牙人慷慨精神和对耶稣会尊敬的神父们不辞劳苦的努力给予的安排。

“现在我们先介绍第一件事，如果上帝允许，我们把第二件放在后面介绍<sup>[35]</sup>。

“这是具有宗教精神的人们和福音‘征服者’们经过了许多世纪的努力才得以实现的一件大事，如果对它永远只字不提那将是不对的。

“关于第一件事的有关报告，我们将忠实地引用原件”。

#### a) 出发

“在这封信<sup>[36]</sup>里，尊敬的神父<sup>[37]</sup>，我将简要地向您介绍我们的西藏之行，为了不使信写得很长，同时也因为我们没有很多时间用于写信，所以，我只讲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

“1624 年 3 月 30 日，马奴埃尔·马科斯神父<sup>[38]</sup>（Marques<sup>[39]</sup>）和我从阿格拉出发，陪同国王<sup>[40]</sup>旅行，但在阿格拉，我突然身患重

病，我应该放弃这次旅行。

“我们抵达德里后，得知许多异教徒<sup>[41]</sup>准备去朝拜一座名塔，这座塔距阿格拉不太远，步行一个半月就足以到达。

“我们已从许多不同的渠道获悉，在那里有基督教王国，最近二十年来，那些传闻<sup>[42]</sup>不断地传到我们的神父那里<sup>[43]</sup>。

“这是一个机会，这样我们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到那里去，这些人可以为我们当向导，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我们想国王去克什米尔王国，有一个神父陪同就够了，在他从克什米尔返回的同时，我们也返回，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拉合尔会合。于是，我们决定去探索这些民族。

“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后，我们作了必要的准备，任命弗朗西斯科·库尔西<sup>[44]</sup>神父为会长。我毫不怀疑我的决定有违背您的愿望的地方，但是，我肯定这一事业将给上帝增添巨大的荣耀。这里的住所<sup>[45]</sup>暂时不再需要我们了，于是我们启程去西藏，下面是我们去西藏的方法：

“一天清晨，我们穿着莫卧儿人的衣服，非常秘密地离开了德里。一出德里城门，趁着天还未亮，我们脱去了外面的衣服，换上罗马人紧身衣，并戴上了伊斯兰教徒帽子，启程向西藏进发。

“大家对我们的事都一无所知，以至那些同我们一起从拉合尔出发的基督教徒和小伙子们也不知道我们去干什么。

“我们绕开了皇家大道，穿过王国<sup>[46]</sup>领土，尽量寻找捷径，15天之后，我们来到了印度斯坦边境的山脚下，再往前去就将进入斯里那加王国。就在离开莫卧儿王国、进入斯里那加领土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莫卧儿王国的边防哨卡把我们当作莫卧儿的逃犯拦截住了，他们不让我们过去，而且还要根据命令把我们送交国王<sup>[47]</sup>。

“哨卡的人看到我们未带货物，肯定我们既不是朝圣的异教



徒,也不是商人<sup>(48)</sup>。

“而斯里那加的居民们由于一直畏惧莫卧儿国王,他们把我们当成了莫卧儿人的侦探。

“在渡过这些难关后几天,所有道路似乎都对我们关闭了,上帝做了我们的向导,我们只能听从上帝的旨意,这也是我们比行的光荣。

“我们怀着巨大的喜悦,非常小心地攀登山峰<sup>(49)</sup>。

“我以为这就是世界上最险峻最高大的山脉了,我无法向您讲述我们在登山时所遇到的困难。只要告诉您,我们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还没有翻过一座山峰,您对我们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总是在很高的山峰之间爬行,那些山道很窄,经常只有一只脚宽,我们走过时总要用手扶住岩石,以防滑下去。如果我们走错一步,有可能我们不等摔到底就会粉身碎骨。

“这里峰峦起伏,高耸入云,其险峻山势似乎只有在图画中才见过。

“在深深的谷底,奔腾着的恒河汹涌澎湃,巨浪击石发出轰鸣,回响在山谷之间,震耳欲聋,增加了我们的恐惧感。下山的道路同样是困难和危险的,甚至连像上山时那样手拉着手都难以做到,有时还要像下梯子那样,两手反撑石壁,脊梁紧贴着岩石。

“激励我们克服困难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与同行者的异教徒们怀着巨大的喜悦去朝拜他们的上帝,而我们则是为了耶稣即我们的上帝的荣光。第二点是异教徒中好多人比我们年老,行将就木,身体比我们弱得多。

“这使我们羞愧,但也鼓励着我们继续前进。

“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往前走(因为道窄,不能二人并行),并且一边走一边呼喊他们所崇拜庙宇的神万岁:‘巴德里纳德万岁’,一人领头喊,其他人跟着呼<sup>(50)</sup>。

“我们听到这些发自地狱般的声音时，倍感痛苦，因为我们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表示我们对一个可憎偶像的仇恨，只能和着他们的口号节拍，暗暗地诅咒他们的偶像，并请求上天以我们的名义向我们尊敬的耶稣表示同样的夸耀和光荣。

“从我们出发后的第二天起，每隔一箭之地就能看到一座庙，这些庙装饰得非常华丽，都点着灯，造型各异，但所有的庙都是可憎的和可笑的。

“在这些庙里有许多瑜伽<sup>①</sup>，他们全都打扮成魔鬼仆人的模样。在他们当中有一位老人，留着长指甲，头发长而蓬乱，样子很难看，我们认为他是山人扮成的魔鬼，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讲话，接受异教徒们的颂扬和赞誉。异教徒们都俯伏在地，亲吻魔鬼的双脚。两个月以前，我曾与我们的国王<sup>②</sup>一起看到这种情形，那次的那个瑜伽打扮得更加难看。那次，国王去阿格米尔<sup>③</sup>(Agmir)<sup>133</sup>狩猎，阿格米尔依湖而建，我们恰好遇上异教徒们聚在一起搞迷信活动：一名瑜伽，披着足有 4 尺长的头发，指甲比手掌还要长，样子非常吓人，他还无耻地完全裸体，许多异教徒排着队挨个亲吻他的脚。

“那位瑜伽知道国王来到自己面前时，毫无反应，根本没有对国王有一点恭敬的表示。

“打猎回来之后，国王遣人去叫瑜伽。

“瑜伽回答说，如果不用国王的轿子去抬他，他就不来。国王听说之后，命令揪住他的头发，把他从地上拖过来。国王见到他时问他究竟是鬼还是人，并说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他更难看的東西了，然后命令先剪掉他的头发和剪去指甲，同时对他的高傲进行惩罚，在给了他一顿鞭笞之后，又把他扔进了杂货铺。最终，在一伙年轻

① 瑜伽，即瑜伽行者，是印度教的苦行僧。——译者

② 即莫卧儿国王贾汗吉尔。——译者

人的刀剑威逼下，他用异教徒们朝拜他的同样态度对国王进行了称颂和赞扬。<sup>[52]</sup>

“关于瑜伽的事我只想说到这里。

“现在再回过头来讲讲那些山脉。

“在绝大部分山上，山腰以下长满了树木，特别是大小不一和各种品种的松树，有些与我们的差不多，有些比我们的纤细且不结果实，但这种瘦高松树的木质很好，它们长得又高又直，毫不夸张地说，它们要比果阿‘好耶稣’塔高到两至三倍<sup>[53]</sup>。

“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了许多挂满了果实的桃树和梨树，还有桂皮树、枣子树、柠檬树，我们也看到了大片开满了鲜花的玫瑰园、野桑林，黑桑葚与我们的的一样，红桑葚像杨梅，味道很好。

“我看到有一座山上长满了圣·托马索树<sup>[54]</sup>，无叶，但开满了鲜花，有白花，也有同我们在印度看到的那样，树枝互相交错在一起，整座山就像一个花卉之林，或者说就像一朵鲜花。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美的东西。那里还有无数像栗子一样的树<sup>[55]</sup>，但不结果，美丽漂亮的鲜花压弯了树枝，一串花就像一株小小的丝衫，造形如此之美，是自然界里绝无仅有的。

“那里还有许多与我们花相似的花：各色各样的百合、玫瑰和其他叫不出名字的鲜花，它们既很少见也很漂亮。在许多地方还可以看到大片长满了罗勒<sup>[56]</sup>草的土地，这种草与我们那种草也很相仿，只是叶子比我们的小。

“这一切使得这些山脉更加令人喜爱，也使旅行者得到一些安慰。到处都可以看到山泉，一些从高陡的山岭直泻而下；另一些则从石缝里冒涌出来，沿着山道缓慢而流，所有的泉水都如此清澈、如此凉爽，人们不可能找到比这些泉水更好的泉水了。”

b)在斯里那加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斯里那加，土王就在这里。

“这是这个王国里唯一的大城市，这里居民众多，市面繁荣，乡镇毗邻，<sup>[57]</sup>这个地区的风俗习惯同印度斯坦人迥然不同。

“例如，这里屠宰绵羊或者山羊时并不放血，而是把它们勒死，他们说不放血的羊肉更有味道，他们也不剥掉羊皮，而是把羊连皮放在火上烤而食之。

“这里的人通常不穿鞋袜，他们的脚都很粗糙、坚硬，所以他们可以在尖石头和荆棘上行走，而且脚板不会被扎破<sup>[58]</sup>。

“这个城市的人们对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盘查，他们问我们是什么人，问我们此行的目的何在。

“我们不能再自称是商人了，因为人们已经知道我们并未携带货物，所以我告诉他们我是葡萄牙人，想到西藏去寻找一位兄弟，有消息说他已到达西藏多年。他们打开了我们的行李，发现了我们的黑色法衣，于是他们问我们为何带这样的衣服。我告诉他们，万  
一我要找的那位兄弟死了，我们就要穿上这黑色的长袍，因为黑色衣服是我们那里的孝服。

“他们相信了我的话，以为我真有一位兄弟在西藏。

“5 天之后，由于上帝的特别恩典，他们放了我们<sup>[59]</sup>，我们立刻就离开了这里，继续翻山越岭，但这里的山已不像先前的那样险峻了。又走了 15 天，我们来到另一个山区，这里白雪皑皑，再也看不到树木和清泉了，有的只是寒冷。

“我们多次渡过恒河<sup>[60]</sup>，我们不用再像以前那样绕道渡江，也不用爬越架在江上的索桥<sup>[61]</sup>。大段的江面上覆盖着冰块，我们经常踏冰过江，但这些冰块常常发出断裂的响声。

“开始时我不明白，即使雪下得再大，怎么能将流水浩浩荡荡的江面覆盖住。后来我想，这些雪也许是从山上下滑到山下然后倾注到江里，而这些雪在向江里滑溜时已经结成了又大又厚的冰

雪块，才不致于一掉到江里就完全融化。

“漂在江上的冰雪块上经常有巨大的窟窿，从冰雪上面过江的人感到极端害怕，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进这些窟窿，万一掉进窟窿就会葬身鱼腹。”

### c) 在巴德里纳德

“越过这些山脉又走了几天时间。一个半月之后我们来到了巴德里纳德庙，这座庙位于斯里那加的边境地区<sup>[62]</sup>。

“来这里朝圣的人很多，他们有的甚至是从很远的印度的锡兰(Ceylão)和比斯那加(Bisnaga)<sup>[63]</sup>来的。

“有两位锡兰的年轻人与我们从果阿一起来到这里，但朝圣结束后他们已囊空如洗了，他们担心靠求乞是否能够维持生活。

“我资助了他们，给了他们一些巴扎卢克<sup>[64]</sup>，作为他们返回果阿的盘缠，但他们知道我们是异教徒，而他们是不能接受异教徒施舍的，所以说只能以商人或 Baneanas<sup>[65]</sup>的名义接受这些钱。

“这座庙建在山<sup>[66]</sup>脚下。那里有许多喷泉，泉水非常清澈，其中有一眼温泉，水很热，热得烫手，这个温泉的水向三个方向流去，形成三个池塘，池塘里的泉水已经较凉，朝圣的人都要到里面洗澡，他们认为此水可以净化灵魂，去除邪气。这些人一生中享受不了几次洗圣水澡的幸福<sup>[67]</sup>。

“这座庙正好建在泉眼那里，商人们为这座庙宇和这眼泉水编造了许多无稽之谈。比如他们说，火是万恶之源，给世界带来了许多灾难，烧毁了住房和财富，摧毁了田原和森林。因此人们就向巴德里纳德的神灵求救，希望摆脱这些麻烦。神灵告诉他们，如果能把他留在泉水边，一切邪恶都会消除。因此人们就在这里建了这座庙，把神灵供奉起来，火就被神灵踩在脚下，从此，这里的泉水就变成温泉了。我问他们，如果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火已被神灵踩在脚

下，如此驯服和安静，那么火为什么还象以前那样在世界之作威作福？他们回答我说，现在世界上的火种是组成火的十五分之一，火的其余部分已被神灵踩在脚下，为这里的泉水加温，跑掉的那一分火种继续像以前那样，在世界上做坏事。他们还说，过去，不管是木头还是石头，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只要一经神灵之手都可以变成金子。有一天，来了一位铁匠，这是一位贪婪的铁匠，他带来了许多铁块，并把这些铁块扔进了巴德里纳德的火里，想使这些铁全部变成金子。但是他的贪婪触犯了神灵，从此以后，神灵不再愿意把废物变金子了。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举不胜举。

“人们献给庙里的供品是无法计算的，有人说这座庙里有大量的金、银、宝石，都是进贡物<sup>(58)</sup>。

“一年之内除了三个月之外，这座庙埋在雪里，附近的村庄也无法居住，这里的村民都迁徙到离村庄有三四天路程的其他地方去，那里的雪要少得多。<sup>(59)</sup>

“尽管这一地区的居民也属于斯里那加王国，但人种却与其他地方不同，语言、习惯亦相异。他们吃生羊肉，仅把羊皮剥掉就吃，特别贪食肥肉和腿腱。他们还爱吃牲口内脏，也是生吃，他们把刚从牲口身上取下的内脏切成碎块，在水里稍洗一遍，就吞而食之。

“有些人也将肉煮一下才吃，但煮的时间很短，水开一遍，他们就把肉取出。因为他们说，肉煮得太熟了就会丧失味道和营养。他们吃雪，就象我们吃面包或者点心那样。

“一次，我看见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吃一块很大的雪块，我想这样会把孩子吃坏的，于是就叫他把雪块扔掉，并给他一些庙主给我们的葡萄干。他接过葡萄干，尝了尝，马上扔掉了，并大声哭喊，还要他那块雪块。这里几乎所有的小孩，包括那些比他还小的孩子都吃生肉、里拉(Lyra)<sup>(70)</sup>饭和其他谷物，他们长得都很健壮，丝毫没有印度小孩常见的肚子疼病。这里妇女耕耘、播种，男人纺纱。妇女

们还用一种形似芭蕉的树叶装饰自己，他们把树叶卷成两个纺锤似的饰品挂在耳朵上，就像耳环，‘纺锤’很大，差不多有一掌半那么长。<sup>[71]</sup>”

#### d) 在马纳

“我们逗留的最后一个村庄叫马纳 (Mana)<sup>[72]</sup>。我们在那里呆了好几天，希望那片闻名于世的荒漠上的雪能够融化。这片荒漠很大，一直延伸到西藏，一年之内只有两个月可以越过这片荒漠，在其余时间里荒漠上积满了深雪，难以行走。

“从这个村庄开始，山变得越来越高，在仅有的两个月中，翻越这座高山就要花 20 天的时间<sup>[73]</sup>。

“这里没有人烟，因为这块地方是无法住人的，也没有树木花草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山崖上积满了雪，雪块不时地滑落到岩石上。

“然而，在这可以通行的两个月里，山脚下的土地有时裸露着，即使有些地方被积雪覆盖，雪也是冻得结结实实，人可以很容易地从上面通过。这里没有木柴或者其他可以生火的东西，所以，旅行者所带的食品都是炒过的大麦面<sup>[74]</sup>，随时可以用水冲而食之。我们没有喝过一次热水，因为这里无法生火。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荒漠里的生活，不少人曾经葬身在这里。有人讲，这里的土地蒸发一种毒气，人一旦触及，哪怕是一只手，一只脚碰到这种毒气，他在一刻钟之内就会死掉。但我以为造成死亡的原因在于这里的高寒和缺少食品，人在失去了必须的热量之后，就会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死去<sup>[75]</sup>。

“俟道路可以通行，巴德里纳德的庙主就向西藏国王提出允许商队进入其领地的请求，并送去礼品。我们等待了几天，希望能与第一批商队同行，但与此同时我们产生了疑问，并看到了一些迹

象：斯里那加王想扣留我们，不让我们继续前进。当我们的疑问得到确认之后，我们产生了巨大的痛苦。我们在经历了千辛万苦走过许多路程之后，进入西藏的希望也许会就此而丧失，而进入那片领土对于我们实现‘诺言’<sup>[76]</sup>是具有最高价值的。我们在经过了无数讨论之后，决定把事业交给上帝，我们的事业就是上帝的事业，所以我们商定偷偷越过荒漠，尽管气候还不合适，但我们对天主的特别帮助和保护从未有过怀疑。

“我们掌握了在荒漠行走的所有情况之后，决定了出发时间。为了表现出我们并未因庙主的态度而感痛苦，我把教友（马科斯）留在了村里，我在一天黎明偷偷地登程出发了。”

#### e) 越过马纳关

“我由两位年轻的基督教徒陪同，带了一位山民当向导。我们每人带了一床被褥<sup>[77]</sup>和途中必需品。

“尽管冰雪给我们造成了巨大困难，使我们的旅行非常劳累，但我们在开始的头两天还是迅速赶路。第二天早晨，有 3 个山民来到我们身边，他们是当地官府派来的。他们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想遭受严重不幸，那就跟他们一起返回原地。然后他们又对我们的向导说，他家里的东西已被抄光，老婆和孩子也被抓进了监狱，如果他不马上回去，他们有可能被杀掉。说完又来威胁我：我的教友已经承认了我的罪过，我们的物品有可能被没收。但他们特别强调，如果我一意孤行继续前进，我将会死掉，因为越过这片荒漠的合适时候还没有到来。

“我们的向导被吓住了，他立即回返。而我，向他打听了有关前面道路的情况，祈求耶稣和上帝的帮助，同两个年轻人继续前进。困难越来越严重，我们经常陷进雪里，难以自拔；积雪淹没了我们的膝盖，有时还淹到胸脯、肩膀。



“从雪里爬出来的困难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得多。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面临许多危险，我们经常为此出冷汗。我们经常将整个身体躺在雪上面，采用游泳的姿势向前爬行，这样我们才不致于陷得很深。我们就这样继续我们的旅行，夜里睡在雪上，我们必须把一床被子铺在雪上，而用其他的两床被子盖住身体。

“每天晚上遇到的灾难是最为严重的。每天 4 点钟左右就开始下雪，几乎整夜不停，尽管我们手拉着手，但下雪时我们彼此看不见，下雪时还刮着刺骨的狂风。雪经常成堆地压在我们的被子上，我们必须起来把雪抖掉，否则就被雪埋掉。

“由于奇冷，我们的手和脸都失去了知觉。有一次，我一只手指的一块皮冻掉了，但我一点疼也没有感觉到，如果不是看见流血，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脚都冻肿了，并生了冻疮，我们用碳火和热铁烘烤，但一点感觉也没有。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事：一是难以忍受的呕吐，二是缺水，因此我们就不能吃饭，我不记得我何时还遇到过与此相似的逆境。我和陪我旅行的两位年轻人，被迫寻找克服这一困难的方法。缺水是最为严重的，而我们又是多么需要水啊，尽管天很冷，但旅行疲劳之后我们同样感到很渴。缺水的原因不是在于这里没有水源，而是所有的水都从雪底下流走，恒河已被冰雪封盖住，一切都被冰雪封盖住了。

“因此，我们吃雪，只有在太阳最热的时候，我们才能用铜盘化雪。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前进的。一天，我们终于来到了山脉的最高处，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池塘，这是恒河的发源地，发源于这里的还有另一条河，它流经西藏<sup>[78]</sup>。

“来到山顶时，我们几乎都已双目失明，尽管我保护眼睛的方法比两个年轻人强<sup>[79]</sup>，但也未能逃脱雪盲的危险，只不过是比他们眼睛发病晚一些罢了。我已几乎是一个瞎子，难以辨认日课经的

字句,所以,差不多有 25 天没有朗诵圣经了。

“越过关隘之后便是西藏的广阔平原,但由于我们的视力不够,什么也看不清楚,我们看到的是白茫茫的一片。这里再也看不到人们告诉过我们的路标了,我们已无法选择去向,失去了到达目的地的希望。也许这里离王国首都只不过 5 米加的路程<sup>36</sup>。但我们认为不能继续前进了,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白色平原。此外,食物已经吃光,我们都精疲力尽。

“我要给两位年轻人脱鞋穿鞋、揭被盖被,还要把食物送到他们的嘴里。

“我和他俩商量,我们该怎么办?一天夜里我们决定,要他们两个人在一天早晨返回教友所在的那个村庄。

“如果用行军速度,他们可能用 6 天时间就能到达那个村庄。

“我将一人留下来,呆在那座高山的脚下,那个地方很潮湿,由于一块巨大的岩石挡住了风,这里的雪有些化开了。

“那里有许多水,我还有足够八九天用的食物。

“在这段时间里,教友可以从村子里给我送来食物,或者由上帝给我派一个向导,一直送我到达西藏。

“早晨来到了,我想与两位年轻人告别。我已吩咐过他们,路上要小心谨慎,但好在全是下山路,又都很熟悉。我告诉他们,他们和我的生命都处在危险之中。我正讲话的时候,他俩突然嚎淘大哭,简直跟孩子一样,他们对我说,如果没有我,他们一步也不愿意走,他们不同意那天夜里的决定,不愿意与我分开。没有任何方法能让他们改变主意,这当然是上帝的旨意,否则,他们肯定是就死在返回的路上。这样,我被迫同他们一起返回,但我们害怕一到村子里就会被抓起来。回去的道路是下坡路,很容易走。

“我最大的担忧是让这两位年轻人走路,他们将要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他们的脚已经冻坏到如果没有人搀扶就难于站立

的程度。就这样，我们一起走了 3 天半，在第四天傍晚，我突然听到一种声音，象是一个人在荒漠上呼叫的声音。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此我们就朝发出声音的地方走去，不一会儿就遇到 了 一 个人 。

“他马上告诉了我们有关教友的消息，他说，是教友派他来见我们的，它是马纳的村民们派他来的，他们很为我们操心，村民们回想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很担心我们会发生什么不幸，并担心我们这样做会引起西藏王的烦恼。

“此人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安慰！我们从他那里得知教友很好，我们也知道了马纳并不想扣留我们，村民们还向巴德里·纳德麻主进行了捐献，以使我们能够出发。教友还给我们带来了村民们预备的部分食品和一些蜂蜜，食品是用大麦面炒的，还带来了一些御寒的衣服。

“我们在新来的村民带领下，又走了 3 天时间，终于来到一个积雪较少的地方，那里有几个岩洞，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岩洞里暂时栖息了。

“从这里继续前进来到一个村庄，我们整整走了 3 天。我们在这个村庄休息了几天，等待教友的到来。为了我们，他和商队已提前出发了。当教友来到我们身边时，如果他不拥抱我，我再也不认识他了。

“尊敬的神父，您想，我们见面时有多高兴！我从不相信我有多大的力量，也没有想到我在这次旅行中表现出的力量，那些认识我的人大概也不敢想象。

“教友来到之后，我们一起在那个村庄住了几天，等待冰雪稍微融化，我在雪里走了差不多一个月，这次我们重新登程时，道路已经很好，再也不会遇到前段旅途中遇到的痛苦了。唯一不足的是我的视力不够，但当我看到这次陪同我们的村民们，出发后不几天

也都眼睛发炎时，我的视力不够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他们生长在雪中，但也要用一种网罩住眼睛，以防止冰雪反射的太阳光灼伤眼睛。

“在此期间，西藏王<sup>181)</sup>已经获悉我们即将到来<sup>181)</sup>，他派了两名侍从来接应我们，并吩咐与我们同行的商队成员尽最大努力照顾好我们，把我们当成他最敬爱的人对待，还写信祝愿我在他的土地上感到愉快，他将为我提供一切方便。此后，有人写信告诉西藏王，说我们是非常古怪的人，在他们的土地上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这样的人。在我们抵达前 3 天<sup>182)</sup>，藏王派来了 3 匹马，两匹是为我们提供的，还有一匹是给一位年轻人预备的。”

#### 1) 在扎布让

“我们到达城市<sup>183)</sup>时，所有男人都站立于街道两旁，妇女们则透过窗户看我们。国王立即让王后接见我们，当她在宫殿的阳台上接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向她赠送了礼品。接见完毕后，我们来到了为我们准备好的下榻地方。

“因为有人写信告诉藏王说我们没有带什么货物，所以国王以为我们可能带有珍珠和珍贵手饰，否则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如此艰苦的旅行？”

“当他知道我们不是商人，未带来他所希望的珍贵织物之后，就不像我们刚来时那么热情了，有两三天不直接同我们讲话<sup>184)</sup>，而是通过别人打听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

“我请来人转告国王，我不是商人，我所以来到他的国家，既不是为了出售我随身所带之物品，也不是为了购买他让人提供给我的商品，如果国王愿意了解我来到这里的原因，我请求国王允许我当面陈述，我只要一小时就够了，我相信国王将对我到来的原因感

西藏王，即古格王姆扎西查巴德 (khzi bkra shis grags pa lde) 译者

到高兴。

“国王同意了我的请求，同国舅一起接见了我们。担任翻译的是克什米尔的一个穆斯林，我向国王解释了我此行的目的。我告诉他，为达此目的，我历尽艰辛来到他的宫廷，核实我所听到的关于他是基督教徒和关于他和他的人民奉行真正的耶稣教律的消息。如果国王允许，我愿意随时向他指明他们宗教的错误所在。我还告诉他，正是由于国王拯救灵魂的愿望，我才远离祖国、告别兄弟朋友，不辞千辛万苦来到这里的，所以我希望他利用上帝恩赐给他的机会。在过去的岁月里，上帝没有把这样的机会赐给他的先辈，因此希望国王不辜负上帝赐予他的恩典。

“穆斯林翻译听完我说的到这里的原因后，对我的话采取了偷梁换柱的办法。尽管我不懂藏语，但我从他的态度可以看出这位翻译欺骗了我们，因此我对翻译进行了必要的威吓：如果他不把我说的一切忠实地转告国王，我将严肃地责罚他，而且我将请另一位异教徒当翻译，把他所不愿翻给国王听的话告诉国王。但他翻译给国王的東西已经足以使国王了解我们，国王甚至告诉我们，在他看来，我们比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好得多。<sup>[85]</sup>王后在我们隔壁的一间屋里听了我们的对话，她让人告诉国王，她想见见我们。于是她来到我们面前，站着跟我们讲话。在以后的对话中她一直没有离开过，她对我们不懂他们语言表现得很不高兴，因为她很愿意听我讲我们的教义。这位王后是一名谨慎得出名的女人，她在我们对话中的问、答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们的对话进行了好久，国王和王后让我们先回住处，并表示愿意再和我们畅谈有关拯救灵魂和我们的圣律。一天后，我一大早就被他们叫去了，因为福音所讲的那粒小小的芥籽，已在国王和王后的心田里植根，并正在带来巨大的成果。

“从这次以后，一直由一位异教徒担任我们的翻译，我花很长

时间讲解了我们的教义，告诉教义的主要奥秘所在，国王和王后怀着极大的喜悦倾听我们的讲述。自那以后，他们再也离不开我们，对有关天堂的事情总是百听不厌，尽管他们对我们所讲的一切不能完全听明白，因为我们的对话要通过三道翻译，而这些翻译又对我们谈及的内容知之甚少。

“国王还发布了一条命令：我们可以随时进入宫殿，那怕是在禁止别人进入的时候。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我们几乎每天都收到他们馈赠的礼物：羊肉、大米、面粉、黄油、糖<sup>[30]</sup>、葡萄干、葡萄酒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国家自己生产的。由于送得太多，我们常常又将这些东西施舍给别人。

“葡萄干有两种，一种黑而小，但很甜，很好吃；另一种白且大，但太干，而且酸涩。这些葡萄干和葡萄酒都是从这个王国的另一些城市运来的，那些地方离这里步行需要 10 到 12 天。”<sup>[31]</sup>

“许多天过去了，离返回的时间越来越近，因为我们必须在大雪封山之前返回到印度。我们几乎每天都请求国王允许我们启程，但他总是不给予肯定的回答，他要我们答应明年再来。否则他就不让我们走，但当时我们不能预见明年再来的可能性。

“由于国王如此挽留我们，我就回答他我明年一定回来，我相信我的大喇嘛<sup>[32]</sup>会同意我再来的，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国王必须接受我请他加入我们宗教的建议。首先，我要求享有在他的国家传教圣经的充分权利，任何人不得对我设置障碍；第一，指定一个地方建筑教堂；第三，即便国王有从我们的土地上获得商品的愿望，我也不从事商业活动和与商人有关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违背我们的教规。如果葡萄牙商人将来进入西藏，我们将不与他们进行买卖往来，否则也将违背教规。此外，国王不得听信克什米尔穆斯林反对我们的谗言，因为他们反对我们的教义。我们讲到这里时，王后插话说，穆斯林是坏人，他们的宗教同西藏的

宗教也是相互对立的，因此他们禁止穆斯林在西藏居住，只有经商时，他们才可以在这里逗留。

“国王和王后立即接受了上述条件，在盖有玉玺的纸上写下了以下内容：

‘我们，大西藏王国<sup>(89)</sup>的国王非常愉快地接待了弗朗吉姆(Frangim)<sup>(90)</sup>神父安东尼奥，他来到我们的土地上，是为了向我们传授圣经。

我们视他为我们的大喇嘛<sup>(91)</sup>，并给予他向我们的人民传播和教导教义的充分权利，任何人不得对他干扰捣乱。此外，我们还将向他提供处所和必要帮助，修建祈祷教堂。我们还愿意高兴地看到，在弗朗吉姆商人来我地经商时，安东尼奥神父及其教友不与他们进行买卖往来，因为那将违背他们的教规。我们将永不相信穆斯林旨在反对神父的挑唆，因为我们已经清楚地发现，穆斯林没有自己的教律，而且他们反对遵循真正教律的人们。我们热烈地请求大神父<sup>(92)</sup>尽速派安东尼奥神父到我地来，以拯救我们的人民。×年×月×日于扎布让(Chaparangue)，盖国王玉玺。

“国王还交给了我们另一份波斯文文件，此件亦由国王签字、盖有玉玺，这份文件是针对穆斯林的。国王在文件里命令所有同西藏有贸易关系的阿格拉和拉合尔的穆斯林，从今以后，只要我或者其他神父一声召唤，他们就应该按照我们的吩咐去做，把我们的事情当作他的事情办，还要把我们的东西当作他们的东西那样带到西藏。国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我们避免进贡和付税的麻烦。

“国王第一次与我们谈话时，我们发现他对我们那里的事情知之甚少，他对我们带去的印在薄片上的圣母怀抱熟睡的耶稣婴孩像深感好奇<sup>(93)</sup>，王后对此也完全无知，尽管他们也有许多漂亮的绘画。

“在我向他们解释了圣母怀抱耶稣像的意义后，他们的兴趣陡增，国王找到了萨尔塞特制作的一些十字架和一些圣人遗骸盒、耶稣圣母容，以及一些苦带和苦鞭<sup>[94]</sup>，他要我们对所有这些作详尽的讲解。几天以后，国王的内心深处对我们和我们的宗教教律产生了敬慕之情，并要求我给他、王后、王子和王孙赠送一些圣物。我没有马上满足他的要求，希望他的愿望和恭敬得以进一步发展，但他向我多次重复上述要求，并说，上帝将要赐给他的那些东西，将是他对付敌人的武器。

“最后，也就是我们出发前两天，我用纸包了 7 副十字架，拿到王宫送给了国王、王后等 7 人，国王要我把这些十字架亲自分发给各人，我就这样做了。

“国王摘下帽子接受了我赠给他的一副十字架，他立即把十字架举到眼前，然后举到头上<sup>[95]</sup>，最后以最大的恭敬为十字架串上金链，并把它挂到了脖子上。王后、王子、国舅、王孙都照着国王的樣子接收了十字架。

“当晚，国舅作为将军出发去指挥非常危险的战争，他告诉我，他对圣十字架充满了信心，他确信我主会使他摆脱一切危险。事实上，他非常容易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获得了巨大荣誉。

“我还给他们每人的脖子上挂上了一件圣人遗物，他们以和我们同样的巨大恭敬、虔诚与崇拜神情对待这些圣物。次日，他们都以最恭敬的心情把这些圣物放在丝绸盒里，佩带在身。

“最后一天，我和国王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我向他告别时送给他一幅圣母怀抱耶稣婴孩像，并对他说，如果我不能肯定他将给予巨大的尊重和恭敬对待这幅圣像的话，我是不会放弃圣像的。我把圣像作为最珍贵的宝物和坚不可摧的力量留给了他，他能够而且应该不惜冒灵魂和肉体上的一切危险加以保护。

“但是，当这幅圣像在国王和王后头上摩顶之后，我们在请国



王双膝跪地接纳圣像方面遇到了困难。当时许多人在场，国王请我向他们表演一遍，我很高兴地做了示范，这使在场的人得到了安慰。我光着脑袋，双膝跪地，以特别虔诚和恭敬的心情双手高举着圣像，然后我想把圣像交给国王，但国王请我将圣像带回住所，以便他们准备一个合适的地方供奉圣像。

“我带着圣像离开宫殿，但在下面的一个殿里遇到了管 财政的官员，他身边带了很多入。

“他说已有人告诉了他有关圣像的事，他请我也把圣像打开给他看看。突然，他的一个随从出于好奇，也想看看圣像，没有人告诉他这是一幅价值昂贵的艺术珍品。我有点认识这个人，没等他讲完，我就把已经展开的圣像收了起来，并告诉他，所有圣品都不能当作稀奇欣赏，只能怀着崇敬的心情去观看。那位官员当即尖锐地批评了这位随从，尔后再次请求我将圣像展开，并向我表示，他希望观看圣像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出于倾心崇敬。

“这位官员和在场的人都虔诚崇敬地观看了圣像，当我们看到圣母怀抱里的耶稣受到离我们如此遥远和陌生的人们的崇敬时，我们激动得流泪了。

“我没有给国王和王后行洗礼，也没有足够的时间给他们讲解教理，同时我也担心给他们行洗礼和讲解教理之后，他们又放弃对我教的信仰。

“这就是我们离开王国前所发生的一切。”

#### 4) 回程

“在我们出发时，国王和王后对我们的喜爱得到了证明<sup>[96]</sup>：他们以最大的殷切恳求我们再来西藏，并请我们带走他们的心情。国王还派了一些人陪伴我们，要他们不仅把我们送出他的国上，而且要送我们越过荒漠，他还命令沿途的村庄每天给我们送羊肉、大米

和黄油<sup>[97]</sup>，他事先并没有把这些事告诉我们。在我们登程 3 天之后，国王又派来了 3 个人，他们给我们送来了 6 篮无花果，足足有两千个，果子虽小，但味道鲜美<sup>[98]</sup>。国王还让来人告诉我们，无花果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这个地方距西藏有 12 天到 15 天路程，他所以派人送来这些果子，是为了表达对我们的尊敬和热爱。国王还请这些人询问我们旅行的情况。我们也请来转达我们对国王的感谢，感谢国王对我们的巨大关怀。

“进入荒漠的山区之后，尽管他们要求继续陪送我们，因为他们害怕没有国王的命令就过早地离开我们，会受到国王的责怪，但我们还是请他们回去了。

“我们出发后不久，国王遭受了严重不幸：不仅他的 3 个土王 (Raja)<sup>[99]</sup> 即 3 个小邦联合起来造反，而且就在国王发兵平息距离国都很远的敌军时，斯里那加的国王也乘机派兵向国王发难。也许这 4 个土王已事先商定联合起兵的。

“上述进兵是非常秘密地进行的，直至斯里那加王的军队来到西藏王国国门时，西藏才得知。

“然而，西藏王对斯里那加王举事并无丝毫惧怕。他命令靠近斯里那加的军队去迎战进攻的 3 路小邦，就在这时，斯里那加王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从斯里那加通向西藏的 3 条道路，禁止任何人通行，以防走漏风声。

“其中一条道由 1 万 2 千人占领，他们带有 1 万 1 千支火绳枪和 20 门火炮；另一条道由一支 2 万人的军队占领；占领第三条道的士兵则比其他两条道的士兵要少得多。<sup>[100]</sup>

“第一路军队抵达西藏的第一个城堡的当天夜里，就向守卫在这里的藏军发起了进攻。这里的守军虽然只有 30 名，但他们奋勇作战，差不多杀死了 300 敌军，一直冲到敌军主营，然而未能捉到主帅，只砍倒了一面军旗。但终因人数极少，不敢恋战，而撤回城

堡，准备伺机打击敌军。几天之后，他们打退了敌军。

“敌军有些害怕。事实上，西藏人很勇敢，并且善于用枪，而斯里那加人都是山民，他们只会种庄稼。除此之外，那几天又下了很大的雪，这给军队造成了很大伤亡。另外两路军队的侦探遇上了西藏人，并被逮住，他们拿出了巴德里纳德长官的一封信，并说他们是到宫廷去进行和谈的。就这样，他们逃避了处罚，他们回到自己的村庄后告诉我们说，西藏王问他们的第一件事是，是否得知我们的消息，我们在哪里，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让我们通行。当知道我们路过他们的村庄时各方面情况都很好时，国王很高兴。另一路军队从另一方向到达西藏，但他们一事无成，并且遭到了西藏骑兵的坚强狙击。当时，斯里那加将军看到败局已定，因此请求和解。事实上，他们已被藏军围困在山谷里，那里是斯里那加军队后援的必经之路，这就使斯里那加军队陷入了严重困境，进退两难：退无后路，退路已被藏军堵死；进又害怕，他们已经尝到了藏军的厉害。

“当时我们正到达马纳，我们很担心那位被如此众多的军队包围了的好国王发生什么不幸，所以我们坚持请求上帝帮助他，上帝是热爱和平的，我们也祝愿西藏王尽快与斯里那加王达成和解，同时祝愿他战胜并彻底征服造反的 3 个土王。这就是西藏国王当时的处境。”

#### 1) 关于西藏的消息

“西藏的土质及其人品。

“如果人们得到的消息是正确的，那么，西藏的领土应该是广阔的，似乎还是很好的可耕土壤，那里水源丰富，我们还看到那里盛产小麦、水稻，还有葡萄、桃等水果，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这些。然而，我们所到的西藏首都却是一片非常贫瘠的土地，它是从印度进入西藏后第一个城市，那里只产少量小麦，因为城郊的部分土地

可以引河水浇灌。那里牲口很多，有绵羊、山羊和马，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因为蔬菜只能生长在靠近水源或可以灌溉的土地上。那里一眼望去看不见一棵树木和一点绿茵。这一切都是因为常年不下雨和冰雪过多造成的。

“但是，在一年中的 3 个月里，田野不见积雪，铺满了绿草，牲口可在这里生长，而在其他的时间里，就必须把牲口带到其他地方去。

“那里没有白糖<sup>[101]</sup>，也不产水果、蔬菜和豆角，更没有家禽。

“很多东西都是外地提供的，所以那里既不缺肉，也不缺麦子、稻谷和奶油。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常说，地狱就在这片土地之下，它最庞大的东西是贫瘠。<sup>[102]</sup>

“总的说来，那里的人容易感情外露，他们都很勇敢善战，但他们对类似于我们天主的东西<sup>[103]</sup>特别虔诚。他们定时祈祷，特别喜欢在清晨祈祷<sup>[104]</sup>。他们人人参加祈祷，毫无例外，不管男女老少，每人都带着圣髑盒，这些盒子有金的，有银的，还有铜的。每个盒子里都盛有一些纸片，纸上他们的喇嘛从经书里抄写的经文，他们不是把圣髑盒挂在脖子上，而是交叉悬挂<sup>[105]</sup>。他们都很尊重喇嘛。西藏人喜穿毛织衣服，毛质细长柔软，他们戴的三角帽同我们士兵的帽子极为相似，但紧身衣又同印度斯坦的人不相同，他们的靴子做工精细，都是用上等皮子制作的。

“喇嘛是他们的神父。那里喇嘛很多，他们同我们的神父一样集体居住，而其他神职人员也与我们相仿，各自居住在自己的家里<sup>[106]</sup>。他们都很穷，靠别人施舍度日。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品行<sup>[107]</sup>。

“喇嘛终生不婚<sup>[108]</sup>，他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祈祷，每天早晨至少花两小时，晚上也同样如此。<sup>[109]</sup>

“他们的宗教歌曲与我们的一样，歌声温柔，但很坚定。那里有一条规定，一人如果有两个儿子，其中的一个必须送入寺院<sup>[110]</sup>。国

王只有一个兄弟，他的这位兄弟就是个喇嘛<sup>[11]</sup>。

“在我看来，喇嘛都是非常温和的人，即使你到世俗人员中去，也难以听到粗话。

“那里的‘祈祷之家’与我们的相仿，很干净，屋顶和墙壁画满了图画<sup>[12]</sup>。

“西藏人及其所着衣服都不干净，但很讲究他们的教堂的整洁。那里的塑像都是金的，我们在扎布让曾看到过一尊。那是一尊坐着的塑像，双手伸向天空，这是一位妇女的塑像，他们说她是上帝之女<sup>[13]</sup>的象征，天子降生人间之后，与母亲共同主宰人类生死。他们还说，上帝既是一人，也是三人一起，所以，上天之母和天子就理所当然地掌握天主圣三位的秘诀。

“忏悔是常见之事，但不是在所有的场合都进行忏悔，只有在大喇嘛在场时才作忏悔<sup>[14]</sup>。他们也有圣水缸，圣水缸很大，所有的人都可以把圣水带回家。他们也有一定的洗礼仪式，似乎同圣洗差不多。他们认为穆斯林信仰的宗教是可怕的，并且嘲笑那种宗教是异教徒的宗教。

“越过荒漠之后，我们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座庙宇，与我们同行的异教徒宰了几只羊，搞了许多仪式，正如我们每次遇到庙宇时看到的那样。他们很不诚恳地告诉我们，在举行这些仪式的同时，恶神就会附体于他们中的一人，并带给这个人做出特殊事情的权力这次恶魔附体于一人，那人双手轮流舞刀，做出大力砍杀的动作，佯击在场的人，然后以石块自击，同时大声吼叫，口吐白沫，说这都是恶魔叫他这样做的。

“在我们赴藏时，西藏王派来接应我们的两个人看到这种仪式时，笑话异教徒的不正常，说将他们的信仰称作假宗教是恰如其分的<sup>[15]</sup>。然而，西藏人也有一些古怪的仪式同这些异教徒的仪式差不多。例如，每月的第一天，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尽情地唱歌，一直

唱很长时间，同时吹奏他们的乐器。然后诵经，诵经时还打着许多彩旗，并且击鼓吹号。最后在乐器的伴奏之下合唱，边唱边走，举着 3 个魔鬼的摹拟像。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一仪式的目的是打鬼去邪——一种诅咒驱魔仪式，一旦不搞，魔鬼就会在这个月里给他们带来灾难。仪式完成之后，他们就非常坦然地回到各自家中，坚信这个月里再也不会有灾难降临<sup>[16]</sup>。

“再往前去，许多同中国接壤的王国与西藏信仰同一种宗教，讲同一种语言。我们在扎布让逗留期间，看到了来自中国的 200 多名商人，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商品，并说所有商品都是中国生产的。这些商队每年都来，他们每年带来的商品都差不多：生丝、陶瓷、茶叶，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茶叶在这里价格昂贵，因为西藏人喝茶很多。<sup>[17]</sup>

“由于西藏人民良好的秉性及其王国广袤的土地，我主似乎已为传播福音打开了又一扇大门。

“正如我尊敬的神父和在印度传教的神父们非常热爱传教事业那样，他们坚持向那些收效肯定小于西藏的地区委派神父，把马萨拉杰姆、圣·洛伦佐<sup>[18]</sup>等传教士派到了古阿姆河（Guam）流域，和南方的许多地方——诚然，这一切都要克服无数困难，换取上天的灵魂，那么我们也要求尊敬的您用特别方式考虑这里的传教活动，它无疑有着非常美好的前景。在这里传教如能成功，当然需要付出牺牲和您的祈祷，我请求您赐恩。为您祝福。

安东尼奥·德·安夺德叩拜  
1624年 11月 8日于阿格拉”

批阅：

可以付印。总审主教 1626年 9月 22日于里斯本

可以付印。埃乌杰尼奥·卡布里拉 1626年 9月 26日。

同意付印,但请定价。德·梅洛·密斯奎塔 1626 年 9 月 28 日。

请核对原件。总审主教 1626 年 10 月 9 日。

此件已定价。密斯奎塔、卡布拉尔 1626 年 10 月 9 日。

## 第二章注解

[1] 马扎雷洛的信也提到过此事,他要求“今年去发现震旦,它在中国之北部”(请见 1599 年 12 月 10 日信,收在《利玛窦的历史著作》第二卷第 395 页)。

[2] 请见:《扎汉尼亚和耶稣会士》,耶稣会士费南·格里罗神父的报告:《东印度等地耶稣会神父之教务年报》1606 年—1607 年,里斯本,第一册第 8 章。

[3] 著作全名是:《葡萄牙耶稣会安东尼奥·德·安夺德神父新发现大震旦,即西藏王国,1624 年》马塞·平纳伊罗,里斯本,1626 年。

其各种版本情况,请参阅桑米沃嘎尔的《耶稣会丛书》(第 1 卷 329-331 页和第 VIII 卷第 1639 页)和柯迪亚的《中国丛书》(《通报》,1926 年版第 393 页)。

下面是 1627 年在意大利出版的两个版本扉页的引语,这两次都是加布里埃利出版的:“新发现大震旦即西藏王国的报告”,这是耶稣会葡萄牙神父安东尼奥·德·安夺德 1624 年的发现。罗马,佛朗切斯科·科尔贝莱蒂出版社出版,1627 年。

“意大利语言中发现大震旦即西藏王国,应归功于马萨的主教琴蒂尼。”

安夺德那封信的手稿现存于阿久达(Ajude)图书馆。

1927 年,贝利拉再次出版平纳依罗(Pinheiro)(请见贝利拉《安东尼奥·德·安夺德神父对西藏的发现》第 43-74 页)。

[4] 葡文:“我们的又一次传教已结束,莫卧儿传教会会长安东尼



奥·德·安夺德神父发现了西藏，它是同中国接壤的王国。现在我向尊敬的阁下送去有关发现这个王国的报告”。这一注解见于维尔加拉 1624 年 11 月 17 日书信的页底，安夺德的报告被作为此信的附函送出(请见贝卡里的《16 和 17 世纪尚未公诸西方的埃塞俄比亚史籍》第十二卷第 103 页。

[5] 引自杜齐的《天主教布道团与西藏》。

[6] 这是一些作家(如霍斯坦)的用法,也许是奥利维奥斯(Oivios)最古老的拼写。根据葡萄牙文的拼法,“D'Adrade”、“de Andrade”和“De Andrade”是没有区别的,文件里均有使用。在那个时候,还可看到“Andrada”的写法。

[7] 霍斯登认为他生于 1581 年,1597 年加入耶稣会。其详细生平可参阅安东纽斯·费朗哥的《耶稣会修道院的力天使像在里斯本宫廷》第二编第 31 章,亦可参阅桑米沃嘎尔的《耶稣会丛书》第一部第 329 章。

[8] 见卡尔多梭(Cardoso);《葡萄牙王国批准的圣徒传》第 232 页,1657 年里斯本。

[9] 耶稣会士 A·弗兰科(A·Franco,S·J·)在葡萄牙出版的自 1540 年至 1725 年的《耶稣会年鉴纲目》1725 年附录。这部著作还记载了每个传教士出发的日期。有关这支队伍的历史,可参阅马努埃尔·沙勿略神父(P·Manuel Xavier);《全世界的总督、省长、修道院长等要略》第 38 页,1917 年出版于新果阿,该书第 71 页还记载:他让这支队伍于 1600 年 4 月 4 日从里斯本出发。

[10] 引自霍斯坦的《在莫卧儿的耶稣会传教士名册 1580—1803 年》第 530 页。在马尔斯丹(Marsden)的手稿中(惯例附加的第 9854 手稿,手稿第 92—107 页。)有安夺德 1633 年 8 月 14 日那封信的原件,参阅;C·R·博克萨教授:《再谈大英博物馆的马尔斯丹手稿》,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49 年第 1 和第 2 册。

- [11] 有关“阿格拉修道院”的历史,请参阅麦克拉甘的《耶稣会士与大莫卧儿》第 175、316 等页。
- [12] 引自腓力普·阿勒甘贝的《因仇教而被杀害的耶稣会士们的光荣之死及其生平》,坦那(Tanner)也对他们作了同样的颂扬,安夺德对卢亚迪·罗曼(Lualdi Romano)的赞扬也不亚于此(请见《东部印度等……》第 364—366 页,1653 年于罗马)。
- [13] 引自马努埃尔·沙勿略神父的《全世界的总督、省长、修道院长等要略》第 38 页,1917 年于新果阿。
- [14] 见《皮埃特罗·德拉瓦莱之旅途……》第三部分第 39--90 页,马斯卡尔迪著,1653 年出版于罗马。
- [15] 引自霍斯登的《在莫卧儿的耶稣会传教士名册 1580—1803 年》。
- [16] 见麦克拉甘的《耶稣会士与大莫卧儿》第五章和格里罗的《扎汉尼亚和耶稣会士》。
- [17] 这封信被收在《埃塞俄比亚、马拉巴(Malabar)、巴西(Bresil)和果阿年信 1620—1624 年》第 34—343 页,科尔贝莱蒂出版,1627 年,罗马。
- [18] 系指莫卧儿传教会会长安夺德。
- [19] 即拉合尔。
- [20] 即加瓦尔(Garhwal)首都斯里那加(Srinagar),加瓦尔系莫卧儿管辖下的小王国。
- [21] 即巴德里纳德(Badrinath),位于斯里那加东北,安夺德曾同一些朝圣者到那里朝拜。
- [22] 系陪同安夺德的 3 个印度青年之一,我们还知道另一位青年的名字,他叫朱赛佩(见阿登纳休斯·格舍尔的《中国宗教、世俗和各种自然、技术奇观以及其他有价值的实物材料汇编》第 49 页)。
- [23] 喜马拉雅的含义是:雪之地。

- [24] 葡萄牙文,意即:我主堪称……
- [25] 葡萄牙文,意即:冒险,障碍。
- [26] 这是做圣·弥撒时不可缺少的。
- [27] 见威塞尔的《早期耶稣会上旅行者在 中亚 1603- 1721 年》第 45 页。
- [28] 当时,葡萄牙王室与西班牙王室是团结一致的。
- [29] 他在前面即标题里写道“……或王国”,而这里却写道“和王国……”,这是一个不应奇怪的不肯定用法。
- [30] 系指教皇乌尔巴诺八世规定的犹太 50 年岁之“圣年”。
- [31] 阿格罗纳(Aragona)国王的公主,卢西塔尼亚(Lusitania)国王迪阿尼基(Dionigi)的王后,以慈悲而闻名。死于 1336 年,乌尔巴诺教皇于 1625 年宣布她为圣人。
- [32] 即巴西首都巴希亚(Bahia),建于 1549 年,1624 年被荷兰人占领,1625 年 4 月 30 日葡萄牙人取代了荷兰人。
- [33] 位于琴斯河的支流马克河流域的荷兰城市,意大利侯爵斯皮诺拉曾在西班牙国王菲力普四世的指使下占领了这座城市。维拉斯克斯(Velasques)曾有一幅战图《布列达投降》,因“兰扎斯的库亚德罗”的名字更为出名。
- [34] 发生在 1605 年的一次造反,使纳古斯·苏省约斯(Negus Susenyos)夺得了阿比西尼亚的王位。同人们想象的恰恰相反,他保护了耶稣会神父们半个世纪内在各种困难中传播福音的活动。当时已在阿比西尼亚工作并取得了良好成绩的帕埃兹(Paez)神父被召进宫廷后,参与了国王与基督一性论著的争吵。出于对基督教的忠诚,他于 1613 年归顺了教皇保罗五世,1621 年宣布以信仰基督为己责,1624 年,基督一性论党因起义而被镇压,他庄严发誓听从由新的宗祖阿尔丰索·曼达兹控制的教皇的意旨。这就是序言所要影射的事实苏省约斯死于 1631 年,此后,一切又回复到先前。尽管已作过许多探

索，但我未能得知平纳伊罗是否发表过关于埃塞俄比亚返回罗马教廷的消息。

[36] 安夺德神父的信就从这里开始。

[37] 安夺德的信是写给省神父的。

[38] 马科斯是助理教友。这当然是出版商的一个错误。

[39] 此处原文为“Marquez”，毫无疑问，这是印刷错误，上面已经提过的印度耶稣会士名单记载的是“Marques”，我们从安夺德的第二封信里看到的也是“Marques”。

[40] 即贾汉吉尔(Jahāngir)皇帝。

[41] 安夺德在书信里使用了“Geutios”即“非犹太人”的字眼，我们将它译成了“异教徒”。

[42] 这些消息告诉我们，那里还有一位叫朱赛佩·德·卡斯特罗的神父，他于1577年生于意大利都灵，1610年起在莫卧儿传教会工作，他是最受贾汉吉尔皇帝宠爱的传教士。他在莫卧儿帝国孜孜不倦地工作了36年之后，于1646年12月15日死于拉合尔。1627年8月15日，德·卡斯特罗从克什米尔致信科英的克劳迪奥·佛朗切斯科·塞勃塔里奥神父，他写道“La Miss. e del grande Tibete che partò di qta ua inanzi p'essere Cominciata dal nostro P. Sup. re con bone informationi chi io gli p'curai.”〔意为“我们的省会长神父开辟的大西藏传教会——莫卧儿传教会的一部分，不断前进，这与我向他提供准确的消息亦有关系”（引自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1927年刊第164页）〕。

[43] 我们看到，这些传闻有40年的历史，开始于1586年，金匠阿科斯蒂诺·达·布道在1522年写于拉合尔的信中写到：“那个大西藏是皈依基督教的，而罗马教皇对其毫无注意”。（引自《孟加拉学会会刊和会议记录》——《新丛书》1916年刊第四期第8页）

[44]系指神父弗朗西斯科·科尔西(佛罗伦萨人),而不是库尔西。1599 年到达印度(生于 1573 年),1600年至 1635年在莫卧儿传教会工作,死于 1635年。有关他的活动请参阅麦克拉甘的《耶稣会士与大莫卧儿》第 75页等。自当时任传教会会长的安夺德出发之后,传教会就无会长。

[45]当时乃至今天都称传教站为住所。

[46]即莫卧儿王国。

[47]即贾汉吉尔皇帝。

[48]朝圣者及其陪同者很快就会知道,安夺德也好,他的教友们也好,谁也未作此行去朝拜他们的偶像,为了逃避责任,也许是他们自己通知了“国王的卫士”。

朝圣者的队伍所走的那条路当然是最短的,即那条沿着恒河山谷经过哈得瓦(Hardwar)“毗奴门”的路。

[49]根据历史记载,这是欧洲人开辟的喜马拉雅山上的第一条道路。

[50]这是印度教朝圣者们在遇到困难时用以壮胆的一种呼叫。

[51]当时的阿格米尔(Agmir)是拉贾普特(Rajput)诸国腹地的一座小城,由莫卧儿皇帝统治。

[52]我们还从其他消息得知,莫卧儿的历代皇帝都待这一阶层人不好,1665年的欧兰格则伯(Aurangzeb)皇帝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正像伯尼埃尔(Bernier)在其文章中告诉我们的那样(《在莫卧儿帝国旅行 1656—1668 年》(Travels in the Mogul Empire 1656—1668 年)A·良斯塔普出版公司,伦敦,1891年,350页及其后)。

[53]“好耶稣”教堂几乎位于古果阿城的中心,塔高 24 米,1594 年 11 月 24 日开始营建,圣·佛朗西斯科·沙勿略的尸体就盛在帕尔马的法国公爵赠送的宝瓮之中。

[54]圣·托马索树:羊蹄甲属,豆科,此名来自印度基督徒中广为

流传的传说，传说其花是用圣方济各·沙勿略殉教时的鲜血染成的（参阅库迪斯（Curtis）的《植物杂志》第三卷，此书对这种颜色进行极好的描述，并告诉我们：“它属于一种巨大的竺葵属植物，实际上是一种荣耀的东西”。）

[55] 这里指的是印度的栗树或印度板栗树。

[56] 是一种被称作“曼杰罗那”（manjerona）的生菜。

[57] 系加瓦尔（Garhwal）的首都斯里那加（Srinagar），海拔2300米，位于阿拉卡南达（Alaknanda）河——恒河的主要支流——的左岸。该城亦称Sri城，斯里（Sri）意为“Laksim”，即繁荣、美丽女神（毗奴之妻）。在安夺德年代，这还是一座新建不久的城市，其建筑花了20年时间，但1894年的一场大水冲垮了这座城市。就像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许多作者都说安夺德曾取道克什米尔首都斯里那加。

[58] 有关这些人民和地方的具体情况，可参阅舍林的《西部西藏和英国边界等》、纽伦堡的《著名的瓦罗家族》第382-384页、J·谬夫《1853年秋在克达纳斯及积雪的喜马拉雅山的其他部分地区旅行记》，爱登堡，1855年，第21页。

[59] 我们从1624年5月16日的信里已经知道，斯里那加的税务官将他们扣留了7天，并抢走了他们做圣·弥撒必用的圣石、两支短枪和两幅（一大一小）圣母像。

上述那封信写在他们离开斯里那加5天之后亦即5月11日。

[60] 恒河的这一段叫毗奴——恒河。

[61] 这些令人好奇的索桥常见于克什米尔至中国之间的江河之上。舍林在其著作《西部西藏和英国边界》中曾对此作过下述描写：“连接河两岸的桥是由一根双股索组成的，贫民们过河时手脚并用，从索桥上滑行，并用绳索将身体与桥系在一起，以免掉进水里。在绳索与桥连接的地方置一木扣，使系缚

身体的绳子能在索桥上自由滑行”。木扣有时则用滑轮代替，这就使滑行更为方便。

这种索桥在很古的时代就开始使用。

加布里勒·杜兰(Gabriele Durand)神父就是在过这种桥时丧命的,他的主教M·沙宛(在其1866年1月3日的信——被收进了《1866年传教年鉴》——中)写道:“杜兰神父在几个基督徒的陪同下来到了兰泽江,他希望大家都能安全过河而把荣誉与危险都置之度外。那里的河面很宽,他把身体贴近用竹子做成的索桥,然后向对岸滑行。他很快地向对岸滑去,其他人仍旧立在岸边,准备一个一个地照着他的样子过河。突然,人们听到两声枪响……一枪击中他的胸部,一枪击中他的喉咙,他失去了知觉,双手渐渐地离开了滑轮做成的滑扣,身体掉进了汹涌的波涛之中……22天之后,他的遗体在离桥很远的下游找到了……。比埃特(Biet)神父给他穿上了代表殉教和圣洁的红白祭服。当时他才30岁”。

[62] 在抵达巴德里德(Badrid)之前,马科斯教友病得很重,“他以为苍天已经向他发出了召唤……然而,上帝恰恰在我们都认为已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时让他恢复了健康”(引自安夺德1626年8月15日的信,第2页)。

[63] 即锡兰(Ceylon)和维贾雅纳加尔(Vijayanagar),杜齐在他去西藏东部的路上遇到一群来自印度南部的萨都,他们先在巴德里纳德稍作逗留,然后向西藏的阿里三围进发(参阅杜齐的《圣人和土匪在鲜为人知的西藏》第140页)。

[64] 葡属印度古币:分铜、锡、铅三种质地,其价值因年代不同而异,根据1619年9月4日的章程,巴扎卢克(bazaruco)等于葡币的“一个皇币”(一分币)。

[65] 系“Bania”,印度商人等级。

[66] 即巴德里纳德(Badrinath)山,山高5080米(舍林记载),在山

腰(海拔 3173 米,舍林记载)有一塔,与山同名,巴德里纳德源于梵文“Badarinātha”,相传此地盛产“育育巴”(Yuyuba)枣,“巴德里(badari)系育育巴树的一种(枣属植物),“纳德”(nātha)意即庇护所,所在地。

[67] 安夺德之后 180 年,韦伯(Webb)和拉普(Raper)系第一批访问巴德里纳德的欧洲人(请见拉普著作《勘测发现恒河之源的纪事》第 509、514、515 页)。

1890 年,博克(Boeck)访问了巴德里纳德(请见博克的《通过印度到荒凉的尼泊尔地区》,莱比锡,1903 年,有关巴德里纳德事请见 351、361 页)。

20 世纪初,舍林访问了巴德里纳德(请见舍林《西部西藏和莫国边界等》第 38-54 页)。

上述所有人都记载了与安夺德同样的消息,使安夺德的消息得到了确证。

巴德里纳德是最神圣、最受崇敬的印度教寺庙之一,地处加瓦尔北部。拉普说印度教徒相信自己是超自然的,所以其结构和表象远不足证明圣塔所享有的威名和每年所得到的捐献,圣塔财产难以计算,堆满了 700 个村庄。

洗圣水澡被称作“塔普塔—砍德”(Tapta Cund);泉水温度很高,人体难以忍受;泉水蒸发含硫的蒸气,泉水还可供家庭使用,亦可用于取暖。来塔朝圣者不计其数,仅在拉普参观的那年(1808 年),朝圣者就达 5 万人,多为苦行者(根据拉普记载,请见拉普《勘测发现恒河之源的纪事》第 531--540 页),舍林在其著作中亦告知我们,塔是由于毗奴河流过而神圣的,从远古时代就享有盛誉,塔之所在地也被看成是“圣地”,是上帝的宝地。特赖尔(Trail)在《库乃翁统计概要》中说,巴德里纳德只有 226 个村庄,德·阿则维多(在其报告中)也经常提及巴德里纳德。



- [68] 1924年的捐献高达7千卢比(《印度舆地》, 1924年)。
- [69] 从每年11月至来年5月, 那一地区的居民迁至海拔2300米的约什玛斯(Joshimath)(《印度舆地》第六卷, 第179页)。
- [70] “Lyra”, 可能是“Lary”的印刷错误, Lary是古杰拉特(Gujerat)的名字。宫廷语言为波斯文, 波斯文中称古杰拉特为“Lary”, 安夺德亦使用了Lary一词。
- [71] 安夺德是第一个向我们描述被称为博蒂亚(Bhotia)的喜马拉雅部落的生活情况, 我们已经知道, 阿嘎威瓦和蒙寨拉泰都已提起过这些人民, 但直至安夺德的介绍, 欧洲人对这些人民仍然一无所知。安夺德所说的一切——他们的语言不同于印度斯坦, 吃生肉, 烹食动物未经洗涮的内脏, 妇女的耳环, 妇女到田间耕作, 男人在家纺纱——都与现代考察家听说的完全一致。拉普也说, 在那里, 妇女们夏天到地里劳作, 而男人们到西藏经商, 还说那里的人是蒙古型的: 身材魁梧, 体质强壮, 善长喝酒(请见拉普著作《勘测发现恒河之源的纪事》第525页)。也许他们曾一度居住在西藏高原, 此后其他民族移居到这里, 这也许是他们中有人取名Bhotia的缘故, 博蒂亚(Bhotia)来自西藏名字, “博”(bod)(印度人将它读成Bhot)。许多信仰也同西藏的古老宗教本教(bon)有联系。有关这一问题的详情可参阅克鲁克(Crooke)的《印度北部的土著》(Natives of Northern India, London 1907), 还可参阅舍林著作第56—61页和329页的图片。
- [72] 这是拉普和韦伯之行终点所到的一个村庄, 海拔3178米, 到西藏经商的博蒂亚人夏天在此落脚。这也是通往马纳关的最后一个村庄。测量的地图还标明, 再往北去还有一个叫加托里(Ghastoli)的地方, 那是一个房屋集中建在一起的极小村庄, 只是在最美好的夏天才有人居住。马纳位于巴德里纳德以北约10公里、毗奴—恒河[当地叫做“萨拉斯迪”(Saraswati)]的

左岸。

[73]马纳村处“露天剧场”的中央，“露天剧场”四面环山，山岭极高，山顶上覆盖着巨大的冰川，冰川一直延伸到离恒河只有几百米远的地方，恒河水融化了离它最近的冰。这是喜马拉雅山的中心地带，再过 25 公里(空间距离)，传教士就将抵达分界线，越过分界线便是西藏高原的边缘。

[74]这就是闻名的糌巴——西藏人的日常食品，所有的旅行者都提到过这种食品。

[75]德鲁(Drew)在其著作《查漠和克什米尔领土,地理纪事》(The Jumoo and Kashmir Territories. A Geographical Account. London 1875. P. 292)中说,居民们将一种东西洒于草木之上,草木便无光泽,毒污空气。然而死人的现象在寸草不生之地同样发生。故此,里特(Ritter)怀疑系碳酸蒸气所致(请参阅《亚洲探察》,杨林,1832年,第二卷第 444 页);然而,种种猜测均系待解之谜,安夺德已进行过试解。其原因可能不在于现代考察者笔下的“恶山”。德西德里神父在这里时,也感“头巨痛”,胸闷,呼吸短促,发烧(引自德西德里《西藏纪事》第 309、310 页)。

[76]影射上帝赐给充当埃及奴隶的犹太人的“封地”。

[77]这种被褥在当地被叫作“砍布林纳”(Camboline,它源于 Concani, Kamblin),印地文,特指一种类似披风式被褥的御寒物,系料毛制作而成,通常为灰色,印度常用御寒物。

[78]安夺德是第一个到达马纳关的欧洲人,所以他堪称第一个翻越喜马拉雅山发现恒河主要发源地的欧洲人。

马纳关亦称“Chirbitya-la”或“Dungri-la”,根据印度测量局地图,此关海拔 5451 米,1855 年 9 月 6 日舒拉金特维特越过此关后说此关海拔 5414 米,赫定则说那里海拔为 5450 米。

安夺德沿恒河溯流而上直至其发源地后几年，阿克巴皇帝为了同一目标派出了一支人马，试图准确地弄清该江的源头，但也许由于这支人马畏惧艰难，乐意地接受了印度教圣经里的说法，称恒河(Gange)发源于名叫“牛嘴”山山下的广阔冰川。托玛斯·赫贝特(Thomas Herbert)在其《在非洲和巨大的亚洲的数年旅行》，伦敦，1638年所附的地图上亦标明，恒河发源于牛嘴。所以人们猜测，恒河从凯拉斯山<sup>①</sup>下面的玛法木错湖发源之后，由此向南，流经整个喜马拉雅山脉地下。

这一看法在欧洲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上世纪初年，赫贝特认为恒河的主要支流应该是阿拉卡南达河(Alaknande)，而阿拉卡南达河的重要源头应该是甘戈特里(Gangotri)冰川。约30年后，斯特拉舍(Strachey)兄弟俩纠正了这一错误看法，指出阿拉卡南达河并非始于甘戈特里，其源头远在此北，即沿马纳关而下的小溪，这条小溪就是安夺德提到的那条小溪(引自约翰·斯特拉舍(John Strachey)的《印度》，第22页，1888年伦敦出版)。

在当地，称阿拉卡南达河为毗奴—恒河，其上游部分叫萨拉斯瓦迪河，源自马纳关。

当时最难解释的是位于湖北岸的另一条河。德·阿则维多(在其报告36页中)告诉我们，从地下的流水声可以断定，此河很长一段是在地下流过的，事实上，在马纳关的那边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河，注入靠近托林的萨特素季河(Sutlej)(出自赫定的《南部西藏》第一卷第164页及其《外喜马拉雅山》(Transhimalaya)第三卷第275页)。在印度测量局的第52幅地图上标明，有一条小河源于马纳关，先汇流曼南河，然后注入靠近托林的萨特素季河。

① 即冈底斯山。——译者

有关安夺德描写马纳关的其他情况，请参阅威塞尔的《早期耶稣会士旅行者在中亚 1603—1721 年》。

[79] 尽管土著人用纱网遮掩眼睛，但他们也同样逃避不了弄坏眼睛的厄运。

[80] 系古格首府扎布让，根据印度测量局地图（第 52 号），扎布让离马纳关 40 哩。

[81] 从安夺德 1626 年 8 月 15 日的信（第 3 页）中我们得知，国王曾经得到了神父本人和一些商队到来的通知。

[82] 安夺德在 1626 年 8 月 15 日的信（第 3 页）中说“三天”。

[83] 系指古格王国首府扎布让。

[84] 安夺德在 1626 年 8 月 15 日的信（第 3 页）中写道：“我们被国王关押了几天，就像坐牢一样，不让我们出去。”

[85] 安夺德在 1626 年 8 月 15 日的信（第 3 页）中说：“由于穆斯林翻译的原因，我们同国王的第一次见面只进行了一会儿。”

[86] 糖是从棕榈树或甘蔗里提炼的，团成面包状。西藏糖是从外埠进口的。

[87] 毫无疑问产白肥沃的萨特累季河谷，萨特累季河流经高原之后，泻入同闻名于世的科罗拉多峡谷极为相似的一个深谷，该谷深达 900 米。

[88] 藏语中的喇嘛是导师、上人的意思。

[89]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博坦（Bhotant）的欧洲语言用法，此后，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文献里经常看到这样的用法，安夺德在书面语言中根据博坦（Bhotant 或 Potant）的发音写成“Potente”，法国和英国的翻译家们在翻译他的著作时，则根据“Potenté”的含义译成“Puissant”和“Powerful”。<sup>1)</sup>

[90] 此词在印度意为“葡萄牙人”，出自波斯文的“Firangi”，即外

1. 法文的“Puissant”和英文的“Powerful”，均为“强大的”意思。——译者

国人、欧洲人的意思，稍后一些，安夺德则使用了“Frangues”的字眼，而德·阿则维多使用“Fringuy”。

- [91] 在西藏，大喇嘛是国王和贵族们对重要喇嘛的尊称，意即导师、大师。
- [92] 根据威塞尔（《早期耶稣会士旅行者在中亚 1603—1721 年》第 66 页）的看法，这里所说的大神父是指果阿耶稣会省会长，从《耶稣会史纲》里又得知，这位省会长就是弗朗西斯科·德·瓦加拉（Francesco de Vergara），安夺德的这封信就是他转给总会长的。
- [93] 在 17 世纪，流行一种小的铜质小画。
- [94] 系指一些忏悔工具，第一种工具是镶有金属小片的宽带子；苦鞭实际上是一种灾祸。
- [95] 在西藏，这是恭敬的标志，作此表示时须伴的圣物。
- [96] 从 1626 年 8 月 15 日的信中得知，他在扎布让停留了 25 天。神父离开时带走了两个西藏青年，并在他们的陪同下到过阿格拉。后又与他们一起回到了西藏（参见安夺德 1626 年 9 月 10 日信）。神父总是带着这两位年轻人，很可能是出于他连续不断地向他们学习藏语的需要。
- [97] 这种由当局命令地方提供食品的做法在整个西藏都存在。
- [98] 平纳伊罗（Pinheiro）的文章（里斯本，1626 年）写作“桃子”：“6 篮桃子，果子虽小，但味道鲜美。”然而威塞尔书的原葡萄牙文写作“无花果”（请见威塞尔《早期耶稣会士旅行者在中亚 1603—1721 年》第 67 页）。
- [99] 安夺德用印度斯坦语的“Rajah”（土王）称呼西藏的大首领。
- [100] 以上数字引自威塞尔著作原版（《早期耶稣会士旅行者在中亚 1603—1721 年》第 67 页），但其他的几种出版物所发表的数字都大于这些。
- [101] 糖呈栗褐色，系由棕榈或甘蔗提取，粘成面包大小的块状。

[102]安夺德对扎布让及其周围地区的描述同我们从其他资料了解到的情况完全一致。

今天的扎布让隶属西藏的阿里地区，该地区被萨特累季河分成两半。此河曾流经海拔 4500 米的高原，但今天已同科罗拉多大峡谷一样，河床升高了 900 米。只是在河身较低的地方才有一些农业，可引河水浇地，但农产品只不过是一种颗粒很小的小麦和某些水果而已，那里唯一可生的树木是白杨，整个高原就像安夺德所写的那样，一眼望去看不到一棵树木，除了偶尔能看到几簇草丛。

高原上生活着肥大的灰色绵羊、山羊和马，很少能够找到水源，凡是有水的地方都长满了树木，这也是高原上唯一能够看到树木的地方。

由于萨特累季河及其支流水的滋润，使沿河一带的风光绮丽动人，杜齐称它如画似锦，“我们在领略了如画似锦的风光之后来到了托林（距扎布让几公里）：一座座土山围成的巨大露天剧场，在河水的滋润和装点下变得更加多姿多彩。在山间小径抑或在弯弯曲曲的走廊中萦绕而行，有时却又藏身于自然隧道，时而则溯山坡而上，由于商队的频繁往返，有些路面被踩得尘粉飞扬。天气炎热（1953年8月18日），每天的上午11点至下午3点之间，最好是停下来到那穹拱之下休息……”，杜齐还发表了此处的一些风景照片（请见《圣人与强盗》）

[103]即遵循我们的教仪。

[104]我从贡贝的著作（《一个西藏人论西藏》第 46--47 页）中得到了对安夺德这一消息的确认。

“西藏人每日早起之后先敬慈悲的观世音，然后再敬三宝（佛、法、僧，安夺德很快就会将它们比作天主三圣），最后敬那些人们公认的圣喇嘛。敬神之后，他们爬上屋顶，在一

个土炉中焚烧杜松，向信仰的保护者（一般为天神祈祷，并供奉酥油、茶和糌巴（炒熟的大麦面），同时呼唤护法神（Chö jong）和当地的地神（zhidag）名字。如此之后，西藏人才开始一天的劳动和中止斋戒。晚上，全家人在厨房或公用房间的地板上席地而坐，背诵经书的几段，此后便是在去吃饭的同时各自向三宝祷告，每人下跪3次。这些祈祷同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祈祷差别甚小。然后还要感谢白天得到的庇护，请求饶恕一天所犯的过错，并请求在即将到来的夜间继续保护他们，等等。僧人继续为亡者进行祈祷，直至洗尽了他们的罪孽而升入极乐世界（dewajen）的天堂。”

安夺德了解这一切（“他们有着固定的祈祷，特别是清晨”），认为西藏人“对我主非常虔诚和崇敬”。

[105] 在佛教进藏以前，西藏人就普遍使用巫术对付疾病、魔鬼、敌人等等，他们把魔鬼和敌人的名字写在纸片或草叶上。随着佛教渗入西藏，巫术进一步盛行，并达到了鼎盛程度，乃至今天成了西藏宗教生活中的首要内容。巫符是从大乘经书里摘抄的，所以经常是那些讹误的和难以看懂的梵文。

这些巫符被卷成小卷，用一小块丝绸或锦缎包起来，然后放入金匣或银匣或铜匣里，并把小匣挂在脖子上。这些小匣子上有时还嵌有各种宝石，当地称之为嘎乌（Gau），这些小匣里还盛有圣人之遗物：喇嘛或神灵服饰的布条，圣草、小像，等等。这些圣髑盒子要么挂在脖子上，要么系在腰带上，有时还当扣子钉在衣服上。安夺德也提到过这一点，杜齐对嘎乌作过这样的描述：“那是一种特殊饰物，是一种制作精细的银质垂饰，妇女们把它挂在脖子上，为数极少的男人有时也将它挂在脖子上，盒子里装有一小木经书，或一些祷词，更常见的是护身符。”（引自杜齐的《印度——西藏》第三卷第一部分第9页）

有关此盒的具体描述，请参阅杜齐的《西藏评论》第185—186页。

[106] 在原始的佛教中，僧侣不是司祭，他们同俗民无宗教关系，但大乘使佛教变成了宗教，僧侣们开始在庙宇里举行司祭活动。

在佛教进入之前，西藏无僧侣，即不存在欧洲语言意义的僧侣，只有司祭，即只有应人民的需要进行宗教服务的人员：这种服务只限于用邪术、幻术或巫术治病，这是对凶恶的鬼神的一种特别崇敬，以期平息它的怒火。

大乘佛教和密宗都未能改变西藏司祭的这一传统，相反，却丰富了对付鬼神凶恶行动的手段。然而，只有少数人懂得原始佛教与大乘佛教之间的内在联系。

因此，在讲到西藏的僧侣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当然是可以被称为“僧侣”的，因为他们遵循这样的行动规范：从属于一个佛主，一般地都集居于寺庙里，而他们又是特别的“司祭”，亦即他们都是为人民进行宗教服务的人。

有关他们的人数，我们可以参阅一下西藏女作家仁钦拉姆的《我们西藏人》(第115页)：“西藏有许多喇嘛，其理由是非常简单的：西藏人都是热情的佛教徒，成为信教者是每一个人能够希望的最大理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步菩萨之后尘。任何人也不如西藏人民对喇嘛的尊崇那样出自内心，每一个家庭都渴望至少有一个佛教徒，许多家庭不只一个，如果一个家庭没有佛教徒，那就会感到巨大痛苦”。

他们所享有的崇高地位和特权以及能够过上优裕的生活，当然使他们的队伍不断扩大。

在西藏，六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人口属于宗教行列，而在锡金和不丹，其比例则为一比十，在拉达克为一比六。

在某些时代，曾盛行过这样的做法：将儿子交付寺院是



向寺院纳税的必然手段。

根据《拉达克纪事》记载，扎西朗杰（Trashi Namgyal）（即 bkrashis rnam rgyal，1500 年左右即位至 1535 年）曾制定这样一条法律：凡有一个以上男孩的家庭，必须将除长子以外的一名男孩交给宗教（见 A·H·弗兰克的《西部西藏史》第 85 页）。但在拉达克，一般则是将长子交给喇嘛庙，即便国工家庭，其次子似乎也必须从事宗教生活。安夺德在这封信里把喇嘛称作“Lambà”，而在 1626 年 8 月 15 日的信里改称“喇嘛”（Lamā）：

[107] 安夺德的第一印象同西藏女作家（上述注释已经提及）的评述遥相呼应：“西藏人崇敬喇嘛，因为对他们来说，最伟大的理想就是脱离尘世，而喇嘛们恰恰为否认自我而热爱这一理想做出了榜样，他们同人民同甘共苦，生活简朴，住房简陋，他们每个人都在寺院里安家，或居住在寺院的几间房子里，好自为之，无任何闲情逸致，他们的工作和快乐就是祈祷和帮助人民……”（引自仁钦拉姆的《我们西藏人》第 118—119 页）。然而，欧洲的作家们发现，对这一理想的欢迎程度是普遍低下的，安夺德也很快改变了这些如此具有诱惑力的评价。

喇嘛们穿着华丽，营养丰富，在他们之中无“贫困”可言：他们可以用自己的金钱大肆做买卖，寺院则是市场和向俗民提供借贷的垄断者。菩萨（自己就是样板）要求僧侣们靠俗民们的施舍为生，以便向俗民们提供奉献（藏文为：sbyin pa，梵文为：dāna）的机会。在西藏，尽管寺院已成为经商的主人，但它们还是拥有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人民向僧侣的奉献是非常慷慨的。馈赠，对于那些接受者来讲，同他们的“神圣”与“尊严”是一致的，富人的馈赠都被寺院的高僧们据为己有。

僧侣们都从事一定的职业，最为常见的职业是卜卦和驱魔打鬼，他们也从事土地耕作。每个喇嘛每天可以得到 3 次食品，从他们领取食品的小室里，还可得到奉献的茶水，亦为每日 3 次，他们还可从在庙宇举行的仪式上得到这些东西，每日数次。古伯察在其著作中花了不少笔墨描述喇嘛们在寺庙里接受茶、银和酥油的情况（请见其的情况《鞑靼西藏旅行记》第二卷第三章第 111 页等），描述喇嘛从事的各种职业（第 113 页等），喇嘛耕作土地（第二卷第四章第 136 页）和喇嘛采集植物标本、开药店、当医生（第二卷第四章第 163 页等）的情况。

(108) 阿底峡和宗喀巴对喇嘛教进行的两次改革，是以回到佛教古老的独身主义教仪为特征的，宗喀巴的“黄教”僧侣们严格地遵守这一教仪，把所有违背这一教仪的人都逐出了教门，但一些旅行者亦说，在“黄教”的寺院里，获得宽免是极易的事情，要求宽免的人屡见不鲜。在那个未经改革的教派里也有独身僧侣，但“红教”和其他教派的多数喇嘛都有妻室，他们或公开婚娶，或秘密成婚，尽管他们结婚也需要得到某种许可。

(109) 安夺德对僧侣祈祷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一个喇嘛未在祈祷中得到宽恕，那则由于特殊原因，可以说他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寺庙里度过的。必须参加祈祷是对喇嘛的真正束缚，使他们的生活受到制约，因为很难找到一个喇嘛真正地懂得他所读的那些经文和所进行的那些仪式的内容。

如果夜间从睡梦中醒来，就不能继续躺在床上，必须立即起床，并在再次入睡之前作长时间的念经。

太阳升起之前很久就必须起床，起床时就要念经，然后洗涮，洗涮时也要不断地念经。随着敲击贝壳声起，大家都要到庙里进行各种诵经仪式，其中有一部是最基本的经文，此

经包含了所有希望成为僧侣者必须遵循的成规。这一切结束之后，他们便在庙里用茶，在喝茶之前，他们确定献茶对象，并为他献茶者祈祷。此后，再完成另一些宗教仪式，并再次用茶并进餐。最后，他们离开殿堂，回到各自的住所，进行各自选择的诵经。

在宣布太阳升起的敲击声后，大家都必须跑到室外，欢迎太阳的升起，并向太阳神祈祷。

约在早晨 9 时，他们要进行被称为“热后”的第二次会聚，再次诵经、饮茶，然后，僧侣们回去从事各自的职业，青年人则专注学习。

第三次会聚是在中午：举行宗教仪式之后，僧侣们回到自己的小室之中，在那里进行特别的祈祷，比如向佛祈祷，然后进午餐，午餐都是自己做的。

约下午 3 时，进行第四次会聚，会聚地点还是庙宇，主要的仪式是祭神，其后的时间就自由安排或学习。

第五次会聚约在晚 7 时举行，仪式完毕之后，僧侣们各自回房，便可上床就寝。

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仪式大部分用于冗长的诵经：唱圣歌、诵经文，特别是举行祭神的象征性仪式。

诵经的时间及经文，因教派不同而异。

[110] 在孩子 7 岁时行捐子仪式。仪式上，被捐之子立即被剃去头发，只在头顶上留一绺头发，直至穿上僧服并严守十大戒律（藏语为：bcu gdam dpe；梵语为：dasasila）时才完全不留一点头发。

[111] 我们已经说过，古格王国的教主似乎始终由国王的一位兄弟担任。

[112] 由于约瑟普·杜齐的介绍，古格艺术的光辉得到全世界的青睐，他在《印度——西藏》画册中，集中两册来发表古格的艺

术。

- [113] 这个女神被认为是“万神之母”，很可能就是超然智慧神 (Prajñāpāramitā) (藏文为 *shes rab pha rol tu phyin sa*)。从公元5世纪起，印度就开始用香料和鲜花祭供“超然智慧神”，不久就出现了此神的绘画和雕塑，超然智慧神随之成了印度、西藏、爪哇、印度支那和日本深得人心的神灵，它被认为是“所有菩萨之母”，并因此得名“万神之母”。普通所见此神之塑像只有双臂，但西藏却将它打扮成四臂，其他两臂上举，右手擎智慧经，左手托玫瑰经。在昏暗的庙宇里，安夺德可能只看到了两只上举的手，而未看到另两只手，因为这两只手交捧地置于身前，很难看清。其后，他从“上帝之母”引出这番推论：西藏人“了解降生的奥秘，因此，他们也了解天主的奥秘”，这一推论自然是曲解。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

杜齐提供了一幅非常美丽的超然智慧神的壁画复制品，原画在托林，距扎布让仅几公里（请见杜齐《西藏的奥秘》第169页）。

众所周知，度母 (Tara) 神也被称作“所有菩萨之母”，但其画像从未出现过两只“上举之手”。

- [114] 安夺德所指为极其古老的波罗提木叉 (Pratimoksa) (藏语为 *asosbyon wa*) 佛教仪式，这是年长僧侣在寺庙之内院举行的一种仪式，每月举行两次。

有253条戒律，对与僧侣的生活、服饰、食品、起居和学习有关的一切都作了详尽规定，载有这些戒规的小书是古老的佛教书籍之一，它比“佛教规则”(Vinaya)还要早，也许那就是最早的佛教。这种忏悔不像基督教忏悔，不是通过耳语，从一个神父那里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默诵戒规时，如果有人发现自己诵经有遗漏，就必须进行自责，并接

受施主的责罚，责罚的方式包括责备、笞责，乃至被暂时或终身逐出寺院。根据一些文章记载，自责的目的在于铲除罪过。忏悔仪式因地区不同和教派不同而异，因此，在一些教派里，只要大声诵读某神经文，以示承认违背了教规并保证今后不再这样做。

1716年至1745年居住在拉萨的奥拉奇奥·达·佩那贝利，并将藏文版《别解脱经》（忏悔经）翻译成意大利文，该书解释了穆拉沙瓦斯迪瓦达学校里举行忏悔仪式的情况（见《斯特莱特——丁丁古尔》）。但《传教区图书馆》第六章第364条却说，不知道《别解脱经》为何是“放在再生之上”的经书。

[115]以羊供奉地方神（安夺德说那里有一塔，谁过往此处都需祭奠），不仅像安夺德说的那样，是博蒂亚部落的一种特殊做法，西藏人从上古时代起就行此祭祀，许多地方的佛教不能废止这一做法。但在穆尔比、拉达克却不一样，国王 [Lde，即喇钦扎巴本德 (lha chen grags pa bum lde)，16世纪初即位] 为此专门发布了命令，并令人将命令刻于石碑之上晓喻民众：禁止以羊献祭地方神灵。但如今在刻有国王命令的石碑上还可看到穆尔比人民的题句：此禁难以遵从，“如果我们向地方神灵多捐献羊，它们会说什么呢？”（引自 A·H·弗兰克的《西部西藏史》第79页）时至今日，拉达克每年仍用羊祭祀一至两次，祭祀用的羊的心脏必须在羊未死之前就挖出来。

[116]这一仪式被称作“破敌”仪式，这里所说的敌人是指那些恶魔头领。安夺德在其1626年8月15日的信中也提到过这一仪式。

[117]杜齐在其《印度——西藏》第三卷第二部分第151页刊登了扎布让红庙壁画的照片，这些照片重现了中国商队的情景。那些壁画是16世纪的作品，它们的绘制时间仅比安夺德到达那里稍早一些。

[118] 《关于1620年果阿省的情况报告》曾详述过这次传教，请见《1620年至1624年埃塞俄比亚、马拉巴、巴西和果阿年事表》第159—160页，1627年，罗马。

## 第三章

### 古格王国

由于西藏人民秉性良好及其王国土地广袤，我主似乎已为传播福音打开了又一扇大门。

安夺德

1624年11月8日

……不错，古格王国的人口稀少是个事实，但这里是通往许多其他王国的大门。在其他王国里，人口众多，而且他们均信仰同一宗教，讲同一语言。

安夺德

1626年8月15日

提要：1、古格王国的形成。2、王朝的政策。3、仁钦桑布的活动。4、古格的艺术。5、王朝给西藏立下的功绩。6、11至16世纪的古格王国。7、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拉达克王国。8、安夺德时期的古格王国。

## 1、古格王国的形成

对于研究西藏的学者们来说，西藏仍然存在着许多奥秘，由于缺乏文献，他们一般都认为西藏的文明化始于公元 7 世纪初叶，但随着文化资料的新发现，这一时间被大大地提前了。

我们从西藏和西藏以外的文献中发现，事实上西藏在公元 7 世纪初以前的时代就已具有高度的文明：从事农业、灌溉和矿物加工；在河谷较深的地段大胆地架设铁索桥；他们那时建筑的庙宇和房屋，至今仍使我们赞叹不已。拉萨最大的庙宇大昭寺，正是公元 7 世纪上半叶建造的，时隔一个世纪后，巨大的桑耶寺是最大的寺院之一。

公元 7 世纪，松赞干布<sup>(1)</sup>赞普把佛教正式引进西藏，该赞普把整个西藏统一于他的王权之下，勇敢地把疆域延伸到中国的腹地。到公元 8 世纪末叶，他的后裔使这个王国变成了中亚最大的强国，当时的吐蕃包括尼泊尔、不丹、突厥斯坦和中国的西部地区。

然而，佛教传入如此尚武的人民中，开始时运气不佳，受到了当地本教的敌视和抵制，直至 8 世纪中叶，莲花生（Padmasambhava）才使佛教扎根于西藏，成为西藏人民命运的主宰。

但 9 世纪前半叶，西藏土著宗教——本教仍然得到当时赞普朗达玛的支持，他们向佛教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一个僧人杀死了赞普，使西藏陷入混乱，帝国从统一走向分裂，出现了数十个小王国，它们分而治之，各自为政，极力保住自己的那片地盘。

佛教也慢慢地恢复了失去的地盘。国王被僧人杀死后，其后裔逃亡，其中之一后来成了古格王朝的创始人。尽管朗达玛对佛教恨之入骨，但他的后代却使佛教在这里再度得到宏扬。

古格王国<sup>(2)</sup>是同时形成的所有王国中最重要和最有名的王国，这是西藏的史学家们的共同评价<sup>(3)</sup>，也是现代历史学家们的共



同评价。当时的古格王国包括了阿里三围(mngavrisbskor gsum),亦即玛隅(Maryul)、古格和普让(Purang)在内的大片土地。

## 2、王朝的政策

本教反对佛教在整个西藏是极为强烈的，但在古格尤为激烈：古格是本教创始人辛饶(gzhen rabs)的故乡，所以是本教最繁荣的地方<sup>44</sup>。

朗达玛对佛教的迫害使佛教徒失去了王室的支持，割断了西藏佛教徒与印度佛教徒的联系。因此，随着王室的支持越来越少，佛教徒再也不能使用已经建成的庙宇和建立新的庙宇，也不能继续从事传播佛教的活动。在同印度佛教的联系被割断之后，西藏佛教徒受到了清洗迫害，他们被迫隐藏起来，尽管印度佛教徒们催促他们从事传播工作，但他们无法重新露面，他们对佛教的理解逐步蜕变，对佛教的信仰也逐渐淡薄，而重新信仰本教。

佛教传进西藏，不是通过其玄学和遁世学教义，而是通过遵奉仪式的方式，但这种仪式不是那些高贵的幽灵为了重现神秘经验而赖以存在的最高仪式，只不过是一种幻术而已。对于民众来说，佛教是一种公式和仪式体系，是一种比本教更能有效地驱魔打鬼的体系。

佛教徒们听其自然地回到了旧式的仪轨。如果人们已注意到，当西藏史学家讲到佛教在 10 世纪左右又在西藏兴旺起来时，把这种兴旺称作“佛教后宏期”<sup>45</sup>，那么可以认为佛教曾经经历过衰落。

依据这样的看法，我们对古格王朝历代的政策进行了研究。在东方，革命的运动总是建立在宗教派别基础之上的，所以必然表现为宗教运动。国王的敌人借助于本教，因此国王就竭尽全力支持传播和确立佛教。“打倒本教，准确地说，就是让他们改从新的信仰，

意味着把他们的灵魂统一起来。”<sup>[6]</sup>

然而,宗教宣传的另一个目的是:“便于统领庞杂的部落。古格的国王们不断向西部地区扩张,吞并了这里的部落。吞并部落的目的不是在于占领,而可能是出于与生命悠关的需要:西部西藏是遍布岩石的不毛之地,没有树木,所以既无木柴生火,也无木料建筑,即使历尽艰辛,那里的土地也无可奉献。而位于库努(Kunu)的山谷里却是森林茂密,气候湿润,土地更易耕种和充满硕果。显而易见,西藏的新占领者应该把目标瞄准这片与之接壤的绿洲且想方设法展开宗教宣传,粉碎战胜了居住在那里的部落的抵抗”。<sup>[7]</sup>

### 3、仁钦桑布的活动

仁钦桑布(rin chen bzang po)是帮助国王执行宗教计划的人。

“根据白莲(padma dkar po)<sup>[8]</sup>的看法,松艾(srong nge)<sup>[9]</sup>国王修建托林寺<sup>[10]</sup>,许过圣愿并将自己改名为天喇嘛益西沃(lha bla ma ye shes vod)<sup>[11]</sup>,意在更加有效地传播信仰。他还从王国的优秀家族里精选了 21 名青年<sup>[12]</sup>,把他们按照天资优劣分成三组,并明确规定劣等组对优等组的从属关系。“这些青年是国王用重金买来,打算为他们聘请印度名师。”<sup>[13]</sup>

国王确定了名师的人选,还为这些青年人规定了应学的印度佛学课程。这些青年中有 19 名死在国外,只有两名回到了本土:仁钦桑布和他的堂兄勒巴喜饶(legs pavi shes rab)。他们所去的都是克什米尔和印度最有名的学校,在克什米尔,他们听过诸如那若巴(Naropa)和宝金刚(Ratnarajra)法师的讲授,在印度,他们听过超岩寺(Vikramasīlā)<sup>[14]</sup>的著名法师阿底峡(Dipankarabhadra)的讲授。

仁钦桑布于公元 991 年回到西藏,当时他只有 33 岁<sup>[15]</sup>。

“为了学到知识，徒弟们紧随师父，不少印度法师也被他们的施主请求帮助工作，以期使佛教经久不衰。常此以往，古格和普兰王国的王宫成了一所真正的学校，这所学校翻译了成百篇的佛经。今天，这些译文都被收集在《甘珠尔》和《丹珠尔》里<sup>[16]</sup>。这所学校自称是翻译佛经的第一家，翻译准确无误。佛经是从印度传到古格的，它不仅包括经文，还包括许多密宗及注释，戒律 (Vinaya) 或者庙规和逻辑专论。”<sup>[17]</sup>

根据仁钦桑布的生平记载，阿里王宫里有 75 个班智达<sup>[18]</sup>，这在历史学家熏奴贝的著作<sup>[19]</sup>里也得到了确证。

#### 4、古格的艺术

仁钦桑布的寿命很长<sup>[20]</sup>。由于国王们的布施，他修建了许多寺庙，部分寺庙至今依然可见。

“在拉达克 (Ladak)、拉合尔、斯必提 (Spiti)、古格、普兰等萨特累季<sup>[21]</sup>河谷地的沿途地区没有古庙，因为那些地方的传统与这位大洛扎瓦 (Lotsavba)<sup>[22]</sup>没有联系。这是一种歪曲，我们或许并不清楚真正的原因，但有一件事是无可否认的：他除了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以外，还是一位伟大的寺庙和塔<sup>[23]</sup>的建筑师，他还在寺庙里传播西藏西部的语言和印度语言。”<sup>[24]</sup>

在这些寺庙和小庙堂里有着丰富的壁画，没有一个墙壁的角落没有壁画，还有许多石膏塑像和木雕，大殿上还有镀金铜像，有些铜像大小与实体差不多，有些则稍小于实体。<sup>[25]</sup>

这些作品的大部分是仁钦桑布时期的。

事实上，我们还知道古格王修建了不少寺庙，但只要认为哪一座寺庙还不能与印度寺庙媲美，就不断地叫仁钦桑布到克什米尔去聘请艺术家<sup>[26]</sup>。

6 年之后，仁钦桑布带着 32 名艺术家回到了西藏，艺术家们被安排到 20 座用国王的布施修建的寺庙里，对寺庙进行装修，并把那些象征性的形象固定到墙上，这些象征性的形象将要帮助虔诚的信徒们实现精神上的超度。

古格最古老的绘画——无论是那些画在墙上，还是画在唐卡<sup>[87]</sup>织物上的画，无一不受印度风格的影响，其特征与现代画有着千差万别，因为现代画似乎受到了中国风格的极大影响。古格的古代艺术如此特别，如此接近印度风格，所以杜齐称它为“古格派”<sup>[28]</sup>艺术。

“古格派”艺术从 11 世纪开始，到古格王国灭亡为止，在此期间，古格曾由拉达克和拉萨两地统治。

当然，这些世纪以来，古格的艺术同西藏的东西一样发生了演变，使西藏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尽管这种演变是缓慢的，“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它并未彻底明确地摆脱印度在其初期所给予的影响，这种影响始终存在于着色、画面的总体布局 and 背景之中”<sup>[29]</sup>。

扎布让现在已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唯一能够证明其光荣历史的只有一些破庙，而这些破庙仍在遭受衰败和危险……已注定要塌陷。西藏的印度式艺术的文物将可能相继消失，从历史学、肖像学和美学的观念出发，这些文物都是无价之宝。从仍然残存的寺庙可以看出，那里不仅包含了密宗神道的多种著名彩绘——这种艺术以它永不枯竭的想象力反映了大乘昔日艺术（Olimpo）的巨大部分，同时也是颜色和谐一致的一次胜利，这种和谐在此之前从未在西藏的这些地区出现过。它们的绘画证明在西藏西部有一些极好的艺术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我们可以尽情地欣赏一种直接渊源于印度传统的艺术的完美和成熟。应仁钦桑布邀请来到古格的艺术家和主持佛事者送给他的礼品，在 11 世纪前后，把他们国家的流行艺术传到了在印度大寺庙影响下刚刚兴旺起来的绘画学校。

虽然佛教慢慢地在印度不幸凋敝了，但绘画却在有些寺庙残存了下来。西藏的子孙后代以巨大的忠诚，然后又不无敬畏地使这一艺术留芳后世，他们的新教友又以同样的心情保存师傅们的遗产。这正是扎布让庙宇壁画的伟大价值所在，从这些壁画里我们可以欣赏到说不上是什么画派的作品，这些作品似乎代表了西藏某个地方的艺术，独树一帜，颇具特征，完全不同于强烈反映了中国风格的近代绘画，这些作品同中国风格似乎联系不大。<sup>99(30)</sup>

在离扎布让不过几公里的另一个小村镇芒南(mangnang)，我们也看到了印度艺术家的一些作品。在扎布让如同在其他所有重要城市一样，经常由于政治变故，利用庙宇装修或扩建的机会，用新的图画取代那些老画。

我们在扎布让就看到过这样一幅画：尽管其创作思想和画笔格调仍然是印度式的，但画面已有些西藏化，反映了西藏的特点。

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延续了 5 个世纪，我们可以从扎布让的寺庙里看到这个发展过程：从庙里逼真的缩形画像的精湛画技、雅致图案和秀丽姿态中可以看出，它们更接近印度绘画艺术和皇家庙宇壁画艺术，那些壁画就是用同样柔和的线条和活泼的色彩绘就而成的，这是西藏绘画艺术里少有的；我们还可以看一下红庙的宏伟构造，在王国崩溃前夕，古格的艺术似乎又一次炫耀了它的美学力量。

这一堪称自成一体的艺术远没有结束，扎布让的所有寺庙同古格王国里仁钦桑布修建的许多寺庙一样，都标志着密宗教义特别发展的时期，这一艺术既可称作学理艺术，也可称作象征艺术。如果我们撇开两座寺庙里反映菩萨生活故事的绘画——这些画似乎想证明那些艺术家们也善于现实主义地描绘形体生活，其他所有的绘画都是象征性的。

根据密宗教义，生活是一种可怕的梦幻，也是一种巨大的隐

患，任何一个画家都不可能像古格的画家那样，用最有效的象征学手法把这种思想反映出来。

“我想”，杜齐(Tucci)写道：“许多这类绘画中不可否认的象征学手法的有效性，正存在于这些绘画活灵活现地反映了思维的过程，艺术家所经历过的恐怖和幸福似乎都反映在他的作品里。”<sup>[31]</sup>

这就是了解这种象征学的钥匙，由于年复一年地进行训练，僧人们代代相传，把这把钥匙传了下来。

“渊源于印度的这种艺术，似乎最适宜于移植到诸如西藏这样的地方，本教的古老信仰，对地下鬼神的崇拜应该使西藏成为传播密宗教义及其艺术的特殊地方，根据这些古老的信仰，地下鬼神分兵把守各个地方和山脉，他们随时准备扰乱人类的生活，那些可怕的祭奠经常出现在干冰雪地区所举行的佛教仪式之中。然而，尽管历尽艰辛，佛教也难于改变和教化相信魔术的广大人民。”<sup>[32]</sup>

## 5、王朝给西藏立下的功绩

“因此，西藏佛教的历史期待阿里的宫廷开辟一个新的阶段，使其渗入新的生活之中，用数以百计的佛经著作<sup>[33]</sup>丰富它，以期帮助人们更完善地理解完整而困难的理论和神秘的佛教教义，因为，这里保存了佛教思想最精髓的部分，如果不是这样，婆罗门教复活也许永远都不会得到承认。”<sup>[34]</sup>

事实上，由于印度始于公元 1000 年之后的反佛教狂热，佛教在其发源地荡然无存，佛教的许多哲学原著也都丢失了，只剩下一些藏文译本，这百来本忠实的译本到处流传，致使佛教能在西藏得以复生。<sup>[35]</sup>

“佛教首先在卫(bdus)或藏(gtsang)<sup>[36]</sup>地区的阿里复生的”。历史学家布敦(buston)也是这样认为的：“佛教理论之火起始于下

西藏,并通过阿里传播开来”。<sup>[37]</sup>

《布敦佛教史》也告诉我们,西藏各地的学者都来到古格学习理论,由这所学校培养的学生遍布各地。

在那些翻译过来的著作中,有几本逻辑性书籍值得一提,直至今天,西藏还把这些书称作“古逻辑学”,以区别于半世纪后古格的另一国王洛丹喜饶译师在克什米尔学校里翻译的那些逻辑学书籍。古逻辑学书籍使西藏人掌握了个人发展理论的工具,这种发展在 15 世纪的宗喀巴的形而上学阶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还有一个功绩,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超过了任何其他的功绩,即迎请了在西藏被称为“第一个印度人”阿底峡。我们曾经说过,古格王益西沃曾经派了 21 名青年到印度去,后来他又成为宗教首领。在王国遇到的一次危险中,他担任军队司令,战败后他当了俘虏,他的侄子绛曲沃(byang chub vod)费尽心血收集了王国的金子,以期赎回在押的叔叔,所需金子要与其叔叔的体重相等。侄子抵达敌国后,老国王不想被赎回,但他要求用这笔财产从印度聘请佛教思想的代表。<sup>[38]</sup>

就这样,伟大的阿底峡来到了西藏,西藏人称他是“尊敬的杰出的阿底峡大师”,他生于 980 年,孟加拉人,其名声与伟大的哲学大师月乘(Chandrakirti)和那若(Naro)齐驱并驾,当他出发去西藏时已年逾花甲,当时他是超岩寺(即大学)的寺主。

1042 年,他到达阿里,同 85 岁高龄的仁钦桑布进行了会晤<sup>[39]</sup>,在托林寺住了一段时间。阿底峡在西藏是受人尊敬的寺院创始人和喇嘛教改革者,他根据最纯真的人乘派对喇嘛教进行改革,信仰独身主义和崇高的德行,谴责对魔鬼的崇拜。他死后 3 个半世纪,他的教派发生了蜕变,对魔鬼的崇拜重新泛滥,这一蜕变是以宗喀巴为代表的,他成了至今流行于西藏的教派创始人。

佛教对西藏的许多功绩都得到了承认,东部和中部所有地区

最有名的喇嘛都于 1076 年集中在托林·孜德 (rtse lde) 统治时期, 托林是古格的中心, 当年他们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著名的佛教法会, 这次法会以阿里为名。

我们读一下《青史》：“卫藏<sup>[40]</sup>和康<sup>[41]</sup>地区的所有大师们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讲, 他们逐个讲解已在那里专门化了的教规……” 熏奴贝<sup>[42]</sup>结束时说, “在任何其他国家为宗教所提供的服务, 也不如在阿里那样巨大, 这正是这个王国之王的心愿。”

## 6、11 至 16 世纪的古格王国

直至现在, 学者们也没掌握能够确定公元 11 世纪到 16 世纪古格历史的直接资料。

自 1684 年西部西藏归于拉萨政权这一冒险事件发生之后, 迫于拉萨政府的命令, 当地的所有情况均被隐匿起来。<sup>[43]</sup>如果说公元 11 世纪前后的情况还得以保存, 那是因为大家都对这些情况怀有兴趣, 这些情况关系到那个没有对中部省份进行政治干涉的阶段。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任何家族都不能再用古老的特权或授职权去反对拉萨专断政府为止。

那些寺庙情况的记述, 要么被拉萨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了篡改, 要么被战争和火灾所破坏。诚然, 如果由于人口稀疏, 难于把人集中于战事, 而把西藏人员高度集中的寺庙里的人们集中起来, 却是件十分容易的事, 那里的寺庙有点像我们的城镇, 所以, 可以根据需要把僧人变成大兵, 而把寺庙变成城堡。为这一命令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是艺术品和图书馆, 它们或早或晚地都遭到了破坏。

古格在 11 世纪左右开始的光辉一直闪烁到 12 世纪之后<sup>[44]</sup>。

然而, 1150 年前古格丧失了自主权, 成了拉达克国王喇钦乌德巴拉 (la chen utpaia) 的领地。据佛兰克宣称, 1150 年前不久, 拉



达克及其国王不仅占领了古格西部的下拉达克，并且占领了古格城及其东部地区的普兰和洛沃（lowo）地区，因为此两地曾经非常容易地被拉达克国王占领。然而，我们还从《拉达克王统记》（*Le Cronache del Ladakh*）里知道，喇钦乌德巴拉保留了他所占各地的原来国王，以此作为获得贡品的最好手段<sup>[41]</sup>。但是，如果这种做法可以保证取得贡品，那么也使造反变得非常容易，事实上古格很快就恢复了独立。

《拉达克王统记》从 1450 年以后有 3 个世纪没有再提到古格，这就使人们可以想象，这个王国从那时起已经不属于拉达克了。

给我们留下的有关那个时期的唯一情况也许正是《克什米尔编年史》里所提到的：伊斯兰教君主扎努·衣·阿必丁（Zainu-i-abidin）曾对拉达克发动了一次远征，一直推进到古加—德沙（Goggadesha）。根据坎宁汉（Cunningham）和弗兰克（Francke）记载：“古加—德沙”完全可能就是古格。

我们现在讲到 1430 至 1440 年的事情。《克什米尔编年史》记载说：“克什米尔国王扎努·衣·阿必丁入侵古加—德沙，并从伊斯兰教徒（他的士兵？）手中拯救了一尊金佛像，拯救金佛像的事情发生在沙耶—德沙（Shaya—desha）（可能是舍 [sheh] 村）这就是说，他占领了库鲁塔（Kuluta，即库鲁 Kulu）城。”<sup>[42]</sup>

但是，古格离克什米尔非常遥远，为什么他要把那片领土占为己有呢：因为他在拉达克居住期间，就把古格看成是克什米尔国王的军队应该劫掠的对象。

这种劫掠是以获得金子为目标的（这里也许是指《克什米尔编年史》所提到过的故事），王朝一直完全控制了古格的金矿，把金矿看成是王国的主要财源。

1450 年后不久，古格再次丧失独立，沦为拉达克统治下的一个部落。

《拉达克王统记》告诉我们，洛追却丹(blogros mchog ldan)国王(1440—1470)在战争中取得的最大胜利莫过于从古格获得贡品<sup>[7]</sup>。这就使人相信，王国在 13、14 和 15 世纪也是非常兴盛的：事实上，至今残存的遗址仍然告诉人们，那里不存在哪一阶段衰落的标志。公元 10 世纪的伟大艺术代代相传，尽管这一艺术的某些部分经受过后人的改造，但相比之下，拉达克同时期的艺术只不过是一个劣等初学者的复制品而已。

这次也是一样，应该尽快脱离拉达克。我们从《拉达克王统记》里知道，扎西朗古(bkrashis rnam rgyal)国王(1500—1530)与那些反叛的土王进行过斗争，如果想到古格是离拉达克最远的领地，就会承认古格是首批利用机会进行造反的地方之一。

上述国王去世后，土王们再次反叛，我们知道，这次也有古格。新国王才旺(tshe dbang)平定了叛乱，古格王国每年要向拉达克纳贡 900 克黄金、100 头饲养了 3 年的绵羊和一匹马<sup>[8]</sup>。这一现象只延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才旺国王约于 1560 年左右去世后，包括古格国王在内的所有土王再次造反，拉达克新国王降央南杰(vjam dbyangs rnam rgyal)的平定计划以失败而告终；这次斗争给拉达克带来了一系列可悲的事件，我们以后还会提到这些事件。这次斗争使古格开始了一个繁荣自由的阶段，这一阶段从 1560 年开始，一直延续到安夺德时期。

16 世纪的后半叶是古格王国的鼎盛时期，洛扎瓦寺庙的绘画正是这一时期的象征，该寺庙位于流经扎布让的一条河边。在扎布让脚下的红庙里的绘画中，同样也证明了这一时期的兴盛。我们不可能希望有一部更好的文献，再现那一时代活灵活现的生活。

正因为这样，杜齐才认为那里壁画的代表作是与红庙同时诞生的：“可以将它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代表了真正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是寺庙祝贺寺庙落成时使用的，古格的国王、亲王及所有达

官贵人都出席这样的仪式。举行这种仪式时，在供桌上立一无量寿 (Amitāyus) 的佛像，并放置一些供品，祝贺的人群面向神像，神像左边的第一排是国王及王后，他们身披斗篷，高坐于椅垫之上，并由两名随从高举王伞立于两旁，伞是王国传统尊严的象征<sup>[49]</sup>。紧靠他们的是亲王，再后面是王室官员，坐在第二排的是公主们。第三排则是穿着各色披风的和戴着各色头巾的人们，如果他们不是在朝拜，就会被误认为是克什米尔的穆斯林。最后一排画的是手持捐献物的商人，他们甚至有的抱着献给寺庙的建筑材料；他们中有牵着驴马的汉人，有克什米尔商人，还有肩上抬着筐的加瓦尔 (Garhwal) 人<sup>[50]</sup>，他们形象逼真。在供桌上方和供桌上，吊着和放着各种宗教信物和供品。神像的左边是喇嘛<sup>[51]</sup>，由他们进行落成仪式，他们分列 3 排，第一排只有两个僧人，穿着华贵的披风，离其他两排很远，他们可能是僧人中身份最高的喇嘛，也是王室血统。在古格一直沿袭一种起始于王国创始人的习惯，即宗教的首领须由王子之一承担，安夺德也曾经回忆过这一习惯做法。安夺德在讲到扎布让的商业及其杂货摊的重要性和讲到开赴克什米尔的汉地商队及古格与来自印度平原的商人们的关系时，曾对我们作过同样的表述，这一表述得到了这位葡萄牙耶稣会士离开后不久所画的这些壁画的确认。

“诵经之后，艺术家们想把对寺庙的落成典礼和节口的记忆永久化，根据习惯，落成典礼之后，必须像过节那样庆祝一番<sup>[52]</sup>，庆祝的特别形式是奏乐和跳戴着假面具的舞蹈，那些化装成魔鬼的人频频起舞，他们时而跳跃，时而翻腾，而且节奏很快，有时还朝空中乱舞棍棒，真像是一群恶魔附身的妖怪；而另一些人则躲藏在硬纸做成的狮子、马等禽兽体内，还有一些人披着色布做成的动物皮，这些装扮的动物随着巨大铜号的吹奏进行表演，这时，鼓乐齐鸣，有些人吹笛子，有些人擂鼓。鼓似有两种：一种是山人站着敲

击，这种鼓就像一种圆桶，另一种形如‘Tobea’，由那些穿着披风和裤子并装扮成印度乐师丑角的人在行进中敲击……这时又有一些人加入庆祝的行列，他们都装扮成运木工，肩扛建筑寺庙用的材料，那是些比较昂贵的材料。在西部西藏并无树木，所以建筑寺庙所需的巨大木柱、柱头、梁架、板材都是经过长途跋涉从库奴瓦（Kunuwar）或赤德库尔（Chitkul）运来的，现今在西藏找到这些材料也并非易事，因此在那个年代的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对于那些了解这个地区，了解喜马拉雅山崎岖小径和了解陡峭峡谷以及悬崖峭壁的人来说，会对那些经过数日徒步搬运这些巨大而沉重的木材的事实惊叹不已。

“绘画都是现实主义的，一眼就可以看出西藏绘画与印度山区绘画之间存在的差别，所有的人都裸露着大腿，用一块毛料裹着胸脯，并且像今天仍可见到的上库奴瓦或加瓦尔牧师那样，肩上扛着一根棍子。为了使绘画更加具有生活气息，画面上还有一小群绵羊，每头羊的背上都驮着货物，就像运盐的商队一样。

“在我们至今看到的所有寺庙的墙壁上，遍布冷酷无情和令人生畏的鬼神形体像，在寺庙的废墟上，似乎还留下反映阴间王国生活的一丝幻想，这些绘画有时会使上述幻想突然变得活灵活现。此外，这些绘画还基本上如实记载了各种杂货摊、商队以及操着各种语言的人们会聚在一起交换商品、交流思想和文化的情况。”<sup>[63]</sup>这些画正是生活的缩影，而这种生活有朝一日一定会为已经发生的败落而颤抖。

然而，古格王朝的鼎盛只不过是一种“天鹅之歌”而已。

## 7、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的拉达克王国

拉达克位于古格西北。

在上一节里我们已经说到，才旺国王死后，即 1560 年前夕，王国的所有土王都起来造反，才旺王的继承人降央南杰王准备再次平定叛乱，并称这些战争为普日（Purig）之战，普日是勃律（Baetistan）的领土。

若干世纪里，勃律和拉达克一直处于战争冲突之中。达尔德人（属雅利安人）亚利乌教是勃律占统治地位的因素，而西藏式的文明则与它无缘。这里的人们从来不曾有过绝对的主人，有的只是一些地方大公，共同的危险把他们联系起来，并推举一位总领。

根据坎宁汉所说，在斯坎德尔（Sikander）时期，非偶像化曾于 1380 年至 1400 年间在克什米尔占统治地位，勃律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在降央（vjam dbyangs）时期，赤坦（Chigtan）和卡则（Kartse）的两名亲王皈依伊斯兰教。一度，他俩发生了冲突，赤坦的亲王请求拉达克国王降央的帮助，拉达克国王则以此请求为借口，乘机侵略勃律，但他未能得手。

勃律人在喀普鲁（Kapulu）的头领阿利·米尔·塞尔汗（ali mirsher khan）大公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先让西藏人自由地进入山谷瓶颈之地，等到大雪封山敌人难以行动之时，他们发起了猛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并活捉了国王，随后他们开进拉达克，恣意掳掠焚烧。

西藏西部是一个多山地区，基本上是不毛之地，历代国王都难以对这些边远地区实行真正的控制，因此，他们一旦打败一个对手，并不是取缔他的王位，而是把他当作一邦之主保留下来，阿利·米尔也用同样的方法对待降央，仍由他统治王国，但他与前王后生的两名王子，必须远离王室，而以自己的女儿嘉噶吞（rgyalka thun）取代王后<sup>[54]</sup>。

阿利·米尔是穆斯林，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降央，企图以此作为使拉达克伊斯兰教化的第一步，然而，喇嘛们并未丧失灵魂，反

而宣布信仰伊斯兰教的嘉噶吞本来就是度母 (Tara) 女神的化身。

此外，在阿利·米尔的诱饵面前，降央是个过分热诚的佛教徒。

《拉达克王统记》在提到国王时则告诉我们，战争给国王带来的是不幸，使国王的晚年在“佛教泛滥”中度过。根据弗兰克记载，降央死于 1590 年前夕，嘉噶吞与他曾生一子，阿利·米尔希望孩子取名叫雄狮森格 (sengge)，森格生于 1570 年后不久。

《拉达克王统记》称森格“自幼伶俐骁勇，拳、跑、跳、箭、枪、骑马等无所不晓，有如菩萨——古代苏荷达那 (Suddhodana) 的儿子。”<sup>[56]</sup>

而阿利·米尔的孩子都是无用之辈，所以，他特别宠爱外孙森格。阿利·米尔约死于 1603 年。

根据地方习俗，老国王死后，王子尽管很年轻也可继位，所以森格在 1600 年继承了王位<sup>[56]</sup>。

在我们看来，他到古格疆上进行劫掠还太年轻。下面是《拉达克王统记》里的一段话：“国王在年轻的时候就同古格最边远地区的居民打过仗，并从古格的北部和卡拉沙 (Cailasa) 北部牵走了马匹、牦牛、绵羊和羊羔等，以使本国富庶。”<sup>[57]</sup>

我们看到，西藏的农业只在山谷之中，每年夏天，西藏人便到高原和山区放牧马、牛、羊等，安夺德也曾提到这一点<sup>[58]</sup>。

如果森格希望已被勃律人洗劫一空的土地恢复牛羊遍地的状况，那么他就应进行大量掠夺。

非常幸运的是，他变得越发勇敢，并开始向古格腹地推进。“其后，他向古格内地发动了战争，杀死了沙汪 (sa wang) 和萨叶 (za ye)”<sup>[59]</sup> 拉达克也随之充满了牦牛和绵羊。<sup>[60]</sup>

我们不知道森格是何时与勃律公主结的婚：同西方的这一新联系进一步促使他尝试在南部和东部的运气。

《拉达克王统记》这样写道：“他同格桑卓玛( bskal bzang sgrol ma )——茹索( ru sod )的公主结了婚”<sup>[61]</sup>，但达玛吉( stag ma gcig )的记载<sup>[62]</sup>却说他是同勃律的一位公主结了婚，他的记载一直是比较真实的。著名的格桑有可能是森格的表妹，她的名字一直与国王相提并论，她也被称作度母女神的化身。

森格一生有两大嗜好：战争和宗教，也许他对宗教更为偏爱。

他对战争的爱好曾使他在牺牲吉格王国的基础上建立过为时不长的拉达克帝国，而对宗教的爱好则是佛教得以在拉达克繁荣昌盛的原因所在。在那里，直至现在，佛教仍然体现了降央和森格的宗教政策。

我们已经了解降央晚年的宗教热情，他给森格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森格的一生是继续和丰富其父王的宗教政策的一生，正因如此，《拉达克王统记》称他为“宗教之国王”，与授予印度法王( Dharmaraja )的称号是一致的，这个称号是专门授予佛教大师的。指出这一点的目的并不像《拉达克王统记》<sup>[63]</sup>意欲奉承的那样，称森格的宗教政策似乎是天赐之意，然而事实上，宗教伴随着森格一生的所有活动。

正如其父曾邀请“红教”属地主巴( vbrug pa )<sup>[64]</sup>的热降( ra lung )大法师那样，森格也邀请了主巴的僧人达仓热钦( stag tshang ras chen )<sup>[65]</sup>。对此，《拉达克王统记》是这样写的：森格“邀请了尽善尽美”<sup>[66]</sup>之王达仓热钦，此人曾游历印度乌仗那( Urgyan )、克什米尔等地，他亲眼看到过 80 个尽善尽美者，这个圣佛有着闪光的身体<sup>[67]</sup>。

“为了实现他父亲的遗愿，他向巴郭( babsgo )敬献了一尊金和铜铸成的塑像，这尊塑像是按照弥勒佛( Maitreya )8 岁时的样子雕塑而成，塑像上镶满了各种宝石，并用翡翠、珊瑚等进行了装饰。”<sup>[68]</sup>

“因此,从印度、从东方、从西方派来了所有的大法师。这里还培养了五名和尚,每天诵“劫”(Kalpa)经时,他们不断地给油灯加油,以保持油灯长明不灭,他们还不断地焚化供品。”<sup>(69)</sup>

《拉达克王统记》还列数了那里宗教创建的情况和宗教的发展为西藏的所有著名寺庙作出的贡献,似乎又在重复过去的说法:拉达克要比古格早 6 个世纪来到人世。

我们再读《拉达克王统记》的以下内容:“在上下拉达克<sup>(70)</sup>,在拉达克的所有管辖地区,到处都可见到为祝福当今的“劫”长生不老而赠送的领上、祈祷圣地和专施于诵经传教的地方。在圣地,达仓热钦有国王赐给的大片土地,这些土地分散在各处,它们可以用于建筑寺庙、祈祷庙堂等等,所以,达仓热钦修建了不少大寺庙,较大的是以下三座:赫密(Hemi)的降曲桑林(byang chub bsam gling)<sup>(71)</sup>、介德(Ice bde)的大乘寺(thegmchog)和汪列(wam lè)的德庆寺(bdachen)。”<sup>(72)</sup>

《拉达克王统记》还列数了国王对宗教的恩惠,并评论说:“何时菩萨的神圣教诲普施到每个臣民,(国王)就会像高升的太阳,国王统领下的所有臣民都会按照十条德行戒规生活,他们还会说,森格国王也好,喇嘛也好,他们都一样:纳贡和纳贡者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是形影相随的一对。如此道理,地球终成完满无缺。”<sup>(73)</sup>

这样的宗教政策成了扩张政策的桥头堡,即便没有这样想过,但结果只能这样。

人民高兴地追随国王和喇嘛,人们对喇嘛的崇敬我们已在第一章第 8 节里提过:“他们也有主教,称之喇嘛,他们认为当时(1600—1601 年)喇嘛是圣人,传颂着他们的许多神奇故事,这个喇嘛不同于其他喇嘛,他的生活表明了他伟大的忏悔精神。他的住所极其荒凉,一条大河把他与城池分割开来,只有在祭神和出席特别庄严的活动时,他才渡河进城,去时也只带一件袈裟或一块坐禅



用的羊皮，其余一概不带。”<sup>[74]</sup>

《拉达克王统记》在结束对国王和喇嘛的描写时说：“……正因如此，拉达克才得以强大和兴旺。”<sup>[75]</sup>

弱小的古格王国再度陷入危险。

## 8、安夺德时期的古格王国

古格无力与拉达克强争豪夺。

1600 年左右，拉达克年轻的森格王子在本土周游视察。

《拉达克王统记》在赞美了他的堂皇仪表之后叙述了他的业绩，叙述有如进行中的拳术，循序渐进：“国王在年轻时曾举战进攻古格边远地区的居民，除了进攻卡拉沙外，还有古格的最北部地区，并从那些地方带走了马匹、牦牛、绵羊和羊羔等等，这些牲畜用于使自己的土地富庶……以后，他又把战争扩大到古格腹地……就这样，整个拉达克的土地上布满了牦牛和绵羊”。<sup>[76]</sup>

然而，战地离王国的首都扎布让很远，所以人们认为类似的劫掠尚不是真正战争的劫难。在这些劫掠之后出现了一个和平阶段。因此，古格国王扎西札巴(*bkra shis grags pa*)<sup>[77]</sup>于 1614 年左右有可能提出娶森格的妹妹为妻。

安夺德于 1633 年 1 月 3 日致信罗马耶稣会总会长<sup>[78]</sup>，陈述在莫卧儿和西藏的传教情况，其中提到上述问题。

1612 年左右，古格王生一子，这样他就有了王位继承人，神父们的信中也多次提及此事。此子生后，王后丧失了理智，安夺德在信中说王后“至今仍未康复”，国王经过两年徒劳的努力后，想另行婚配，并请求森格之妹<sup>[79]</sup>相助。定此婚事是经过一番周折的，但当新王后来到离扎布让两天路程的地方时，国王却命令她返回。安夺德说不知是何原因使得国王如此生气，但他又肯定地说，新王后是

国王崩溃的主要原因。

森格于是立即对古格宣战，此战离上次战争相隔 18 年。安夺德告诉我们，这次战争给王国造成了巨大损失，使得农作、耕耘和采矿等都不能进行。

历史表明，一旦一个王国失去繁荣而衰落下去，与其接壤的其他王国，不管是否从属于它，都会群起而攻之，或争取独立，或图谋扩张。事实上，我们了解的古格一直处于战事之中，或与邻国交战，或与地方首领冲突；所以古格从未具备过强大优势，其优势也从未被人承认。安夺德的第一封信（写于 1624 年 11 月 8 日）就告诉过我们，有三个地方首领揭竿反对古格王，斯里那加王也曾借机对古格宣战。

但事情的结果是较好的，安夺德写道：“斯里那加王的和平时期是短暂的，这是天主之意，天主还赐予三个地方首领失败”。<sup>[80]</sup>

当安夺德 1625 年再次来到西藏时，看到国王又一次陷于战事之中。我们可以读一下他写于 1625 年 9 月 10 日的信：国王“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这次战争，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战争，国王正处在出征前的准备之中”。从 1626 年 8 月 15 日的信中我们得知，国王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即于 1625 年 10 月中旬结束了战争。

这是一次进攻拉达克的战争？我们说不清楚。

我们还知道，国王于 1626 年又一次投入战争，当年 4 月 2 日传给国王的消息是：“国王的军队打败了两个小王国，但这两个小王国很厉害，它们曾联合反对国王”。<sup>[81]</sup>我们不知道这里指的是哪些王国，也无法知道战事的准确年代，不知道是否是指同一封信里提到的发生在 1625 年或 1626 年的事情，这封信曾提到当时国王派出部队采取军事行动……几天之后，传来了有关那一时期的准确消息：国王的军队根本未与敌人发生遭遇，相反，军队一直在躲避敌人，因为与敌军相比，其力量非常弱小。国王对此消息非常忧

虑……”<sup>[82]</sup>

这里所讲的敌人是否指拉达克王？可以这样设想。

拉达克人一直不敢进犯扎布让，但他们接连不断地骚扰其边睡疆土，恣意劫掠。

1626 年可能是信中所提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国王的叔叔和兄弟不同意国王亲基督教的行为，他们对国王说：“如果国王长此以往，就会使国家陷入明显的危险，会给喇嘛们造反提供新的机会，因为当今正与 3 个小王国处于战争之中”。安夺德也向国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陛下，您树敌过多了”。<sup>[83]</sup>

基于这些情况，人们明确了国王在 1627 年所实行的反喇嘛政策，实行这一政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当然也有下面这一原因：使喇嘛世俗化是保卫国家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国王曾抱怨其当喇嘛的兄弟仅在一夫之内就接纳了 120 名青年加入自己的宗教组织。“国王说，如果他的兄弟照此继续下去，王国就难以募集战争所需要的足够士兵”。<sup>[84]</sup>国王应该是真诚的。

安夺德到达时的古格王国的形势是这样的：上一世纪出现的奇迹般的兴盛已经荡然无存，正处在急剧衰落之中，而它的敌国拉达克却继续上升，并派遣人员骚扰古格领上，肆意掠夺。

人民穷困潦倒，各方首领试图抖落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加之内部分歧，这种分歧主要反映在国王与担任喇嘛头领的国王兄弟之间。内部分歧造成过喇嘛造反，第二次造反正处在一触即发之际。

从人文角度讲，古格确实不是一个适宜于传播福音的地方。

如果说发现了这片土地是安夺德的最大幸运，那么，不能在这里传播福音则是他最大的不幸。

### 第三章注解

- [1] 有关吐蕃赞普的大事年表，请参阅 J·巴科、F·W·托玛斯和 Ch·杜散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J. Bacot, F. W. Thomas, Ch. Toussaint 的《Documents de Touen — Houang relatifs à l'histoire du Tibet》) 巴黎，1940年至 1946年。这些文献确证了西藏的历史传统，请见约瑟普·杜齐的《西藏历史传说的确实性》，莱登(The Validity of Tibetan Historical Tradition), Leyden), 1947年。
- [2] 这就是安夺德抵达的那个王国，安称之为“古格”(Coguc)。
- [3] 见历史学家白玛加布(padmakarmo)和熏奴贝(igzhonndpal)的《言史》(debthersngonpo)第二章。
- [4] 杜齐说斯必提(Spiti)当时属于古格王国的领地，库那瓦(Kunāwar)与古格毗邻，他写道：“喇嘛教甚至迄今都未能战胜和压服这些地方的礼仪和神灵；这里是本教的地区，是信仰魂灵主义的国家，盛行巫术、酗酒，这些信仰与习惯同信奉土地神(sabdag)紧密相联，佛教至今未能根除这些信仰(请见杜齐《印度——西藏》第三卷第一部分第 15页)。
- [5] 后期将佛教传入西藏者，但松赞干布赞普说“第一个传播佛教者”是南达(sngadar)。但众所周知，历史学家布敦不接受这种“区分第一位和第二位传播教义者”的做法(见布敦《佛教史》第二卷第 212页)。
- [6] 引自杜齐《印度——西藏》第二卷第 68页。
- [7] 引自杜齐《印度——西藏》第三卷第一部分第 15页。

- [8]16世纪西藏历史学家,《教法源流》(chos vbyung)的作者。
- [9]古格王国公元10世纪后期国王。
- [10]见布敦的《佛教史》第二卷第213页。
- [11]见布敦的《佛教史》第二卷第212页。
- [12]《索南色钦》、《东蒙史》(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第53页和布敦《佛教史》第二卷第212页。
- [13]引自杜齐《印度——西藏》第二卷第34页。
- [14]见《超岩寺》和《孟加拉学会会刊和会议记录》1909年第五期第1页。
- [15]仁钦桑布生于公元958年。
- [16]杜齐《印度——西藏》第二卷第40页始,对这些译文进行排列。
- [17]引自杜齐《印度——西藏》第二卷第25至26页。
- [18]梵文用语,意即师长、师傅。
- [19]即《古史》。
- [20]我们知道他享年98岁。
- [21]即库那瓦和斯必提这两地的本教非常盛行,仁钦桑布时期建筑的庙宇最多。
- [22]藏文用语,意即翻译者。
- [23]佛教古迹,我们在后面还要讲到。
- [24]引自杜齐《印度——西藏》第二卷第10页。
- [25]杜齐在其不朽著作《印度——西藏》中广泛地引用了这些材料。
- [26]克什米尔艺术工作肯定是在斯必提的塔博(Tabo),请阅杜齐的《印度——西藏》第三卷第二部分第90页。
- [27]一种贴在墙上或庙宇和私人小教堂柱子上的色布,它不仅具有巨大的肖像价值,也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一般说来,这些色布上画有佛教教义的标志和记有佛教圣徒的传记。这种色布是从印度帕塔(Pata)模仿而来的。

- [28]引自杜齐《印度——西藏》第四卷第一部分第 24 页。
- [29]同上。并请参阅杜齐《印度——西藏》第三卷第一部第 75 页。在那些被称作奥古斯都的立约祭坛和拉菲尔回廊装饰性花叶图案中，经常看到两头对立的狮子：这就是古格经院的一个特征。杜齐在其《印度——西藏》第三卷第一部第六十八幅附图里刊登了这样的图案。
- [30]引自杜齐《印度——西藏》第三卷第二部第 5、6 页。
- [31]引自杜齐《印度——西藏》第三卷第二部第 13 页。
- [32]同上，第 15 页。
- [33]仁钦桑布对赤松德赞赞普在公元 8 世纪已经翻译过的文章进行了重新翻译，或对那些译文进行了修订。
- [34]引自杜齐《印度——西藏》第二卷第 37 页。
- [35]消息来源于史书《青史》。
- [36]即熏奴贝，见于《青史》第 3 页 b 面。众所周知，“*bdus*”读作“U”，即拉萨地区；“*gtsang*”读作“*tsang*”，即口喀则地区，安守德讲到“*Utsang*”时系指上述二地区，“阿里”是那个以古格为中心的地区。
- [37]引自布敦《佛教史》第二卷第 212 页。
- [38]见杜齐《印度——西藏》第二卷第 24 页和贝尔《西藏的宗教》第 51 页。
- [39]有关这些会晤的具体情况，请参阅布敦的《佛教史》第二卷第 213、214 页。
- [40]系指中部西藏的卫和藏二地区。
- [41]即东部西藏的康区。
- [42]历史学家，《青史》的作者，有关他及其著作的情况，请参阅贝尔《西藏的宗教》第 201 页等。
- [43]杜齐在其著作《印度——西藏》第四卷第一部第 40、41 页列举了与此事有关的一个事例。

- [44] 在古格中心托林举行的那次佛教会议召开于 1076 年, 当时古格王子的肖像的壁画像依然存在。请参阅杜齐《圣人与土匪在鲜为人知的西藏》第 132 页插图三。
- [45] 见 A·H·弗兰克的《西部西藏史》第 64、65 页。
- [46] 同上, 第 81 页注释。
- [47] “50 匹灰马; 20 头母牦牛和 20 头公牦牛, 均为枣红色 (非常少见), 大量羊群和价值昂贵的武器……除此之外, 还有 15 块价值连城的蓝宝石, 20 个马鞍”(引自 A·H·弗兰克的《西部西藏史》第 81、82 页)。
- [48] 见拉达克的《拉达克王统记》第 38 页。
- [49] 见杜齐《印度——西藏》第三卷第二部第 137 幅插图。
- [50] 同上, 第 138 幅插图。
- [51] 同上, 第 139、140 幅插图。
- [52] 同上, 第 138 幅插图。
- [53] 引自杜齐《印度——西藏》第三卷第二部第 151—154 页。
- [54] 见拉达克《拉达克王统记》第 38 页第 24—26 行。
- [55] 同上, 第 39 页第 20—21 行。
- [56] 见 L·伯戴克:《拉达克王统记研究》(1948 年印地文版第四版) 第二十四卷第 213—235 页。
- [57] 引自拉达克《拉达克王统记》第 39 页第 21—23 行。
- [58] 见其 1624 年 11 月 8 日的信: “在这片土地上……有着大量的家畜: 公山羊、母山羊、马”(引自原信第 14 页)。
- [59] 影射对象不详, 可能影射王国的两个小郡主。
- [60] 引自拉达克《拉达克王统记》第 39 页第 23—24 行。
- [61] 同上, 第 39 页第 24 行。茹索(rusod)是拉达克、拉合尔和斯必提之间地势极高的地方, 通常被称作“Rupshu (Drew)”或“Rukshu”(测绘纸)。
- [62] 见 A·H·弗兰克的《历史碑文集》第 53 号, 原文为《达玛吉救

令》(Decree from stag magcig)。

- [63] 《纪事》的编纂具有宗教目的,即赞扬佛教的胜利,因此仅被人谨慎地引用。
- [64] 主巴(vbrugpa)是从噶举派(亦称红教,源于公元11世纪,由玛尔巴(marpa)和米拉日巴(milarepa)创设)分裂(发生于1150年左右)出来的。有关这一教派的情况,可参阅江德尔的《西藏佛教或喇嘛教》第68页。
- [65] 他很快就成了王国最受尊敬的人,其名意为“老虎”,当地曾有过这样的说法:国王像狮子,喇嘛像老虎。
- [66] 我们是从“grubthob”翻译过来的,在这里相当于梵文的“成就”(Siddha)。《纪事》在此以后曾将“八十大弟子声闻”(Maha Śravakas)称作“完人”。但有人说,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并未具备阿罗汉(Arhat,圣人)那样的尽善尽美,只是在他们故世时才被称为悉地(Siddha)<sup>①</sup>,这个称谓要比阿罗汉低一级。在解释他们又被称为“成就”的原因时指出,他们必然是完美菩萨的候选人,即“他们均已到达完美菩萨的境地”。正是由于同一原因,比“达仓”(stagtshang)低一级的人便被称为“圣菩萨”。
- [67] 《纪事》记载,达仓僧具有完美菩萨的两个特征:第一,他能同“八十大弟子”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对他来说不存在时间戒律;第二,他获得了逝世时使其肉体变成光环的权利,亦即当他故世时,遗体可以完全消失,不留下任何痕迹,如同一道光环,这将意味着他可以升入寂灭(parinirvāna)即进入菩萨的最高境地,所以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被称作菩萨,尽管这是不合适的。

根据伦敦现存《纪事》手稿记载,达仓还被派往汉地进行

① 悉地(Siddha),梵文,意为“成就”,即藏文的“grubthob”。——译者



过访问。

[68]在巴郭有一城堡，拉达克的历代国王都曾来此朝拜。弥勒(Maitreya)是这个“劫”(Kalpa, 十万年为一循环)的第五个菩萨，他还应该再次投生人间。他的塑像一直供奉在王室城堡，因这一城堡早已变成了寺庙(色降 Seljang 寺庙)，此庙是一个三层建筑，弗兰克在 1909 年曾参观过这个庙宇，请见其《印藏古代文物》第一卷第 87 页。

[69]引自拉达克《拉达克王统记》第 39 页第 24—28 行。

[70]下拉达克亦名玛隅(maryul)，即下部区域的意思。

[71]赫密(Hemi)寺庙曾经是王室寺庙，1614 年开始建造，1654 年完工，是拉达克第一个宗教政权所在地，此地处于列城东南 18 英里，在当今的“羌姆”期间，仍是拉达克人巨大盛会的地方。在这所寺庙和列城(leh bde)庙宇里有达仓热钦的一些塑像和肖像。

[72]引自拉达克的《拉达克王统记》第 40 页第 5—10 行。介德根据印度测量局的地图，应为欣若(Chimray)，位于印度河以北；汪列即汉列(Hanle)山脉，位于列城东南。

[73]引自拉达克的《拉达克王统记》第 40 页第 17—19 行。

[74]请参阅本书第二章。

[75]引自拉达克的《拉达克王统记》第 41 页第 3 行。

[76]同上，第 39 页第 21—24 行。

[77]在至今已经发现的所有传教士的信件中，无一人提到过古格这个国王的名字，而这个国王却同西藏耶稣传教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弗兰克在其《历史碑文集》中以特别的兴趣对他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最终同杜齐的《西藏随记》完全一致。

[78]请见威塞尔的《早期耶稣会士旅行者在东亚 1603—1721 年》第 75 页、第 92 页。

[79] 也许是洛玛诺珍 ( *glos ma nor vdzin* ) 公主, 请参阅弗兰克的《历史碑文集》第 51 和 54 条。

[80] 引自 1624 年 11 月 8 日的信。

[81] 引自 1626 年 8 月 15 日的信第 35 页。

[82] 同上, 第 12 页。

[83] 同上, 第 27 页。

[84] 引自安夺德、奥利维拉、安鸠斯 1627 年 8 月 29 日写于西藏的信。

## 第四章

### 传教会的创立

“我们提出要求，将我们的教会献给圣母的德望。为了我们伟大的希望，也为了满足土后的恳求，尊敬的我主，请您尽快将神圣的信仰赐给这里的人民。”

安夺德

1626年8月15日

提要：1、第二次西藏之行。2、“创立西藏传教会的报告”：a)第一次和第二次西藏之行概况；b)西藏各地区；c)喇嘛及其习俗；d)喇嘛教的一些仪式和信仰；e)同喇嘛的辩论；f)喇嘛为国王设下圈套；g)西藏人的正直和宗教热忱；h)建立以圣母之希望命名的教堂；i)国王对安夺德的谦恭。

#### 1、第二次西藏之行

安夺德神父向省会长报告了发现西藏的情况，并提出了带领几名神父再回西藏的请求。他留在阿格拉，热切地等待答复。

“大神父”没有使古格国王寄予安夺德的希望落空，又向新传

教会增派了三名神父。

1625 年春天，安夺德一直在阿格拉等待答复，但他始终不见新任神父到来，于是决定留下马科斯等待他们，并嘱托他陪同这些神父去西藏，而他则与冈扎雷斯·德·苏扎<sup>[1]</sup>先行出发，苏扎从 1619 年开始就在大英卧儿传教会工作。

与他们一起出发的还有两名西藏青年，这两名青年是安夺德前一年从西藏带来的。

1625 年 6 月 17 日，他们离开阿格拉，同年 8 月 28 日，安夺德一行抵达扎布让，他们受到了国王和王后的热情接见。

安夺德于 1625 年 9 月 10 日从扎布让写信给果阿省会长，报告了旅途情况，并说扎布让的接待是充满节日气氛的，他们被安置在紧靠王宫的地方。

省会长把这封信收入了果阿 1626 年年鉴，收入时间为 2 月 20 日，题目是“西藏传教会的报告”，这封信由马努埃尔·德·维伊加(Manuel de Veiga)保存在他的《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会长的报告……及西藏或称之为震旦的新发现》，1628 年印于里斯本。<sup>[2]</sup>

“我们 6 月 17 日从阿格拉出发，向西藏(Tybet)王国前进，一路寻找捷径，于圣·阿戈斯蒂诺纪念日即 8 月 28 日进入西藏的第一个城市，此时已是出发后的两个半月，在如此长期的旅行中，痛苦总是在所难免的。

“最大的痛苦发生在斯里那加，我们本已很少的几件衣服大部分被抢走了，即使我带上了拉合尔王<sup>[3]</sup>的手谕和那瓦伯·阿萨弗安(Navab Asaf Khōn)<sup>[4]</sup>写给本城长官的信，那也无济于事。

“以上不幸是巴尼亚(Bania)<sup>[5]</sup>的谣言造成的，他们宣扬说我们是葡萄牙人，一定带有价值昂贵的布匹。

“斯里那加长官很年轻，他把城池的领导权让给了同胞兄弟，

他也很年轻。他不断地酗酒，所以他对本城发生的任何混乱和问题都无动于衷，这样的人也许要不了多久就会遭受厄运<sup>(6)</sup>。斯里那加是贾汉吉尔国王的一个土邦，每年都要交纳众多贡物给莫卧儿帝国，当贾汉吉尔得悉我们发生的事情后，深感遗憾，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来到沙漠之后（天空总是布满了乌云，我们只能在昏暗  
中前进），我患了疟疾病，为了不耽误时间，我照样前进。我主在第四天就让我的疟疾病停止下来，使我恢复了力量，这样就可以比前几天更好地在沙漠里步行了。感谢上帝，我又充满了力量，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

“国王知道我们正在向他靠近的消息后非常高兴、激动，并立即派了两个人带着 3 匹马来接应我们，其中有一匹马非常善跑。国王命令他们要尽量到更远的地方迎接我们，并要他们对我们热烈欢迎，还要他们精心照料我们。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国王、王后及王子按其国家习惯赠送的各种礼物，其中有一件是国王送给我的披风，是用细毛做成的，还用锦缎镶边，我与国王每次见面必穿上这件披风，以示国王对我们的关照和爱护。他们与我们见面之后又来了许多人，这些人都是根据国王的命令而来的，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必需品：羊肉、米、奶油、奶，等等，还帮我们拿着我们的随身物品。”<sup>(7)</sup>

“4 天之后我们来到了国王所在的城池，国王命令海关对我们的随身物品免检放行，这是这个国家赋予我们的新特权，因为该国对所有过往物品都要进行严格检查，这种检查往往要耗费好几天时间，检查完毕后，物主需交纳相当于物品价格十分之一的税。

“为我们准备的住房极小，据我们所知，他们原先为我们准备了很大的住房，但国王说大房子在冬天是很难受的。他们根据国王的要求为我们更换了住房，以使我们能够住得舒适一些。但国王对我们的住房离王宫太远深感遗憾，因为他希望我们能离他近一些，

那样他就可以经常到我们的住所来。最后国王为我们和他本人方便起见，把紧靠王宫的王子住房腾给了我们，我们住得非常舒适。

“国王命令两人侍候我们。

“我们是星期五到达的，第二天就去拜访了国王，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国王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这一年都没有来，他很痛苦，并详细告诉我们将要进行一场非常危险的战争，他正准备出征，请求我们为他向我主祈祷，让我主保佑他。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把我们叫去，与我们谈了好长时间，然后双膝下跪，请我为他诵读福音。他头顶弥撒经本，我为他诵经。诵毕，他非常虔诚和尊敬地亲吻了经本。

“他把我第一次来时送给他的精致的十字架和圣髑戴在脖子上，并告诉我们，他经常用我留给他的忏悔带和教给他的戒律约束自己。他请求我们至少要每隔一日看望一次王后，因为自上次分别之后，她把我们放在首位，视为她的生身父母。他最后允诺，出征凯旋之后将开始学习拯救自身灵魂所必须知道的一切，他希望征战很快结束。

“我们与王后一起把国王送到城外，国王上马之前和送行的人一一告别，最后和我们告别。参加送别的还有许多克什米尔人和其他外国人，但他对我们的热情超过了对所有在场的其他外国人。

“我要求随他出征，他谢绝了我并告诉说，他不希望我过分疲劳，因为我尚未摆脱旅途的劳累，他要我们做的唯一事情，是为他祷告上帝。

“一些军官也来到我们的住所，向我们索要十字架，他们把十字架戴在军帽上。这些十字架使他们显得更加精神，但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他们接受十字架时的巨大虔诚。他们一直舍不得把十字架摘下来。

10 月中旬，亦即出征一个半月后，国王回来了。<sup>[8]</sup>

安夺德利用在这里度过的秋天和冬天，孜孜不倦地学习当地人民的语言、生活方式和习俗。

国王还答应在这里建筑一座教堂，1626 年 4 月 12 日，教堂的奠基石庄严地落土了。

教堂奠基石落土前几天，另外三位神父在马科斯的陪同下由印度来到了这里。在他们离城还有数日路程时，安夺德获悉了他们到来的消息，并立即赶去同他们见了面，这三位神父是约翰·德·奥利维拉、阿拉诺·多斯·安鸠斯和弗朗西斯·戈迪尼翁。

约翰·德·奥利维拉<sup>[9]</sup>于 1626 年接到赴西藏传教的命令，他受命前刚抵莫卧儿传教会赴任。

阿拉诺·安鸠斯神父一直梦想去中国或日本，然而他却受命开赴西藏。他是法国人，而果阿不接受葡萄牙以外的人，所以他将原来的名字阿连·德·拉·布塞勒<sup>[10]</sup>改为现名。

弗朗西斯·戈迪尼翁神父是他们中最年轻的，1596 年生于葡萄牙埃沃拉 (Evora)，1615 年开始修道，1619 年离开葡萄牙去印度。<sup>[11]</sup>

安夺德神父为他们的到来和教堂的开工欢欣鼓舞，他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穆奇奥·维泰莱斯基写了一封长信，把传教会的情况和他想使扎布让成为向西藏和“大鞑鞑”(Tartaria)的所有王国传播基督教的桥头堡的设想作了详细汇报，信的封面上写下了这样的标题：西藏年鉴。这种类似年鉴的报告是耶稣会的所有传教会每年年终都向罗马作的汇报。

此信于 1627 年寄达欧洲，一经到达，就立即被译成西班牙文 (1628 年)，作为 1624 年 11 月 8 日信的附件公开发表，并为此信定题为《第二封信》，发表时还为此信加了注：这是耶稣会的葡萄牙神父安东尼奥·德·安夺德 1627 年写给总会长的信，由印度皇帝

陛下转来，我们于 1628 年收到，此信介绍了大震旦或称为大西藏王国的情况。

同年，此信又被译成意大利文，收进耶稣会总会长穆奇奥·维泰莱斯基的 1626 年西藏书信集和 1624 年中国书信集发表，这部书信集由佛朗科·科尔贝莱蒂整理，发表于 1628 年。

次年，法文版问世，题为《发生在西藏王国的故事》<sup>[1]</sup>，巴黎 1629 年。

## 2、创立西藏传教会的报告

### 《1626 年西藏年鉴》

非常尊敬的基督教神父：

我愿以此信简短地向您报告西藏传教会的情况，我会由五人<sup>[2]</sup>组成。有关传教会的情况我至今只字未提，我愿将比情况分段向您报告，我将从我们第一次和第二次来到这里写起。

#### a) 第一次和第二次西藏之行概况

从我第一次听到有关这片广袤土地的消息至今，已过去了 25 年。有关大西藏的最初消息是白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向我们提供的，克什米尔人经常到与他们接壤的印度斯坦经商，他们说整个大西藏都居住着基督教徒。他们这样说的根据可能是那里的寺庙同我们的教堂极为相似。

印度人把这片土地叫作“强国”<sup>[3]</sup>，而波斯人则称之为“大西藏”，这是为了同毗邻克什米尔王国的“小西藏”<sup>[4]</sup>区别开来，小西藏的居民都不信教，但几年前，他们与臭名昭著的穆斯林交好了。

听到这些美好的消息之后，在莫卧儿宫廷的神父们希望得到证实，于是他们就派了一名神父从克什米尔出发，试图寻找这些民



族，但由于路途艰难，特别是大雪不止，所以这位神父未能前进多远就又折返印度斯坦。

几年之后，我来到莫卧儿宫廷任职，我也从克什米尔的穆斯林那里听到了有关那次旅行的各种消息，这些穆斯林都是很严肃的人，他们的消息似乎很灵通，而且我发现他们提供的消息基本是一样的。根据这些消息，那里的所有人都应当信仰基督教（他们的先辈）在古老的庙宇里受过基督的真传。

但我一直未能找到越过那片艰难地区进行考察的好办法，穆斯林们都说在去那里的途中肯定会遇到巨大的困难。

1624 年 4 月初<sup>①</sup>我和马努埃尔·马科斯教友一起陪同莫卧儿国王离开阿格拉，经 8 天跋涉之后，我们遇到了一大群去一个叫作巴德里（Badry）<sup>②</sup>的著名寺庙朝拜的异教徒，从印度斯坦到那里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荒漠，整个行程需 40 天，这片荒漠位于印度斯坦和西藏之间。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与他们同行至上面提到的寺庙。根据我主的旨意，我们决定与他们一起出发。

我们在路上遇到了许多困难。我们虽然穿的是印度斯坦的服装，但我们的肤色表明我们是外国人。我们需越过印度斯坦和西藏之间的崇山峻岭，由于山势险峻，我们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同翻越每一个悬崖峭壁所遇到的危险相比，步行只是诸多困难中最小的困难。

每当魔鬼阻止我们前进的时候，都是我主帮助我们克服了困难。对我来说，还有另一个不算太小的困难，那就是教友在途中染上了疾病，在我们快走一半路程时，他病得很厉害，我还以为上帝要使教友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山区归天呢，然而，就在我们以为他

<sup>①</sup> 安夺德和马科斯第一次离开阿格拉，陪同莫卧儿皇帝赴克什米尔的正确时间应为 1624 年 3 月 24 日，不是 4 月初。——译者